

婚前：未婚承认的历史及其与婚姻的关系

道格拉斯·内贾
梅*

在庆祝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诸法律》一案中的判决之后。温莎，很明显，LGBT运动的目的是要确保婚姻。但是LGBT的宣传和婚姻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婚姻运动开始明确提出要求之前，主要的倡导者就是否寻求婚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集中在关于婚姻角色及其与LGBT权利、家庭多样性和性自由的关系的意识形态差异上。那些反对转弯的人

版权所有 ©2014 California Law Review, Inc. California Law Review, Inc. (CLR) 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非营利性公司。CLR和作者对其出版物的内容负全部责任。

*加州大学欧文法学院法学教授。这个项目是由洛约拉法学院，洛杉矶和加州大学欧文法学院慷慨的研究支持。我深深感谢卡洛斯·鲍尔、斯科特·巴克莱、玛丽·邦奥尔、迈克尔·布凯、玛丽·安妮·凯斯、斯科特·卡明斯、阿里拉·杜布勒、卡里·富兰克林、考特尼·约斯林、安迪·科佩尔曼、格温·利奇曼、嘉莉·门克尔-麦道、梅丽莎·默里、萨沙·纳塔夫、珍妮·皮泽尔、南希·波利科夫、杰夫·雷丁、珍妮弗·罗斯曼、雷瓦·西格尔、简·沙克特、埃德·斯坦、诺米·斯托尔岑贝格、凯西·特里索里尼、迈克尔·沃特斯通和黛博拉·维迪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就草案提出了广泛的意见，并就这个项目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特别感谢马特·科尔斯慷慨地贡献了他的时间、精力和专长。我还要感谢 KT阿尔比斯顿、萨米尔·阿沙尔、李·巴吉特、里克·班克斯、格雷斯·布伦博格、埃尔温·切梅林斯基、布里·克拉克、乔恩·戴维森、比尔·埃斯克里奇、何塞·加比隆多、夏洛特·戈德堡、苏珊娜·戈德堡、蒂芬尼·格雷厄姆、黛安·克莱恩、塔玛拉·拉夫、阿特·伦纳德、克里斯托弗·莱斯利、贾斯汀·莱维特、伊兰·迈耶、托尼·里斯、迈克尔·罗森菲尔德、迪恩·斯帕德、克里斯·汤姆林斯、霍华德·瓦瑟曼、比安卡·威尔逊和亚当·温克勒，以获得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此外，我还要感谢自由/平等组织的与会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举办的40周年纪念和劳伦斯1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观点、威廉姆斯研究所在职工作系列、西南法学院LGBT法律行动主义40年、2013年法律与社会会议、斯坦福大学婚姻平等专题讨论会、芝加哥大学监管家庭、性与性别问题讲习班，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拉凡尔纳、洛约拉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员讲习班。洛约拉的威廉·M·瑞恩斯图书馆的汤姆·布恩和劳拉·卡德拉以及加州大学欧文法律图书馆的黛安娜·萨哈尔提供了特殊的研究支持。劳拉·迪文、卡廷·埃文森、克里斯蒂娜·罗和阿什利·斯佩尔曼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援助。《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的编辑们，特别是丽贝卡·李、玛丽安娜·默奇、丽莎·纳什和妮可·怀特在编辑这篇文章方面做得很出色。

婚姻敦促该运动继续追求非婚姻权利和承认，包括家庭伙伴关系，以此作为使每个人的婚姻中心化的一种方式。今天婚姻平等倡导的批评者指出，这段历史已经失去了值得复垦的过去。他们认为，今天的以婚姻为中心的运动，将关系引向传统形式，将那些不符合婚姻模式的人边缘化。这些批评家认为，运动倡导者不应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而应该恢复他们早期的根基，拥抱多元化的家庭模式和婚姻之外的亲密关系。

这篇文章挑战了今天关于婚姻在 *LGBT* 倡导中的作用的争论的假设。它通过揭示婚姻的中心地位，即使在 *LGBT* 倡导者完全在婚姻之外工作并建立非婚姻制度的时候也是如此。本文通过对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加利福尼亚家庭伙伴关系工作的个案研究，揭示了非婚姻倡导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是对话的。婚姻塑造了 *LGBT* 对非婚姻认可的倡导，这反过来又塑造了婚姻。为了获得对非婚姻权利和利益的支持，倡导者将同性关系视为婚姻，并在婚姻方面建立了家庭伙伴关系，从而重新记录而不是抵制婚姻的中心地位。然而，同时，这种非婚姻的倡导促成了一种以成人浪漫关系、相互情感支持和经济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婚姻模式——一种能够包括同性伴侣的婚姻模式。

在 *LGBT* 的早期宣传中重温这段时间，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前以婚姻为中心的时刻。通过揭露婚姻是如何支持非婚姻认可的，案例研究表明了逃避婚姻监管的难度，从而挑战了在 *LGBT* 倡导中规避婚姻的规范性和规范性主张。通过展示婚姻倡导者如何在婚姻之外的空间塑造婚姻的意义，它揭示了非婚姻倡导是如何为今天的婚姻平等法学奠定基础的。

导言 89

- I. 搭建舞台：人口变化，法律反应，以及围绕婚姻、家庭和性的动员 94。
- II.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走向婚姻前后的运动 104
 - A. 通向婚姻的路 104
 - B. 强调反对婚姻的案例 108
- III. 加州案例研究：非婚姻认可，婚姻和同性伴侣 112。

- A. 家庭伙伴关系的起源——婚姻等价与性取向平等114
 - B. 早期的家庭伴侣诉讼——将同性关系定义为类似婚姻的121。
 - C. 婚姻家庭事务专案组工作——关于婚姻家庭关系的检讨125
 - 1. 洛杉矶126
 - a. 家庭多样性工作队126
 - b. 婚姻状况歧视消费者工作队130
 - 2. 国家级工作:立法机关的联合选拔任务
改变家庭的力量132
 - 3. 旧金山135
 - a. 恢复国内合伙企业135
 - b. 市长家庭政策专责小组139
 - D. 《婚姻和非婚姻规范的桥梁: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建立家庭伙伴关系142》
 - 1. 旧金山143
 - 2. 洛杉矶144
 - E. 私营部门的家庭伙伴关系——同性伴侣和婚姻等价物146
 - F. 后贝赫尔世界的国家国内伙伴关系149
 - 1. 植合问题——婚姻和家庭伙伴关系150
 - 2. 国内合伙突破(部分)152
- IV. 重新思考反对婚姻的案例154
- A. 反婚姻案(辩护)154
 - B. 加利福尼亚的经验教训160
- V. 对婚姻问题的更细致入微的看法163
- A. 婚外婚姻的形成163
 - B. 今天的婚姻案例165
- 结论171

引言

如今,婚姻似乎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LGBT)运动的同义词。

U.S.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Windsor*和

1. 虽然我在这篇文章中通常使用“LGBT”这个词,但我注意到那些被称为“LGBT宣传”的工作并不一定符合整个LGBT群体的利益。此外,我认识到,我使用这个共同的当代术语来描述在更早的时代的工作。因此,在案例研究的不同阶段,我使用“同性恋”一词来反映当时的特征。比如,香农·普莱斯敏特,变性人有没有梦想过同性恋权利?关于变性人融入的现实,变性者权利141,145-46 (Paisley Currah等人编,2006年)。

2. 133 S. Ct. 2675 (2013).

霍林斯沃思Perry³强调， LGBT的倡导者和选民已经将婚姻作为运动的优先事项。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多年前—在夏威夷最高法院1993年在 Baehr 诉 Baehr一案中的判决之前。Lewin⁴将同性婚姻推向全国，并迫使 LGBT领导人直接结婚——倡导者们对该运动是否应该追求婚姻进行了辩论。事实上，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拒绝婚姻，并试图抵制和破坏婚姻作为家庭认可和性管理的模式。

在当今以婚姻为中心的时代，反对婚姻运动的批评家们清楚地表达了早期意识形态对婚姻的反对。他们认为，今天的倡导者并不主张家庭多元化和性自由，而是将同性伴侣限制在婚姻和职位婚姻的范围内，作为权利和利益分配的适当机制。在这一观点下， LGBT主张重新记录婚姻的权力和声望，并将不符合婚姻模式的家庭和性别关系边缘化。

许多批判性的学者认为，那些拥护者仍然致力于反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婚姻，现在的情况将大相径庭。⁶与婚姻相比，婚姻对家庭权利和亲密关系的社会意义更为重要，其重要性要小得多。在提出该等主张时，这些学者强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工作是如何遭到反对的。

3. 133 S. Ct. 2652 (2013). 关于佩里一案的诉讼情况，见 Douglas NeJaime, *The Legal Mobilization进退两难*, 61 EMORY L. J. 663 (2012)。

(四) 852 P. 2 d 44 (Haw. 1993)。

5. 参见 PETITE MORT 156中的 Katherine Franke、《公共性爱》、《同性婚姻》和《同性恋恐惧症的来生》，158 (Carlos Motta& JonathanLubin-Levy eds., 2011年)[以下为《弗兰克》、《公共性行为》、《同性婚姻》和《仇视同性恋的来世》](争辩道，在婚姻平等案件的摘要中介绍了一部由亲属无关、浪漫而非性的人物制作的动画作品”); Katherine (音译)

弗兰克, 《同性婚姻政治》, 15 COLUM. J. 性别与 L. 236, 242 (2006) [下称 Franke, *The Politics of同性婚姻政治*] (主张在同性婚姻的支持者提出的一些核心论点中，“婚姻被视为理想的社会形态，其中负责任的生育能够并且应该发生”); Melissa Murray, 《婚姻作为惩罚》, 112 COLUM. L. REV. [以下简称 Murray, 婚姻作为惩罚] (“婚姻平等运动确定的自律、纪律严明的原告表明……. 将[婚姻与犯罪之间的空间]从国家对性和性行为的监管转变为对该监管项目的吞并。”); 梅丽莎·默里, 《新私生子的新特性?》, 20 AM. 联合王国性别问题委员会[以下简称 Murray, 新私有制的新特点是什么?](辩称与“单亲家庭、包括或依赖大家庭或虚构亲属的家庭、城市‘部落’的朋友和多情团体(仅举几个例子)”的共同立场, “倡导者已将同性夫妻与“有意选择非婚姻生活的不正常家庭”区分开来); 南希 D. Polkoff, 《终止我们所知的婚姻》, 32 HOFSTRA L. REV. 201 , 203 (2003) (“通过不断地抨击将同性伴侣排除在婚姻利益和义务之外的不公正行为, [婚姻平等]运动可能在不经意间巩固了已婚和未婚的差别待遇。”)

6. 见下文第四部分 A节。

婚姻，婚姻更具体地说，他们指出，在贝赫尔之前，国内伙伴关系政策激增，这是破坏婚姻稳定的运动取得成功的证据。在这种观点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标志着 LGBT工作的显著规范—而不仅仅是战略性的转变；倡导者不仅改变了策略，还重塑了运动政治。这些批评家中的一些人敦促今天的倡导者重塑前贝洱时代，并相应地减少婚姻在当代 LGBT宣传中的作用。

这篇文章挑战正在进行的关于 LGBT宣传和婚姻的学术辩论的假设。通过重温今天的批判性评估所依赖的早期时代，它揭示了婚姻在婚姻成为运动日程的正式组成部分之前的中心地位。通过对以加利福尼亚为基础的代表非婚姻关系，特别是家庭伙伴关系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宣传的案例研究表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在贝尔和随后的婚姻宣传之前，婚姻形成了非婚姻承认，相反，非婚姻承认形成了婚姻。最终，LGBT在婚姻之外以重要的方式工作，而不是反对我们今天看到的婚姻。

7 即使婚姻倡导者希望破坏婚姻的稳定，有些人的确希望这样做，但他们也受到法律、政治和文化框架的制约，这种框架在承认家庭关系和性关系方面优先考虑婚姻。政府行为者、雇主、保险公司和反动势力呼吁婚姻理解并制定针对非婚姻家庭的家庭伙伴关系和其他措施。因此，许多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自愿使用婚姻来为非婚姻承认进行辩论和定义。这些倡导者代表了那些将婚姻视为法律和文化问题的选民。归根结底，人们常常记得工作破坏了婚姻的稳定，并优先考虑婚姻的关键因素。

然而，婚姻并不只是约束拥护者和定义非婚姻的承认。相反， LGBT的倡导者通过诉诸婚姻规范来获得非婚姻支持，从而促成了一种能够包括同性关系的上升的婚姻模式。通过强调成人的浪漫关系、相互的情感支持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而不是性别分化、生育性和生物学上的男女双亲教育，两者都塑造了婚姻的意义——婚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并且找到了同性伴侣在这一转变意义上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通过婚姻之外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

这篇文章不仅试图填补历史记录，而且也试图揭示当前的时刻及其与正在进行的关系。

7. 我很感谢简·沙克特提出的锚定图像。

8 考虑到最高法院最近的干预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同性婚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来理解限制婚姻之路的力量以及同性伴侣对婚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同性伴侣对婚姻的影响。从婚姻抗拒的角度来看早先的非婚姻宣传既掩盖了婚姻作为婚姻外工作的锚定原则的作用，也掩盖了非婚姻宣传对当代婚姻模式的贡献，而这一模式是由今天的倡导者提出并在温莎采纳的。因此，这篇文章的历史记录表明，对婚姻平等工作的有影响力的批评常常把太多的代理归咎于 LGBT 倡导者，这意味着倡导者只要努力就能摆脱婚姻的权力。这些批评给了拥护者太少的信任，掩盖了他们的工作影响婚姻的方式。最后，这篇文章对非婚姻空间中 LGBT 工作的考察展示了婚姻的监管范围，同时也揭示了婚姻本身的内容是如何产生的。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述了1980年代 LGBT 在加利福尼亚的非婚姻倡导活动的历史背景。它特别关注二十世纪下半叶亲密关系的变化、围绕家庭的动员以及左右两派的性行为，以及不断变化的法律和政治条件。在此背景下，第二部分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中婚姻倡导的轨迹进行了标准描述。报告重点讨论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婚姻外工作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婚姻为中心的工作之间的区别。然后，报告特别关注这一历史，这一历史在当代婚姻平等倡导批评家中十分流行，强调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非婚姻承认与对婚姻的意识形态抵制之间的关系。对这场运动历史的解读往往将婚外工作等同于反对婚姻的工作。

第三部分构成了文章的核心，提供了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以加利福尼亚为基础的关于承认非婚姻关系，特别是家庭伙伴关系的工作的案例研究。

8. 参见 Christopher L. Tomlins, 《拓展的边界:一个世纪的法律历史》，收录于美国历史编纂史78, 89 (James M. Banner Jr. 编辑, 2010年) (“[H] Istory对法律的承诺。在于将人们更好地理解的法律过去与法律的存在结合在一起。”)

9. 见考特妮·梅根·卡希尔, 《边缘的管理:非传统的亲属关系与亲密和家庭生活的法律规定》，54 ARIZ. L. REV. 43、47 (2012); Ariela R. Dubler, *Wifely行为:代理婚姻法史*, 100 COLUM. L. REV. 957, 961 (2000).

10. 斯科特·卡明斯和我在1999年至2008年间为加州婚姻平等宣传工作撰写了一篇文章。见斯科特·L·卡明斯和道格拉斯·NeJaime, 《婚姻平等律师》57 UCLA L. REV. 1235 (2010). 这篇文章为1980-1999年间的时代做了类似的工作，尽管有不同的规范目标。案例研究采用了社会运动视角。类似的奖学金，请参阅 William N. Eskridge Jr., 《基于身份的社会的一些影响》

本部分通过特别工作组报告、地方性法规、选举资料、市政研究、会议纪要、公众证词、州立法、雇主政策、保险决定、司法判决、法律概要、倡导者的陈述和媒体报道等档案资料，本部分提供了一个历史记录，揭示了早期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中婚姻的中心地位。11对早期地方行动主义的仔细分析——在大多数关于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的著作中缺失的描述——12——产生了对非婚姻承认的轨迹及其与婚姻的关系的更准确的理解，同时通过提供一份家庭伙伴关系谱系，填补了文献中的一大空白。

通过揭露婚姻对社会运动的力量和塑造婚姻的运动的力量，这篇文章的案例研究对几次谈话都有启示。它谈到了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中婚姻倡导的地位、法律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以及婚姻本身的历史。因此，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析了加州案例研究对现存学术辩论的影响，首先探讨了反对婚姻的案例，然后探讨了反对婚姻的案例。第四部分表明，案例研究挑战了对当代婚姻平等工作的批判所依据的历史假设。通过揭露婚姻对非婚姻倡导的强大监管作用，这使得当前 LGBT组织中规避婚姻的规范性和规范性主张更加复杂。第五部分表明，在挖掘婚姻之外的空间方面，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男女同性恋倡导者都将同性关系构建成类似婚姻的关系，并有助于形成能够容纳同性伴侣的婚姻规范。通过这样做，倡导者为今天的婚姻要求奠定了基础，当代婚姻平等法学，包括最近的温莎判决，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本条并未直接涉及案例研究对法律和社会变革辩论的影响，但《结论》简要地指出了为这些辩论提出的问题。

二十世纪密歇根州立宪运动，100密歇根州立法院。L. REV. 2062, 2065–66 (2002); Robert Post& Reva Siegel, 《作为政治实践的原创性:权利的活宪法》，75 FORDHAM L. REV. 545 , 570 (2006); Reva B. Siegel, 《宪政文化、社会运动冲突与宪政变革:事实上的 ERA案例》，加利福尼亚州94。L. REV. 1323, 1329 (2006).

11. 在一些情况下，有必要进行面谈，以补充相关的档案来源。
12. 大卫·钱伯斯和芭芭拉·考克斯的作品是重要的例外。钱伯斯和考克斯都分析了当地支持非婚姻同性关系的努力。参见大卫·钱伯斯，《两个城市的故事:艾滋病与家庭伙伴关系在旧金山和纽约的法律承认》，2 LAW& SEX 181, 182–99 (1992); Barbara J. Cox, Barbara J. Cox, 《另类家庭:通过诉讼、立法和集体谈判获得传统家庭福利》。WOMEN L. J. 1, 33–39 (1986)。

I.

设定阶段:人口变化、法律对策和
围绕婚姻、家庭和性的动员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关于非婚姻承认的宣传没有写在白板上。为了理解1980年代加利福尼亚国内伙伴关系运动出现的背景,本部分将我们置于更早的时间点,涵盖国家范围内的发展,并包括LGBT运动以外的动员。二十世纪下半叶,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应的法律发展和强有力的动员重塑了围绕家庭和性的规范。亲密关系的深刻变化挑战了传统,助长了左翼的社会运动,但最终遭到了强烈的反驳,试图恢复传统的家庭形式和性行为。下面的讨论不是详细说明这些事态发展,而是试图为作为本条核心内容的国内伙伴关系工作提供必要的背景。它让我们看到了LGBT倡导者所享受的机会和他们和左翼其他人一样所面临的限制。显然,国内伙伴关系宣传与下文所述更广泛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受益于进一步挖掘。

现代LGBT运动通常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十年见证了左翼运动围绕种族、性别、性表达、反战政治和经济正义组织起来的强大挑战。更具体地说,围绕性别平等和性自由的更多动员抓住并推动了美国人亲密生活巨大变化。13 获得口服避孕药具为广大妇女提供了对生殖的更大控制权,这意味着她们的性生活和工作生活都有了更大的自由。14计划生育组织的领导人加入医疗机构,挑战禁止避孕的法律后,美国最高法院于1965年废除了适用于已婚夫妇的这一法律¹⁵——有效地赋予了已婚夫妇非生育性行为的权利。1972年,最高法院将这些隐私保护扩大到未婚个人,挑战了婚姻作为国家认可的性道德的标志。

-
13. 参见STEPHANIE COONTZ, *婚姻, A HISTORY* 249 (2005)。
 14. 参见ID; NANCY F. COTT, *PUBLIC VOWS* 202 (2000)。
 15. 格里斯沃尔德康涅狄格州, 381U.S. 479 (1965)
 16. 艾森施塔特诉Baird, 405U.S. 438 (1972); 见COTT, 上注14, 第199页; Melissa Murray, 《奇怪的同床异梦者:刑法》、《家庭法》和《亲密生活的法律构建》, 94 IOWA L. REV. 1253, 1298 (2009); 另见Robin West, *Integrity and Universal: 《对罗纳德·德沃金自由定律的评论》*, 65 FORDHAM L. REV. 1313, 1325 (1997)。不过,韦斯特辩称,通过从植根于“家族权威和自治权”的权利中获得“个人性自由”,法院“掩盖了唯一真正原则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含义”

非婚生性行为变得更加普遍和不那么受歧视，未婚、同居和不同性别的夫妇数量戏剧性地上升。

现代 LGBT运动就是在这种异性恋生活中性自由增加的背景下出现的。尽管石墙运动在1960年代经历了内部激进的挑战，为后石墙时代的对手奠定了基础，但在石墙运动之后，随着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与其他新左翼运动找到了共同的事业，同性恋解放的激进政治成为同性恋动员的普遍活跃原则。

成立于石墙事件后的同性恋解放阵线（“GLF”）在其1971年反对植根于婚姻家庭的性别和性观念的宣言中指出：“对同性恋者的压迫始于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即家庭[，]，家庭由负责男子、作为其妻子的奴隶及其子女组成，他们强迫自己成为理想的模范。20 因此，GLF活动家拉尔夫·霍尔（Ralph Hall）宣布，与其拥抱婚姻，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应该“攻击婚姻制度”。21位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还表达了对婚姻和异性恋家庭的激进批评。221970年激进主义者的声明《妇女身份识别的妇女》认为婚姻和异性恋更普遍地构成了一种通过从属关系定义妇女的关系。

在 Griswold 和 Eisenstadt 之后——已婚人士和单身人士享有宪法保护的从事非生殖性行为的权利的原则。西边，在1325年前。另一方面，对这些决定的进步性质产生怀疑，参见 MARC STEIN，《性不公正：最高法院从 GRISWOLD TO ROE 48-49 (2010) 的判决》。另加对这些案例“性权利”的批判性审查参见 David B. Cruz 的《性自由案件》？：避孕、堕胎、禁欲和宪法(35 HARV). C. R. C. L. L. Rev. 299 (2000).

17. 参见 CYNTHIA GRANT BOWMAN, 《未婚夫妇、法律和公共政策》93-97 (2010)。
18. 参见 JOHN D' EMILIO, 性政治, 性社区158-75 (1983年)。虽然石墙经常被认为是运动的火花，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动员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1950年代形成的马塔克涅协会和女儿的比利蒂斯。
19. 在石墙上，见第231-32页；又见琳达·赫希曼，《胜利：胜利的同性恋革命》107-08 (2012)；伊丽莎白·A·阿姆斯特朗和苏珊娜·M·克雷奇，《运动与记忆：石墙神话的形成》，上午71:00。有机碳酸钙转速。724, 744 (2006)。关于从前石墙到后石墙法律组织的转变，见帕特里夏·凯恩，《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权利提起诉讼：法律历史》，79 VA. L. REV. 1551, 1558-89 (1993)。
20. 同志解放阵线，宣言1 (1971年，1978年修订)，可在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pwh/glf-london.asp>。
21. 拉尔夫·霍尔，《教会、国家和同性恋：激进分析》，《同性恋权力》，不。14, 1970.
22. 参见 NANCY D. POLIKOFF, BEYOND (异性恋和同性)婚姻19 (2008)。
23. 见 RADICALESBIANS, 女性识别的女人，转载在同性恋火焰小册子 NO.2 (1970) (“作为我们提供精神服务和履行社会非营利性职能的交换，该男子只授予我们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眼中，使我们成为合法的奴隶地位。”)

然而，一些同性伴侣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系列诉讼中开始质疑他们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问题——在 LGBT运动拥有强大的公共利益法律基础设施之前。25明尼苏达州同性伴侣杰克·贝克(Jack Baker)和迈克尔·麦克康奈尔(Michael McConnell)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了他们的婚姻诉讼。26明尼苏达州高等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理由是“婚姻制度是一种男女结合的制度，涉及在一个家庭中生育和抚养子女的独一无二的事情，它和《创世纪》一样古老。”27在1972年的一份单行命令中，最高法院驳回了这对夫妇的上诉，“因为缺乏实质性的联邦问题”²⁸。

尽管这些婚姻诉讼传统上被理解为与同性恋解放正相关，但29次围绕婚姻的动员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后石墙运动。正如威廉·埃斯克里奇(William Eskridge)和达伦·斯佩代尔(Darren Spedale)所述，1970年，特洛伊·佩里牧师(Troy Perry)牧师在洛杉矶的宗教仪式上与同性伴侣结婚。1972年，全国同性恋组织联盟抗议法律“限制性别或人数”。

24. 参见 *Jones v. Hallahan*, 501 S. W. 2 d588, 590 (Ky. Ct. App. 1973); *Singer v.原522 P. 2 d 1187, 1197* (Wash. Ct. App. 1974)。威廉·埃斯克里奇(William Eskridge)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对同性伴侣的婚姻要求给予了大量关注，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婚姻诉讼。见 WILLIAM N. ESKRIDGE JR., *EQUALITY PRACTICE* 6–9 (2002) [以下简称 ESKRIDGE, *EQUALITY PRACTICE*]；WILLIAM N. ESKRIDGE JR. 斯佩代尔，《同性婚姻案例:从性自由到文明承诺44–49》，54–57 (1996) [以下简称 ESKRIDGE, 《同性婚姻案》]。简·沙克特还指出，“他的历史将把1993年作为关键的开端日期。”事实上，就在石墙起义后的几年里。. 第一起婚姻平等诉讼被提起。”简·沙克特，《婚姻辩论的意义》，91 TEX. L. REV. 1185, 1188 (2013) (《从壁橱到祭坛:法院、反对和为同性婚姻而进行的斗争》(2013年))；另见 Jane S. Schacter, 《法院与抵制的政治:婚姻平等诉讼》，*当时和现在*, 第82 S. CAL. L. REV. 1153, 1212–13 (2009) [以下简称“沙克特，法院与反对的政治”]。

25. 见 Cummings& NeJaime, 上注10, 1248。Lambda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成立于1973年。历史，LAMBDA LEGAL, <http://www.lambdalegal.org/aboutus/history> (上次访问时间2013年10月23日)。其他领先的 LGBT法律组织兴起于整个70年代末和80年代。

26. 见贝克。Nelson, 409U. S. 810 (1972)要获得有洞察力的叙述，请参阅玛丽·安妮·凯斯，《美国明尼苏达州89号婚姻证书》。L. REV. 1758, 1761–64 (2005)。

27. 见 *Baker v. Nelson*, 191 N. W. 2 d 185, 186 (明尼苏达州1971年)

28. Baker, 409U. S. 810。

29. 历史学家 George Chauncey解释说：

从同性恋解放的早期开始，一些活动家就要求结婚。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他们认为同性恋解放者联合起来谴责婚姻是一个不可信的父权制度。但是同性恋解放年代混乱的复杂性和强烈的政治化是他们如此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部分原因。

乔治·昌西，为什么要结婚?形成今天关于同性恋平等争论的历史89 (2004)。

30. ESKRIDGE& SPEDALE, 上注24, 16。

31 此外，在出现婚姻诉讼的社区，许多人认为这些诉讼既符合激进的同性恋政治，也符合对婚姻的批评。32事实上，贝克和麦康奈尔暗示他们的诉讼可能会使婚姻“颠倒过来”。33考虑到当时女权主义者攻击婚姻的性别观念很强，同性夫妇要求结婚对婚姻的性别差异性内容构成了强有力地挑战。

一些立法者对同性婚姻的威胁做出了明确的反应，将婚姻的不同性别要求明文规定。在加利福尼亚，同性伴侣根据1971年的一项法定修改向县职员申请结婚许可证，删除了婚姻法的性别专用语言。这些尝试促使1977年通过了一项法定修正案，明确规定“抵达是一种产生于男女之间民事合同的个人关系”。

与 LGBT活动家一样，女权主义者也对婚姻及其在动员中的作用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红袜党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团体，与石墙骚乱同年成立，他们声称婚姻使妇女成为“家庭佣人”和“繁殖者”。36然而，尽管激进活动家对婚姻提出了强有力地批评，但其他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在婚姻、家庭和争取两性平等等方面将更平等的关系联系起来。37人口和经济的变化促成了婚姻中男女关系的变化。到1970年代，新就业妇女的大多数是

31. ESKRIDGE, 同性婚姻案例, 前注24, 54 (引用1972年2月全国同性恋组织联盟的要求(第8号国家要求))。

32. 参见《哈芬顿邮报》(2013年7月23日下午4:17)《同性婚姻是激进的时候》(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boucai/time-gay-marriage-was-radical_b_3636437.html)。

33. 见 *ID*。

34. 参见 *ID*; 另见黛博拉·A·维迪斯, 《改变婚姻方程式》, 89 *WASH. U. L. REV.* 721, 771-72 (2012)。

35. 卡尔·奇夫语法典§4100 (西1977年)(1993年废除, 将婚姻定义移至《家庭法典》第300条)。

36. 参见红袜宣言(1969年), 网址为 http://www.redstocking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6&itemid=59; 又见Rebecca

《性权利:婚姻强奸豁免的法律历史》, 20 *J. L. & SOC. INQ.* 941, 975 (1995)。

37. 见 COTT, 上注14, 在204-05; POLIKOFF, 上注22, 在19。这些改革者, 包括著名的非洲裔美国女权主义者, 利用民权运动在法律和文化上的斗争来构筑性别歧视。参见 SERENA MAYERI, *RACE* 3, 22-24 (2011); Siegel, 上注10, 第1376页。当然, 民权运动也参与了婚姻。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于1948年裁定该州的跨种族婚姻禁令违宪。见佩雷斯·夏普, 198 *P. 2 d 17* (Cal. 1948)其他州的立法机构已经废除了他们的限制。参见 RACHEL F. MORAN, 《种族间亲密关系:种族和浪漫规范》84 (2001)。但直到1967年, 律师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 最高法院的爱诉。弗吉尼亚决定388 美国1号(1967)。正如 Rachel Moran所解释的, “爱不仅利用了不断变化的种族意识形态, 也利用了性和婚姻自由的转变。”雷切尔 F. 莫兰, 爱一个真正的陌生人:什么反通婚法律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种族, 性别, 婚姻的意义, 32 *HOFSTRA L.* 1663, 1678 (2004)。

401970年，全国妇女组织(“NOW”)组织了一次四十个城市的罢工，活动人士要求批准联邦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堕胎权和免费托儿所，从而将性别平等与生殖权利和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联系起来41 (“NOW”)。

女权主义倡导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42，但他们最终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形成围绕 ERA的战斗。正如雷瓦·西格尔(Reva Siegel)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强大的保守派反动影响了左翼激进主义在家庭中的影响程度。ERA的反对者在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是菲利斯·施拉菲的 STOP ERA运动，认为 ERA通过颠覆传统的性别角色来威胁家庭。43施拉夫莱坚称，拟议的修正案是“反家庭”的，会贬低女性的重要照顾者角色，从而对女性造成伤害。44针对女权主义者以职业女性为中心的情况，施拉夫莱将女性视为“妻子和母亲”。

反 ERA势力不仅将修正案定为对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的威胁，而且还将 ERA与同性婚姻和堕胎联系起来，动员社会保守派反对这三种行为，认为这三种行为都是相关的罪恶。1977年在休斯敦召开的国际妇女节会议上，ERA的倡导者通过了一项敦促批准的提案，但其中包括一项声明，即“ERA不会对堕胎法产生任何影响。”47他们还强行否认电子逆向堕胎与同性婚姻之间的任何联系，即使是在

38. 见 Coontz, 上注13, 在259。

39. 见同上, 262。

40. 参见 ARLIE HOCHSCHILD& ANN MACHUNG, SECOND SHIFT 2-3 (1989)。

41. 见 Siegel, 上注10, 在

1375。42. 见 *id.* 1377-79年。

43. 见 *id.* 1391-92年。

44. 见 *ID.* 这些活动家在联邦政府中找到了发言权。当时是司法部律师的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认为，ERA的支持者“厌恶和厌恶家庭中男女之间的传统差异。”参见第1379页(引述助理总检察长 William Rehnquist的备忘录，参见总统特别顾问 Leonard Garment (1970年))。随着保守派活动家越来越多地动员到家庭周围，尼克松政府转向反对和削减女权主义进步的立场。见 *ID.* 1388-89。1971年，尼克松否决了本应建立全国日托网络的立法。利奥·P·里布福，《家庭政策过去作为序言:吉米·卡特》、《白宫家庭会议》和《新基督教右翼动员》23 REV. POL' Y RES. 311, 318 (2006)。

45. Siegel, 前注10, 1391年。

46. 见 *id.* 1390-93。

47. 参见 NAT' L COMM' N关于纪念国际妇女节、休斯敦精神:第一届全国妇女大会、向美国总统、大会和人民的正式报告51 (1978年)[以下是向总统提交的正式报告];另见 Serena Mayeri, 《宪法选择:法律女权主义和变革的历史动力》，加州92年度。L. REV. 755, 792 (2004)。

他们通过了另一项支持立法以消除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的法案，48 ERA的倡导者认为“ERA不会要求各州允许同性恋婚姻。. . [它]与性行为或同性别的人之间的关系无关。

Schlafly带领着一支人数众多、知名度很高的队伍，而她的50名追随者则在国际妇女大会上担任代表。他们编写了一份少数群体报告，宣称“家庭的定义绝不应以任何方式扩大到包括同性恋或生理上无关的未婚夫妇，或以其他方式赋予他们应有的丈夫和妻子的尊严”⁵¹对于社会保守主义活动家来说，在离婚、非婚姻同居和非婚姻育儿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可接受时，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权利构成了对婚姻家庭至上的更广泛攻击的一部分。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实行无过错离婚后，1970年代无过错制度在全国蔓延，促成了一种植根于浪漫关系和个人成就感的婚姻观。

48. 见给总统的正式报告，前注47，为51, 89。

49. 我，51岁。1969年和1970年，NOW的领导层反对将女同性恋权利作为该组织议程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女同性恋积极分子的压力下，该组织变得更容易接受。见POLIKOFF，上注22，在19。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通过抗议和成立自己的组织来挑战一些女权主义组织的同性恋恐惧症。见Hirshman，上注19，第113页；Nan D. Hunter, *Context of the Sex Discussion: A Chronology 1966-2005*, 载于《性战争:性异议与政治文化》15, 18 (Lisa Duggan& Nan D. Hunter eds., 2006)。

50. 参见Judy Klemesrud, 平等权利计划和堕胎在集会上遭到15,000人的反对，纽约时报，1977年11月20日，第32位。

51. 见致总裁的正式报告，上注47，第271 (1978)页。在她的著作中将性别平等与同性婚姻联系起来，Schlafly承认婚姻的变化使得它更有利同性伴侣。Schlafly认为，由于生育能力强的异性恋性行为不再像现在所允许的那样与“合法婚姻制度”有了“亲密关系”，国家无法为在后ERA时代排斥同性伴侣的行为辩护。Phyllis Schlafly, ERA和同性恋“婚姻”，8 *PHYLLIS SCHLAFLY REP.* 2 §2 (1974年9月)。此外，Schlafly还声称，“认为两个具有相同基本性特征的人不能从婚姻法律地位的许多情感、社会和法律后果中受益的观点是不真实的。”我。尽管施拉夫莱认为“将婚姻扩大到包括同性恋夫妇将改变传统观念中的基本制度的性质，”但她关于ERA和同性婚姻的推理反映了婚姻本身含义的转变。Schlafly建议，即使法院最终承认同性伴侣的“准婚姻”地位，将婚姻的一些合法利益延伸给他们，这样的地位也将维持“背离事实的耻辱”。我。她担心，如果电子逆向拍卖获得通过，法院将会拒绝这种耻辱。见ID。

52. 见COTT，上注14，在205。在二十世纪以前，分居允许配偶双方离开婚姻。在整个二十世纪，正式的离婚率开始上升。参见《美国的夫妻:历史》(2000年)第277页HENDRIK HARTOG。关于离婚前无过错制度，见劳伦斯·弗里德曼，《死亡语言:离婚法与无过错前的实践》，86 *VA. L. REV.* 1497 (2000)。

53. 参见安德鲁·J·切尔西，《美国婚姻的非制度化》，66 *J. 婚姻与家庭* 848, 852 (2004)；又见《韦斯特、婚姻、性和性别》3 (2007年) (“我可以离开婚姻，相对来说成本较低，这直接意味着婚姻的持续价值——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笔好买卖吗？”——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总是摆在桌面上，总是我可以而且应该与我的配偶反复地进行谈判和重新评估。”)；

大约在同一时间，法院开始执行婚前协议，54项协议标志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离婚，出现了更加私有化的、个人的、契约式的婚姻模式。55与此同时，非婚生子女同居的比率上升了56，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数量。57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推翻了基于“非法性”的区分，58项判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婚姻和父母之间的法律关系59个州的立法机关又修改了家庭法典，以消除婚姻和非婚姻儿童之间的区别。

尽管 ERA最初看起来很有可能成功，但 Schlafly反对 ERA的运动导致了它的失败。61 妇女权利倡导者说服法院消除婚姻和家庭中许多正式的基于性别的歧视，然而，正如 Siegel所表明的，由此产生的性别平等法也包括了 ERA反对者所施加的对生育和性行为的限制63宪法平等保护原则没有对怀孕歧视进行补救，堕胎权利受到隐私保护64。

威廉·埃斯克里奇，《家庭法多元化:菜单、默认和重写规则的指导选择机制》，100 GEO. L. J. 1881, 1955 (2012) (“[N]共同过失离婚改变了婚姻的基本性质—不仅破坏了婚姻是‘直到死亡我们分手’的愿望，而且还将婚姻改写为基于选择的关系。”)

54. 参见，例如，*The re Marriage of Dawley*, 551 P.2 d 323 (Cal. 1976); Posner诉波斯纳，233所以。2 d 381 (佛罗里达州1970年)

55. 见上注14 COTT, 第209页;另见 Andrew J. Cherlin, 《双亲家庭日益多样化:在十字路口的婚姻中对家庭法的挑战:法律、政策和二十一世纪家庭的勇敢新世界》287, 289 (Marsha Garrison& Elizabeth S. Scott eds. 2012); Sanford N. Katz, *Marriage as Partnership*, 73 NOTRE DAME L. REV.。 1251, 1257 (1998).

56. 见格雷斯·甘兹布隆伯格，同居没有婚姻:一个不同的角度，28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125, 1128-29 (1981)。

57. 见 COTT, 上注14, 在202-03。

58. 参见 *Quilloin v. Walcott*, 434U.S. 246 (1978); *Stanley* 诉伊利诺伊州, 405U.S. 645 (1972);路易斯安那州, 391U.S. 68 (1968); *Glona* 诉阿姆。担保& Liab。英斯。Co., 391U.S. 73 (1968);另见 *Coontz*, 上注13, 第257页。关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情境中的非法性的含义，见南希·D·波利科夫，《新的“非法性”:在保护女同性恋夫妇的孩子方面倒退20分钟》。联合国性别问题委员会油料 Y& L. 721 (2012)。

59. 不过，正如梅丽莎·默里(Melissa Murray)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决定以可能支撑婚姻的方式赋予了类似婚姻的关系特权。见 Murray, 关于新的私生子有什么新的东西?在注释5上，在393-99。

60. 然而，基于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和社会差别仍在继续。参见《非法伤害:法律、耻辱和对非婚姻儿童的歧视》，63 FLA. L. REV. 345 , 350-78 (2011)。

61. 见 Siegel, 上注10, 在1404-06。

62. 见，例如，*Orr v. Orr*, 440U.S. 268 (1979); *Weinberger* 诉 *Wiesenfeld*, 420U.S. 636 (1975年);另见 Nan D. Hunter, 《导言:同性婚姻的未来影响:更多问题多于答案》，100 GEO. L. J. 1855, 1864 (2012)。

63. 见 Siegel, 上注10, 第1407页。

64. 见 *Geduldig*诉。Aiello, 417U.S. 484 (1974); *Roe* 诉 *Wade*, 410U.S. 113 (1973)。

此外，1970年代的性别平等并未延伸至同性婚姻，正如最高法院对贝克的解雇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当然，ERA的失败并没有解决规范家庭和性行为的法律和文化规范之争。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传统家庭价值观”运动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力量。⁶⁶而不是仅仅利用对同性婚姻的恐惧来挫败女权运动，越来越多的运动专门致力于倒退同性恋权利进步。⁶⁷在1977年，安妮塔·布莱恩特的“拯救我们的孩子”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废除了佛罗里达州达德县的性取向反歧视条例。⁶⁸在达德县投票后的第二天，佛罗里达州州长签署了一项禁止同性恋收养的禁令。⁶⁹从那以后，科比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俄勒冈州的尤金和堪萨斯州的威奇托推动了废除同性恋法令的成功运动。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开始，白宫家庭会议展示了围绕家庭展开的激烈的文化和政治斗争。⁷¹“亲家庭”保守派担心，计划中的会议将为左翼活动家提供另一个推动会议议程的机会。⁷²然而，与其说抵制会议，不如说许多保守派参加了会议。1973年11月发表的会议报告证明了基督教右翼动员的影响。报告宣布，对于那些“传统家庭所关注的问题”，“听取了继承人的声音和投票”：“对家庭的传统定义是唯一采用的定义。”⁷⁴

大约在同一时间，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成为新右翼的主要候选人，⁷⁵人赢得了总统大选。

65. 见贝克。Nelson, 191 N. W. 2 d 185, 187 (明尼苏达州1971年)，认证驳回，409U. S. 810 (1972) (因缺乏实质性的联邦问题而被驳回)。

66. 参见 Matthew D. Lassiter, 《向右创造家庭价值观:使美国在1970年代保持保守》(Bruce J. Schulman& Julian E. Zelizer eds., 2008年)。

67. 参见 *ID*23-24; 另见莫顿·康德拉克，安妮塔·布莱恩特为同性恋者疯狂，新共和国，1977年5月7日，13岁。虽然科比没有参加1977年的休斯敦拉力赛，但她还是发了一段录像留言。参见 *Klemesrud*, 前注50。

68. 见 POLIKOFF, 上注22, 在40。

69. 见 *ID*。

70. 见同上, 42岁。

71. 1976年，时任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发誓要召开白宫美国家庭问题会议，但直到1980年才召开(重新贴标签)会议。见 *Ribuffo*, 上注44, 在311。

72. 贝弗利·拉哈伊于1979年创办了“关注美国女性”组织，她担心这次会议“旨在改变家庭的定义”。我, 325。

73. 在巴尔的摩、明尼阿波利斯和洛杉矶举行的三次全国会议包括了许多保守的基督教代表。见同上, 326。

74. 白宫家庭会议，倾听美国家庭的声音:80年代的行动，向总统、国会和全国家庭报告11 (1980年11月)。

75. 见 *Ribuffo*, 上注44, 330。

76 在当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采用了一个平台，令基督教右翼领导人高兴的是，该党誓言“保护并扞卫[]传统美国家庭”⁷⁷人，并任命“尊重传统家庭价值观和无辜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法官。⁷⁸在1984年里根连任时，该纲领保持了这种“亲家庭”的风格。⁷⁹新右翼领导人将“传统家庭价值观”与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继续摒弃福利国家，强调家庭的私人福利功能。

然而在里根政府时期，LGBT倡导者面临着一场破坏性的健康危机，需要政府的大力干预。1981年，医生们开始看到男同性恋者患上所谓的艾滋病。到1983年，疾病控制中心报告了“1,112人死亡和死亡人数统计”。⁸²联邦政府对此反应甚微，83岁的里根直到夺去了20,000名美国人的生命才发表了一次关于艾滋病的演讲。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使无数男同性恋者走出了秘密，团结了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支持一个共同的事业，并深刻地影响了男女同性恋运动的组织。

76. 正如琳达温室效应公司 (Linda Greenhouse) 和雷瓦西格尔 (Reva Siegel) 所示，共和党领导人成功地将新教福音派和天主教堕胎反对者团结在该党的“亲家庭”旗帜下。共和党战略家和共同创立传统基金会的天主教保守派保罗·魏里奇 (Paul Weyrich) 一起支持杰里·法威尔 (Jerry Falwell) 成立于1979年的道德多数。参见 Linda Greenhouse& Reva B. Siegel, *Before (and after) Roe诉韦德:关于反弹的新问题*, 120 YALE L. J. 2028, 2065-66 (2011); 另见 Robert Post& Reva Siegel, *Roe Rage: Democratic宪政和 Backlash*, 42 HARV. C. R. C. L. L. Rev. 373 , 420-21 (2007)。

77. 见 Ribuffo, 上注44, 330。

78. 见 Post& Siegel, 上注76, 420 n. 221。

79. 见 *ID*。

80. 见 Murray, 关于新的私生子有什么新的东西?上注5, 431。学者们还将共和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特别是对福利的攻击，与1965年莫伊尼汉报告对非裔美国家庭的病态化联系起来。参见 Maxine Baca Zinn, 《八十年代的家庭、种族和贫困》, 14 SIGNS 856 (1989)。备受争议的莫伊尼汉报告 (Moynihan Report) 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归咎于“家庭结构”，而这一“家庭结构”未能映射到父权婚姻形式。美国劳工部政策规划与研究办公室，黑人家庭:国家行动案例 (1965年3月版)，可在 www.dol.gov/oasam 上查阅

[/programs/history/webid-meynihanc.htm](http://www.dol.gov/oasam/programs/history/webid-meynihanc.htm)。

81. 见 HIRSHMAN, 上注19, 在189。

82. 我。

83. 里根在1983年举行了两次关于艾滋病的会议，其中一次会议的代表来自道德多数党。见同上, 176。宗教保守派阻止了性行为。见同上, 178。用纽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 的话，一些艾滋病病例表明“违背传统价值观的代价”。参见 Urvashi Vaid, 《虚拟平等:将同性恋解放纳入主流》69 (1995)。

84. 见 CHAUNCEY, 上注29, 第41页。尽管联邦政府在艾滋病流行的最初几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但随着旧金山和加利福尼亚州对新出现的危机投入资金，州政府和地方各级也出现了支持。见 HIRSHMAN, 上注19, 在185。

85. 见 HIRSHMAN, 上注19, 在183。

对性解放的政治提出质疑。正如国家同性恋特别工作组执行主任金妮·阿普佐所说，“艾滋病剥夺了我们的性解放，因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说，‘那杀死了你。’事实上，艾斯克里奇认为，艾滋病危机支持了建立长期、忠诚关系的冲动。⁸⁷另一方面，一些活动家对摆脱解放和默许性羞辱的态度提出了挑战。他们将预防艾滋病毒与庆祝同性性行为联系起来，尽管最高法院支持将其定为犯罪行为，但仍有88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许多州废除了反鸡奸法，而1986年法院在鲍尔斯诉鲍尔斯案中废除了89条。⁹⁰ 鲍尔斯和政府在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引起了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强烈抗议。⁹¹富有同情心的立法者和官员开始为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支持。

⁹³ 与此同时，1980年代有子女的女同性恋夫妇人数急剧增加，这也使人们对围绕家庭形成和承认的法律问题更加紧迫。⁹⁴生殖技术总体上对亲子关系的法律确定提出了新的挑战，⁹⁵但女同性恋母亲在确保父母权利方面尤其面临着障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提倡被压迫的法律概念，例如双亲收养，以实现非生物性同性恋共同父母的父母权利。

-
86. 见 VAID, 上注83, 68。
87. 见 ESKRIDGE, 同性婚姻案例, 前注24, 58岁。
88. 另见 VAID, 上注83, 85; 另见迈克尔·华纳, 《正常的麻烦:性、政治和同性恋生活中的道德准则》50–51 (1999)。
89. 参见 Christopher R. Leslie, 《制造罪犯:“未执行的”鸡奸法造成的伤害》, 35 HARV. C. R. C. L. Rev. 103, 106& n. 8 (2000)。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加州同意的成人法废除了该州对同性性行为的刑事禁令。小行星1975统计。131 –36年。
90. 478 美国186 (1986)号文件关于反鸡奸法如何使这个时代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者的歧视合法化, 请参阅 Leslie, 上注89, 135–68。
91. 见 HIRSHMAN, 上注19, 在188; 道格拉斯 NeJaime, 在失败中获胜, 96 IOWA L. REV. 941, 985–86 (2011)。
92. 见 HIRSHMAN, 上注19, 在192, 204。
93. 见 CHAUNCEY, 上注29, 在96–102。
94. 见第105–09页; 另见 CARLOS A. BALL, 《父母的权利: LGBT家庭和父母身份的转变》6–7 (2012年); Nancy D. Polikoff, 《这个孩子有两个母亲:重新定义父母身份以满足女同性恋母亲和其他非传统家庭中儿童的需要》, 78 GEO. L. J. 459, 465–66 (1990)。
95. 参看考特尼·G·约斯林的《美国家庭的进化》, 36 HUM. RTS. 2, 4 (2009)。如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立法, 法院就很难为通过生殖技术形成的家庭制定规则。1986年, 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拒绝执行违反公共政策的代孕协议, 这是出了名的, 但加州法院最终维持了这类协议, 并意图而不是生物学来确定亲子关系。与 Baby M. 537 A. 2 d 1227 (N. J. 1988)进行比较, Johnson诉Calvert, 851 P. 2 d 776, 784 (Cal. 1993)。
96. 见 Polikoff, 上注94, 在466–67; 另见 CHAUNCEY, 上注29, 在109–10。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转向了 LGBT对关系认可的宣传。正如这一简短的探索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由于与婚姻和非婚姻异性关系有关的规范、人口结构和法律改革的变化，规范家庭和性行为的法律越来越有利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生活。⁹⁷ LGBT倡导者们尽可能利用这些变化来推动他们的事业。与此同时，鼓吹者也受到了同样的反动员的限制，这些动员反过来反对女权主义、性自由和生殖权利。LGBT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不久，它就面临健康危机，需要迅速而有力的应对。同性恋、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对非婚姻认可的宣传如何符合这一更广泛的轨迹，在许多方面都是本文的核心。

二。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转向婚姻前后的运动

LGBT法律主张中婚姻轨迹的标准描述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具体表现为运动内部和外部与夏威夷 Baehr 诉讼有关的变化。在贝尔之前，一些支持者出于战略和务实的原因拒绝追求婚姻。另一些人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而拒绝结婚。因此，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 LGBT领导人就该不该将婚姻视为长期目标展开了争论。即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也追求权利和承认非婚姻关系，包括通过家庭伙伴关系。最终，贝尔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婚姻运动内部的辩论，因为倡导者被迫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婚姻问题上。

这一部分首先概述了 LGBT运动中婚姻的标准描述。然后讨论了一些学者，特别是当代婚姻平等倡导的著名批评家，如何在贝赫尔面前阐明这段强调意识形态而不是务实地反对婚姻的历史。因此，他们普遍认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婚外工作是反对婚姻的原因之一。

A. 通向婚姻的道路

虽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左右两党的社会运动都直接参与了婚姻，⁹⁸ 有组织的 LGBT运动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寻求婚姻权利。相反，律师寻求非婚姻承认，包括家庭合伙，

97. 见 Cherlin, 上注55, 参看苏珊娜·戈德伯格, 为什么结婚?
《十字路口的婚姻》, 前注55, 为224, 237。

98. 参见上文第一部分。

在此期间， LGBT的主要法律组织的律师警告说，不要对婚姻法律提出诉讼。

虽然一些运动领导人出于务实的原因反对结婚，但另一些人则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反对结婚。101因此，倡导者在 LGBT议程上大力辩论婚姻的规范地位。1989年，兰姆达法律部的法律总监保拉·埃特尔布里克和该组织执行董事汤姆·斯托达德之间开创性的交流为这一问题制定了框架。102斯托达德认为，这场运动应该追求婚姻，以此作为实现真正平等的途径。103另一方面，埃特布里克拒绝以婚姻为目标。104 Ettelbrick敦促婚姻倡导者继续沿着家庭伙伴关系的道路走下去，以取代婚姻。105. Ettelbrick说，婚姻的转向将集中在同化目标上，将这一事业捆绑在一个性别等级森严的机构上，并边缘化弱势 LGBT家庭。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同性伴侣对夏威夷婚姻法提出质疑，但运动内部关于婚姻规范重要性的争论仍在继续，明确反对运动领袖的建议。107 Lambda Legal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律师敦促原告抵制提起诉讼的诱惑。只有当案件发生时

99. Eskridge和 Darren Spedale解释说，“同性恋激进分子支持或默许[家庭伙伴关系]，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新颖的非婚姻家庭形式，”“大多数同性恋自由主义者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减少了男女同性恋夫妇之间的形式不平等。”ESKRIDGE& SPEDALE, 上注24, 第18页。

100. 关于这一点，参见ID.15-18; ESKRIDGE, EQUALITY PRACTICE, 上注24, 收于5; David L. Chambers, 《夫妻:婚姻、公民联盟和家庭伙伴关系》，载于《创造变革271, 282-89》(John D'Emilio等人编, 2000年); Carlos A. Ball, 专题讨论会:更新 LGBT关于同性婚姻的社区内辩论:导言, 61 RUTGERS L. REV. 493、495-97 (2009); William N. Eskridge Jr., 《同性婚姻史》，79 VA. L. REV. 1419, 1489 (1993); Arthur S. Leonard, *To the Brass Ring: The case for the同性婚姻*, 82 CORNELL L. REV. 572 ,579 (1997) (审阅 ESKRIDGE, 《同性婚姻案例》，前注24); Jane S. Schacter, 《其他同性婚姻之争》，84CHI-KENT L. REV. 379, 394 (2009).

101. 参见 CARLOS A. BALL, 从壁橱到第164 (2010)号审判室(“不愿意追求同性婚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语用学的 . . . 第二项反对意见是意识形态而非务实的。”);另见 *Eskridge*, 上注53, 1936年(“20世纪80年代初，同性恋婚姻在政治上并不可行，但同性恋权利领袖制定了另一项战略，以确保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关系，即在市镇一级通过的家庭-伙伴关系法令，在那里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政治权力最大。

102. Eskridge 和 Spedale将这一争论与丹麦1989年的《注册合伙企业法》(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联系起来，该法案赋予了同性伴侣大部分的婚姻权利。他们解释说，“美国同性恋权利领袖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优先事项。”ESKRIDGE& SPEDALE, 上注24, 第18页。

103. 参见托马斯·B·斯托达德, 《为什么同性恋者应该寻求结婚的权利》，1989年秋季, 9岁。

104. 见保拉·L·埃特布里克, 《从什么时候婚姻是一条解放之路?》，1989年秋, 第14页。

105. 见 ID。

106. 见注49上的亨特, 第11-12页。

107. 见 Cummings& NeJaime, 上注10, 1250。

Lambda Law是否通过提交一份友情摘要承担了正式的角色。

夏威夷最高法院1993年令人惊讶的贝尔判决被认为是现代同性婚姻之战的开端。¹⁰⁹发现婚姻法构成了基于性别的分类，法院将此案发回重审，要求适用最严格的国家宪法审查标准¹¹⁰这一裁决将婚姻变成了一个日益现实的目标。Lambda Legal于次年成立了其婚姻项目。

在 LGBT运动之外， Baehr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反动员运动，试图阻止同性伴侣结婚。1996年，国会通过了《扞卫婚姻法》第113条。第二年，夏威夷的立法机关投票通过了1998年11月的一项宪法修正案，授权立法机关限制不同性别夫妇的婚姻。与此同时，立法机关制定了一项“法律保护”制度，将有限的权利和利益扩大到同性伴侣和其他对合法被排除在外的血亲，如直系亲属。¹¹¹名夏威夷选民最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¹¹²当初审法院发回重审时认为婚姻法违宪时，¹¹³州最高法院根据介入的修正案撤销了这一裁决。

Baehr在 LGBT运动通向婚姻之路的主要报道中占有重要地位。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后贝赫尔时代的景象明确了支持和反对婚姻的运动路线之间的区别。如 Carlos Ball所解释：

108. 参见 MICHAEL J. KLARMAN, 《从壁橱到祭坛:法院、反对意见和争取同性婚姻的斗争》55 (2013)。在夏威夷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Lambda Legal，特别是 Evan Wolfson成为本案的代理律师。见 ELLEN ANN ANDERSEN, 《走出私密空间与法庭:法律机会结构与同性恋权利诉讼》179 (2005)。Wolfson是早期婚姻的支持者，在诉讼的早期阶段曾提供非正式的帮助。

109. 参见，例如， Schacter, 前注100，在380。1990年12月，这对夫妇申请了结婚证，并于1991年5月提起诉讼。初审法院在1991年10月做出了有利于该州的裁决。参见 Michael D. Sant' Ambrogio& Sylvia A. Law, Baehr诉列文与通往婚姻平等的漫长之路, 33 U. L. REV. 705 , 705-10 (2011)。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特区的一对同性伴侣也对被排除在婚姻之外提出质疑。埃斯克里奇担任顾问。见 Leonard, 前注100, 575。一个支离破碎的上诉法院最终驳回了这一要求。院长哥伦比亚特区, 653 A. 2 d 307, 309 (D. C. 1995)。

110. Baehr诉Lewin, 852 P. 2 d 44 (Haw. 1993)。

111. 见 KLARMAN, 上注108, 第176页。

112. 见 Schacter, 法院和政治的反弹, 上注24, 在1183-85。

113. 酒吧。L. No. 104-199, 110 Stat. 2419 (1996) (编入美国法典第28编第1738 C节 (2012); 及

1 《美国法典》第7条)

114. 见 HAW。转速。国家统计局人工神经网络\$572 C (LexisNexis 2005)

115. 《家庭暴力法》。常规武器系统 艺术作品I. , §23。

116. Baehr诉三 池町, 第91-1394号, 1996年 WL 694235 (1996年12月3日, 民事诉讼法第30页)。

117. Baehr诉Miike, 994 P. 2 d 566 (Haw. 1999)。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同性恋权利运动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分岔路口”时刻。在分叉的一边是扩大婚姻制度的可能性，将同性伴侣纳入其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通过寻求其他形式的法律承认来降低婚姻的重要性，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家庭安排。

在这种观点下，贝尔开创的婚姻新道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对婚姻的非婚姻承认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90年代的推移，婚姻在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中获得了吸引力，那些以意识形态为由反对婚姻的活动家们发现环境越来越不友好。正如简·沙克特(Jane Schacter)所解释的那样，贝尔将婚姻视为亲同性恋和反同性恋势力之间的“摊牌问题”，以至于“继续批评婚姻的选择对于LGBT运动中支持平等的婚姻怀疑论者来说显然是令人不快的。”¹¹⁹事实上，当时，著名的婚姻评论家、LGBT倡导者、学者南希·波利科夫(Nancy Polikoff)担心夏威夷的婚姻斗争正在扼杀反对婚姻的意识形态争论。¹²⁰为了阐明共同点并抵制婚姻的转变，她认为“我们的社会不能代表任何东西。.是一项扩大家庭定义的原则，不会将与一方的一夫一妻制置于所有人际关系的顶峰”¹²¹她希望Baehr“不要抹杀为实现不同目标和争取男女同性恋解放的不同愿景而努力的论点”¹²²。

118. 球，上注100，金额为493；参见上文第100段中的Schacter, 395 (“LGBT政治势力可能会选择将目光投向某种形式的国内伙伴关系，将其扩展到州和/或联邦层面，并全力以赴决定谁应该受到保护(只有同性伴侣还是异性伴侣？仅仅是浪漫伴侣或其他需要法律保护的关系？)。本课程可能是在贝尔之前或之后制定的。”)

119. 沙克特，前注100，在394；另见宝拉 L 埃特布里克，合法婚姻不是答案，4 HARV. 男女同性恋者34 , 35 (1997) (“那些‘反对’当前战略的人被边缘化为少数激进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左翼分子—我们知道这些标签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好处”。

120. 正如埃文·沃尔夫森(Evan Wolfson)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提出了问题。.不是‘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婚姻自由而奋斗吗?’而是，‘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接触到非同性恋公众?’来支持我们的婚姻平等。.”“埃文·沃尔夫森，《如何赢得结婚的自由》，4 HARV. 男女同性恋者 29, 30 (1997). 安德鲁·沙利文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亲婚姻论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一贯为同性婚姻提出了更为保守的主张。1997年，当被问及波利科夫的批评时，沙利文回答说，“反对派存在于80年代初或80年代中期，但现在不存在。”Andrew Sullivan, 采访，“我们在谈论选择的权利，”4 HARV. 男女同性恋者 25, 26 (1997).

121. 见 David W. Dunlap, 一些同性恋权利倡导者为捍卫同性婚姻而提出的问题，纽约时报，1996年6月7日，在A12。

122. 婚姻是一种选择？。自何时起，第21条同性恋通讯 Y新闻26 (1996)。

然而，到了90年代末，有组织的运动开始积极推动婚姻，并推进精心策划的诉讼。美国同性恋律师协会(“GLAD”)在佛蒙特州参与了一场婚姻挑战，导致公民结合，为同性伴侣提供了州法律规定的婚姻权利和利益。123在邻近的马萨诸塞州，2003年，GLAD律师在州法律项下获得了充分的婚姻权利。124在这一点上，越来越多的倡导者将民事结合和家庭伴侣关系作为婚姻的不充分替代品。125到本世纪初，婚姻平等运动进展顺利，接下来的十年将见证一系列关于同性伴侣婚姻权利的争斗—无论在法庭内外。

B. 强调反对婚姻的案例

因此，在 Baehr. 127之前，上文所述的标准账户对国内伙伴关系倡导的内容和意义给予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对于非婚姻倡导与婚姻之间的实质性关系，而不是战略性关系，几乎没有具体说明。

相比之下，这种说法的变体强调了早期 LGBT主张中的思想婚姻抗拒性，因此在婚姻和非婚姻认同之间形成了更对立的关系。虽然承认已经发生了运动内部辩论，但这一观点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国内伙伴关系与一种运动愿景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走向婚姻。当代婚姻平等倡导的批评家们对 LGBT运动的轨迹进行了最有力和最广泛的解读。然而，这一观点的要素出现在一系列学术研究中。事实上，如上所述，Ball对贝亚尔事件后一刻的总结说明了这一点

123. Baker诉国家，744 A. 2 d 864 (Vt. 1999)；VT. 国家统计局人工神经网络 山雀，山雀 15, § 23 (1999).

124. 古德里奇酒吧部。健康，798 N. E. 2 d 941 (Mass. 2003)。法院澄清说，只有婚姻才能弥补违反宪法的行为。参看大法官对参议院的再意见，802 N. E. 2 d 565 (麻省2004年)。

125. 参见 Douglas NeJaime, 60 UCLA L. REV., *Frame in (Equality) for 同性伴侣*。Melissa Murray著，《范式的迷失:国内伙伴关系如何从创新走向伤害》，37 N. Y. U. REV. L & SOC. 291 (2013)。

126. 见 Schacter, *法院和政治的反弹*，上注24，在1187–93。

127. 关于非婚姻辩护工作，见钱伯斯，上注12；Cox，上注12；William B. Rubenstein, 《我们是一家人:寻求对男女同性恋关系的法律承认的思考》，8 J. L. & POL. 89、93–94 (1991)。

128. 然而，Eskridge和 NanHunter明确地将运动倡导者推动非婚姻认可与90年代迅速增长的婚姻要求联系起来。见 ESKRIDGE, EQUALITY PRACTICE, 上注24, 第12–15页；ESKRIDGE, 《同性婚姻案例》，上注24, 58–60；Eskridge, 上注53, 1936–37；南 D. Hunter, 《婚姻、法律和性别:女权主义调查》，《性战争:性异议与政治文化105, 106》(Lisa Duggan&南 D. Hunter eds, 2006年)；南 D. Hunter, 《婚姻、法律和性别:女权主义调查》，1 LAW& SEX 9, 23–25 (1991)。

关于 LGBT运动及其与婚姻的关系的讨论. 129。

通过这一更为激进的视角，80年代的婚外恋宣传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石墙时代的婚姻批评，因为“女同性恋家庭的倡导者”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总的目标是促进社会、法律和经济对父权家庭以外的各种家庭形式的支持；因此，较少的婚姻，而不是婚姻，符合这一愿景。”¹³¹因此，倡导者将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转化为婚姻登记册之外的法律和政治诉求。. 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 ¹³³位 LBGT的倡导者用安吉拉·哈里斯 (Angela Harris) 的话是为了“搞垮家庭”¹³⁴。

梅丽莎·默里 (Melissa Murray) 认为，从婚姻抗拒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的家庭伙伴关系是破坏婚姻稳定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而不论其性取向如何。

129. 见上注118和所附案文。

130. 《男女同性恋家庭与关系的平等与正义》，61 RUTGERS L. REV. 529, 530 (2009) (将非婚姻辩护作为抵制婚姻的一部分，并解释说，在石墙后几年，LGBT活动家认为婚姻“引导每个人只有一种被认可的关系……按性别划分来管理男人和女人的生活，还有……”；另见 Shannon Gilreath, Montana案件 Show Split in Gay Rights Movement, JURIST- FORUM (2011年12月14日), <http://jurist.org/forum/2011/12/shannon-gilreath-gay-liberation.php>; Mary Ziegler, 《界定同性配偶的父母权利》，法学家-论坛(2012年1月14日), <http://jurist.org/forum/2012/01/mary-ziegler-parental-rights.php>。

131. 见 POLIKOFF, 上注22, 在48; 另见华纳, 上注88, 在132。

132. 参见柴R. 费尔德布卢姆, 《同性婚姻中的性》，4 HARV. 男女同性恋者23, 24 (1997) (解释“基础广泛的故事”，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大多数同性恋领导层认为婚姻是不可挽回的‘异性存在’，与性和社会压迫的自由不相容”。正如该隐解释的那样，从石墙出现的解放组织“并没有立即诉诸法庭，而是走上街头。”该隐，前注19, 在1582年。

133. 凯丝·韦斯顿:《酷儿国家的家庭:法治与承认的政治》93 RADICAL HIST。转速。122, 130 (2005); 另见 KATH WESTON, 我们选择的家庭:女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亲属关系107 (1991)。

134. 安吉拉·P·哈里斯, 从石墙到郊区?:通过性的政治经济学, 14 WM. & 玛丽比尔 RTS. (10) 1539、1568 (2006) (内部引号略); 另见 Ettelbrick, 上注119, 第35页 (“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长期以来对家庭制度的规范性定义提出了挑战，通过我们成功地创建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我们已经表明，不同群体的人可以组成一个家庭，而不是异性恋、生理上的亲戚、已婚的或者在男性户主的领导下运作。”)

135. 参见 Leonard, 上注100, 第580页 (“从理论上讲，反对同性恋运动内部同性婚姻的人主张[d]家庭合伙，一种非婚姻法律承认形式”) (脚注略); 另见 Eskridge, 上注100, 第1491页 (“我们对我们所选择的家庭的重视激发了同性恋在家庭合伙中的合法权益。比同性婚姻更能保护我们的许多关系。”)。

上世纪80年代的合伙条例“并非有意模仿婚姻”，而是“有意识地被设计成有别于——也少于——婚姻”¹³⁶条，波利科夫对婚姻和当代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主张提出了极具影响力的批评，他说：“80年代初。. . 推动建立“家庭伙伴关系”的地位。. . 她声称，在过去的十年中，“职业人士和雇主都不区分不能结婚的人和选择不结婚的人，”她说，“在这十年中，不结婚的人和选择不结婚的人没有区别，”¹³⁸因此，承认未婚的不同性别夫妇和同性伴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¹³⁹

那些强调非婚姻承认中更不稳定的方面的人指出，非亲密关系的存在表明，活动家成功地抵制了婚姻范式。例如，波利科夫指出，洛杉矶家庭多样性工作队建议在不要求浪漫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家庭伙伴关系，¹⁴⁰：“洛杉矶的报告敦促政府定义家庭，以反映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 . . 它建议对家庭做出灵活的定义，禁止对婚姻地位的歧视，以及两个生活在一起并共同享有“共同生活必需品”的人的家庭伙伴地位。

总而言之，早期 LGBT 倡导中对婚姻抵抗的强调表明，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激进主义破坏了婚姻的稳定。例如，埃特布里克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运动倡导者“并没有挑战家庭的基本假设”

136. Murray, 上注125, 301; 另见 Ettelbrick, 前注119, 35 (“我们已经面对并开始改变以婚姻为中心的家庭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剥夺了我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健康福利和丧假。”)。

137. Polikoff, 上注130, 收于530, 532; 另见 Julie Shapiro, 对同谋的思考, 8 N. Y. City L. REV. 657, 663 (2005).

138. 见南希·D·波利科夫, 《美国家庭景观的两个部分》:为同性和异性伴侣维持配偶和家庭伴侣雇员福利, 81 FORDHAM L. REV. 735, 738 (2012).

139. Polikoff, 上注130, 532。

140. 见 POLIKOFF, 上注22, 在55。她还指出，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和华盛顿特区的法令都包含了“非夫妻关系”。我, 51岁。

141. 参见上文第130段中的 Polikoff (533) (脚注略)。就波利科夫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流动诉讼反映了与国内合伙工作相同的冲动，并促进了“代表多元化家庭结构的联合宣传”。见 POLIKOFF, 上注22, 在55。比如，在纽约，律师们说服纽约州最高法院为租金控制法的目的采用功能性而非正式的“家庭”模式。见布拉斯基。斯塔尔·亚索克公司, 543 N. E. 2 d 49 (N. Y. 1989)。这一胜利“打着支持不同家庭的旗号”。见 Polikoff, 上注130, 在553。然而，穆雷指出，布拉斯基法院“使用了婚姻的规范性概念来告知其对家庭的理解。”见 Alice Ristroph& Melissa Murray, Disestablishment of Family, 119 YALE L. J. 1236, 1256 n. 89 (2010); 另见 Melissa Murray, 《婚姻权利和父母权利:父母、国家》和第8、5号提案。J. C. R. & C. L. 357, 394 (2009)。关于这一点，请参阅 Dubler, 上注9, 1020。关于布拉斯基的更多分析，请参阅玛丽·安妮·凯斯, 《公共领域的夫妻与结合:对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权利诉讼法律历史的评论》, 79 VA. L. REV. 1643年至1664年。

¹⁴²相反，运动领导人的工作“被指控为不公正、不合理且有损于婚姻特权家庭的行为”。¹⁴³在这一观点下，支持非婚姻家庭的家庭伙伴关系和其他措施构成了抵制而不是接受婚姻特权的重大成就。

¹⁴⁴在这种观点下，当倡导者转向婚姻时，他们改变了家庭伴侣关系本身的含义。根据 LisaDuggan和 RichardKim的说法，家庭伴侣关系——曾经是 LGBT运动“致力于家庭多元化”的目标——转变为“婚姻平等的二等替代者”。¹⁴⁵对于默里 (Murray) 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地方到州级对非婚姻关系认可的倡导转变促成了国内伴侣关系意义的转变。

在很大程度上，早期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宣传中对婚姻抗拒的强调，被当代婚姻平等工作的批评者有力地表达出来，构成了当前关于婚姻及其在 LGBT权利中的作用的学术辩论。但正如下一部分中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对这一运动过去的解读低估了婚姻作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国内伙伴关系固定原则的核心地位，模糊了非婚姻承认和婚姻之间的对话关系。正如下一部分所表明的那样，通过仔细审视家庭伙伴关系是如何产生、成功和获得意义的，我们可以认识到婚姻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非婚姻宣传的影响以及这一工作对婚姻的影响。

在继续前进之前，必须指出，即使是对运动历史的更为激进的渲染也包含了许多关于运动轨迹的准确说法，包括贝尔身后发生的一些战略举措。但是，过分强调运动的鼓吹方式，

142. Ettelbrick, 上注119, 第35页。

143. 我。

144. 波利科夫认为，“作为我们运动目标的结婚权利日益突出，这完全归功于1993年夏威夷最高法院的判决。”见 Polikoff, 上注122, 26。其他学者并没有强烈地指出这一点，在最近的著作中，波利科夫本人将贝赫与1990年代初保守的同性恋思想的兴起和同时出现的仅限于同性伴侣的家庭伙伴政策联系在一起。见 POLIKOFF, 上注22, 在61, 83。尽管如此，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系列相关发展“改变了关于 LGBT家庭的法律论点框架”。我，83岁。波利科夫还指出了外部政治发展，包括1990年代保守的家庭政策和言论的传播。见第63-70页。

145. Richard Kim& Lisa Duggan, 《超越同性婚姻，全国》(2005年6月29日),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beyond-gay-marriage? page= full>。

146. 见 Murray, 上注125, 在296-97。

反对和拒绝婚姻，这种对婚姻运动的解读错误地采取了一些战略措施来规范婚姻。此外，它没有充分认识到那些试图挑战婚姻特权制度的倡导者所面临的限制。这样做，掩盖了许多倡导者出于规范和战略原因而采取的亲婚姻立场的重要性，并高估了早期非婚姻举措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因此，主要通过抗拒婚姻的视角来看待早期的 LGBT主张，往往会将最近的婚姻主张视为一种新现象，而不是来自于早期的工作。在现实中，今天的婚姻要求在许多方面都源于而非抵触了最早的非婚姻承认要求。

三。

加州案例研究:非婚姻承认, 婚姻, 和 同性伴侣

下面的案例研究密切关注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加利福尼亚同性伴侣的工作。加利福尼亚是 LGBT运动的重要阵地，与其他州相比，那里的支持者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事实上，家庭伙伴关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加利福尼亚。随着立法者试图复制加州的创新，该州的事态发展影响了全国各地的事件。当然，加利福尼亚仍然是 LGBT活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心地点。最近，最高法院在 *Hollingsworth v. 147* 现在，人口最多的州的同性伴侣拥有了结婚的权利。

这一部分的案例研究追溯了跨一系列机构领域、在多个决策层面以及受一些相关行为者影响的宣传活动，以了解婚姻在 LGBT组织中的作用。它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家庭伙伴关系努力——早在婚前就在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议程上占据了官方位置，并在1999年以在州一级实现家庭伙伴关系而告终，而这也是贝尔将婚姻推向全国显著地位的几年之后。

案例研究表明，由于内部流动动力和外部法律、政治和文化制约，婚姻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是以非婚姻宣传为基础的。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倡导者并没有用一个声音说话，也没有占据一个明显支持或反对婚姻的立场。不同的框架和论点为国内伙伴关系工作提供了信息。例如，国内伙伴关系的概念如下

147. 最高法院认为，8号提案的支持者—加利福尼亚宪法禁止同性伴侣结婚—没有资格对地区法院宣布该禁令无效的裁决提出上诉。133 S. Ct. 2652 (2013).

强调平等获得福利的分配机制与承认框架相吻合，该框架强调了家庭伙伴关系特别赋予同性伴侣的地位。归根结底，婚姻的中心地位影响了每个框架的共鸣和家庭伙伴关系的类型。

通常优先考虑婚姻的非运动行为者极大地塑造了法律和政治环境，同时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提供机会和施加限制。雇主、保险公司和地方官员使用婚姻规范来概念化和定义非婚姻承认的术语。国家一级的行为者，包括法官和立法者，都希望婚姻能够为维持不同性别和同性伴侣之间的法律区别辩护。社会保守派活动家在对婚姻和家庭的更广泛攻击中找到了家庭伙伴关系。

因此，为了实现非婚姻的承认，倡导者诉诸于婚姻公约，指出同性伴侣被排斥在婚姻之外，并强调同性伴侣与已婚夫妇的共同点。在建立家庭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他们强调婚姻规范——如成人恋爱关系、相互情感承诺和经济相互依存——能够包括同性伴侣。通过挑战婚姻的至高无上性，同时主张通过婚姻规范来获得认可，倡导者们争辩、接受并最终塑造了婚姻制度，同时将同性关系描述为类似婚姻的关系。

案例研究所涉及的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里根政府时期，当时新右翼势力特别强大。当然，塑造国家政治舞台的强大的保守意识形态对关于非婚姻承认的争论也有影响。然而，在1980年代，与家庭伙伴关系有关的许多工作都发生在地方一级，往往出现在进步的城镇或大城市，民主党领导力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人数可观。因此，即使社会保守派活动人士限制了当地的一些进步，LGBT倡导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市级层面上享有相当大的空间来推动这一事业。而在国家层面，新右派影响更大，拥护者获得肯定工作的空间相对较小。

总体而言，必须牢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在非婚姻承认方面开展工作所依据的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同时仍然赞赏这一背景在地理上的影响。当然，即使保守派势力没有直接限制LGBT在特定城市的工作，这些力量的影响也可能以微妙的方式塑造了LGBT倡导者及其盟友的主张和论点。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向右翼的转变可能限制了包括LGBT倡导者在内的左翼势力的可能争论范围。

A. 家庭伙伴关系的起源——婚姻平等与性取向平等

在最早的一次迭代中，家庭伙伴关系利用性取向的非歧视原则为同性伴侣无法获得婚姻的问题提供了务实的解决方案。家庭伙伴关系倡导者并不是要破坏婚姻，而是倾向于强调同性伴侣获得福利的实用途径。从一开始，家庭伙伴关系的术语就是通过与婚姻的比较提出的。

国内伙伴关系倡导源于市政当局的非歧视政策。尽管安妮塔·布莱恩特的“拯救我们的孩子”运动在佛罗里达、明尼苏达、俄勒冈州和堪萨斯州撤回了同性恋权利法令，但加州148个进步城市通过了反歧视条款，为寻求同性伴侣的权利提供了依据。尽管如此，即使在旧金山，对同性恋权利的宗教反对也被证明是强大的。

1978年，旧金山颁布了一项包括就业、住房和公共住宿在内的性取向不歧视法令。同年晚些时候，伯克利149号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令。¹⁴⁸马特·科尔斯(Matt Coles)将最终领导 ACLU的 LGBT项目，151人是这两部法律的主要起草者。¹⁴⁹次年，作为对伯克利法令的回应，该市的雇员和同性恋活动家汤姆·布鲁姆敦促该市为他的同性伴侣提供医疗保险。¹⁵⁰ Brougham认为把婚姻作为福利资格的唯一标准是不公平的，并建议该市创建一个“国内伙伴关系”来纠正这种不平等。

在旧金山，公开的同性恋城市监督员哈里·布里特接受了 Brougham的建议。1981年和1982年，Britt与 Coles一起起草了一项家庭合作条例；Brougham也参加了 San。

148. 参见上文第一部分。

149.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178-78 艺术33，§3301-10 (1978年)；另见 Les Ledbetter, Bill on the *Gay Rights Advance in San Francisco*, N. Y. TIMES, 1978年3月22日, A21。

150. 《伯克利城法典》§13.28.010-13.28.040 (1978年)；另见伯克利理事会1978年10月12日在洛杉矶时报B28分会通过的《强烈同性恋权利法》。

151. 见 Cummings& NeJaime, 上注10, 1254。

152. 与 Matt Coles的电话访谈(2013年4月13日) [下称 Coles访谈]。

153. 参见利兰·特拉曼，《家庭伙伴关系简史》，15部同性恋改编本。23, 23 (2008). 从1979年到1981年，Brougham和其他一些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内合作伙伴健康保险方面施压，但没有成功。见《卡伦模塑、性取向与法律》§5:50 n.1 (Roberta Achtenberg orig. ed., 2010年)。Brougham是东湾同性恋民主俱乐部的成员，曾一度领导过该俱乐部。见城市和中国。SAN FRANCISCO, HUMAN Rights COMM'N, 对家庭伙伴关系、婚姻状况和大家庭政策的调查:调查结果、建议和附录9 (1989年8月) [以下简称 HRC调查]。

154. 见 Traiman, 上注153, 在23。

155. 参见华莱士·特纳, 1982年11月28日, 纽约时报《夫妇问旧金山》, 第31页。

156 最早的草案将国内伴侣定义为“两个人”，他们“共同居住”，“共享共同的生活必需品”，并“宣布他们是彼此唯一的家庭伙伴”。157这一措辞明确援引了加利福尼亚普通法责任配偶对“共同生活必需品”负责。158这一措辞对保险公司尤为重要，他们拒绝增加国内合作伙伴关系的保险范围，但并不能保证这种新的关系状况将具有婚姻般的承诺。

160 在另一个旨在为城市雇员的家庭伴侣提供健康保险的章节中，起草人规定，“在通知卫生服务系统第一个国内合伙人不再被录取后6个月内，本市已录用国内合伙人的雇员不得招收不同的国内合伙人。”161这段时间故意记录了婚姻背景中中间离婚判决与最终离婚判决之间的时间。

1982年10月，旧金山市的律师向监事会提交了一份随后修订的法令草案，表达了“关于其全部范围和影响的不确定性”。163除了医院和监狱等城市设施之外，他们不确定“家庭伙伴关系的影响”。164因此，问题“必须逐案解决，因为国内合伙人享有与配偶同等的地位。”165尽管有这些保留，监事会还是通过了该条例，将国内合伙人定义为“两个人”，

- a. “无血缘关系”
- b. “[n]任何一方已婚，且双方均无婚姻关系，”
- c. 他们“共同分享生活必需品”。
- d. “宣布他们是彼此的主要国内合伙人”，及

156. 科尔访谈，上注152。

157. 《关于建立国内合伙关系的记录的条例(草案)》(1982年)(连同作者存档)[以下称1982年草案]

158. 福兰斯比诉Benzenberg, 265 P. 2 d 183, 189 (Cal. Ct. App. 1954年)。

159. 科尔访谈，上注152。

160. 1982年草稿，上注157，第3页。

161. 《城镇职工国内合伙人健康计划覆盖条例(草案)》(1982年)(连同作者存档)

162. 科尔访谈，上注152。根据同样的逻辑，伯克利的法令也使用了类似的时机。见HRC调查，前注153，第11页。

163. 德尔文塔尔律师事务所(Burk E. Delventhal& Thomas J. Owen)致监事会书记员约翰·泰勒(1982年10月28日)的备忘录[以下简称1982年德尔文塔尔备忘录](已与作者一并归档)。

164. 我。

165. 我。

- e. “在过去六个月内，任何一方都向市政府任何部门宣布，
他或她有不同的国内伴侣”¹⁶⁶

尽管所提议的语言既包括同性伴侣，也包括不同性别的夫妇，科尔在他自己的努力中对这两种语言进行了区分，以争取对法令的支持。为了反对反对，他强调“异性伴侣可以在他们选择的时候结婚。当他们不选择结婚时，他们暂时的、自愿的排斥并不等于(同性伴侣)永久的、非自愿的和绝对的排斥。”¹⁶⁷此外，Coles强调，该条例与婚姻有关，而非反对婚姻。他坚持认为，那些提出该法令的人寻求“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攻击婚姻”。¹⁶⁸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婚姻本身，而在于不公平地将婚姻作为获得婚姻资格的唯一标准。”

该法令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婚姻方面确立了家庭伙伴关系。圣弗朗西斯科的天主教领导人反对该法令，对承认非婚姻家庭提出了更广泛的反对意见。旧金山大主教约翰·奎因在给戴安妮·范斯坦市长的信中声称，“通过推论或类比家庭伙伴关系来减少婚姻和家庭的神圣契约，是对理性人的冒犯，也是对我们法律、文化、道德和社会遗产的伤害。”¹⁷⁰在1982年监事会通过该条例后，Feinstein否决了该法令。¹⁷¹她抱怨说，要求家庭伴侣像配偶一样对待的规定“没有定论，也不明确”，而且可能“受到各种解释的影响”。¹⁷²布里特认为，这一点是“立法的核心”。¹⁷³关于家庭伙伴关系的战线是通过婚姻划定的。家庭伴侣不是任何家庭成员，而是与配偶相当的人。

刚输掉比赛后，科尔和布里特试图重新制定条例以满足范斯坦的要求。一九八三年一月，市律师批准了草案。

166. 《国内合伙经营》，以增加第45章修改旧金山行政法典，建立国内合伙关系，并要求旧金山市、县的董事会、委员会和部门给予国内合伙人与配偶同样的权利和特权(在1982年)(与提交人一起归档)；另见1982年德尔文塔尔备忘录，上注163。

167. Matt Coles的个人笔记，反对反对或批评时需记住的要点(1982年)(随著者存档)

168. 我。

169. 我。

170. 大卫莫里斯，旧金山市长否决国内合作伙伴法案，同性恋社区新闻，1982年12月25日，在1。

171. 我。

172. 我。

173. 我。

175-175 “这些东西是人们为了维持生活而通常需要的东西，而不管他们的工作或地位如何。”¹⁷⁶这反映了继续努力使家庭伙伴的责任与配偶的责任相一致，从而确保相应程度的承诺。在回应市长对范围不确定的担忧时，该法令明确规定只允许医院和监狱探视。¹⁷⁷该条例还解决了一个事实，即根据城市章程，监事会不拥有对重要的公共就业福利的权力。据此，该条例简单地“要求市长敦促卫生服务体系委员会为城市雇员的国内雇员的健康保险制定一项或多项计划，以供通过。”¹⁷⁹类似地，该条例“要求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交关于城市雇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病假和丧假的某些规则和规定，以供通过。”¹⁷⁹当范斯坦明确表示要否决修改后的条例时，布里特和科尔斯放弃了推动该法令的努力。¹⁸⁰旧金山要制定一部国内合伙法还需要几年时间。

与此同时，在伯克利的努力获得动力，因为倡导者从旧金山的经验。¹⁸¹1983年，伯克利 LGBT社区的代表向该市的人类关系和福利委员会(HRWC)做了一次演讲，表明用于就业福利的“婚姻标准”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者产生了歧视性影响。¹⁸²同年晚些时候，HRWC举行了一次公开听证会，Brougham、Coles和来自不同 LGBT团体的代表在听证会上表达了他们对国内伙伴关系政策的支持。¹⁸³他们的评论围绕着性取向歧视问题展开，这种制度利用婚姻来提供社会福利，但却明确地将同性伴侣排除在婚姻之外。因此，他们要求“男女同性恋者获得[他们]的公平份额，并且不排除在‘配偶福利’之外。”

174. 副市律师伯克·E·德尔文塔尔和托马斯·J·欧文致达纳·范·格奥尔德的备忘录。
Harry Britt's Office (1983年1月17日) [以下简称 Delventhal Memo] (与作者一同存档)

175. 我，1点钟。

176. *ID* 3 (条例草案的附表)。

177. *ID* 9 (条例草案的附页)。

178. *ID* 11 (决议草案的附件)。

179. *ID* 13 (决议草案的附件)。

180. 科尔访谈，¹⁵²上注。

181. 我。

182. 人际关系及福利委员会致阁下的备忘录。市长和市议会成员1名(1984年7月17日) [以下简称《人权理事会备忘录》] (与作者一起存档)

183. 见同上，4-6点。

184. 我，4点钟。

公开听证会对国内伙伴关系的反应绝大多数是积极的，因为十四位发言者中有十三位赞成国内伙伴关系政策。

第二年，HRWC建议市长和市议会通过一项家庭伙伴关系政策。186 Leland Traiman是一名同性恋活动家，他坐在HRWC上，187 Coles帮助起草了这项政策，188人使用旧金山法令的语言作为出发点。189年时，Coles曾帮助起草了这项政策。

在提出建议时，HRWC将国内伙伴关系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归结为婚姻法的不同性别要求造成的问题。它的开场白是：“在所有的州，只允许异性伴侣结婚。”190该组织解释说，尽管“一些同性夫妇举行了私人仪式，并称自己已婚。”191因此，HRWC侧重于性取向平等和婚姻准入，解释说“所有未婚的异性夫妇都能够自愿跨越‘婚姻障碍’”，“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婚姻是平等的。所有的同性伴侣都无法跨越‘婚姻障碍’——永远，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192

193事实上，HRWC并没有质疑福利制度的基本逻辑，而是试图将福利扩大到更多的“善意夫妻”。193事实上，它敦促市议会推迟任何更广泛的考虑，即是否应该由需求而不是相互关联的地位来决定利益。194由于该提案回应了“同性恋群体成员的一系列投诉”，HRWC解释说，它的“作用应该是”。使福利计划具体更平等，而不是“总体上更好”。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HRWC建议家庭伙伴关系“近似于目前的婚姻标准”。196事实上，HRWC解释说，尽管它允许将同性和异性伴侣都包括在内，但它“拒绝创造一个比婚姻标准简单得多的新标准的可能性。”197与旧金山使用的语言类似，HRWC提出了一项国内伙伴关系定义，即：

185. 我。

186. 见ID20。

187. 见 Traiman, 上注153, 在23。

188. 见 Cummings& NeJaime, 上注10, 1254。

189. 科尔访谈, 上注152。

190. HRWC备忘录, 前注182, 1。

191. 我。

192. 我, 9点钟。

193. 我, 12点钟。

194. 见同上, 10点。

195. 我, 18岁。

196. 我。

197. 我。

包括两个“血缘关系不比婚姻更密切”的“共同居住并分享共同生活必需品”并“对[彼此]共同福利负责”的两个人。

在旧金山战败后，支持者在伯克利取得了成功。1984年，该市采纳了 HRWC提出的家庭合作政策，该政策适用于同性和异性非婚姻关系中的城市雇员。在遇到一些初始障碍后，员工的家庭合伙人有资格享受牙科和健康福利。

在南加州，洛杉矶的立法者也考虑了家庭伴侣的福利。市议员 Zev Yaroslavsky在1985年推动了这一问题，对成本的担忧很快影响了市政府官员之间的内部辩论。200该市行政官员估计，“单是健康保险，额外的成本就会在1.7-340万美元之间。”201保险公司不愿提供保险，这进一步给辩论蒙上了阴影。1980年，该市律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保险公司拒绝提供国内合作伙伴保险，而另一些保险公司只有在“能够对这种关系作出充分定义”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2021980年和1985年的讨论都没有产生国内伙伴关系政策，但它们为下文讨论的洛杉矶家庭多样性工作队奠定了基础，该工作队于1986年成立，目的是推动这一政策。

与此同时，在1985年，新成立的西好莱坞城市通过了一项家庭伴侣条例，允许同性和不同性别的夫妇在该市登记。203西好莱坞是一个相对较小、城市和进步的社区，有相当数量的男女同性恋人口。这座城市的领导人包括著名的 LGBT活动家。事实上，瓦莱丽·特里格诺，当时的市长，是美国城市里第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市长。204毫不奇怪，当时几乎没有反对国内伙伴关系政策的迹象。

与最初仅限于城市雇员的伯克利政策不同，《西好莱坞法令》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登记处。这一更广泛的范围旨在允许国内合作伙伴游说任何雇主获取福利

198. 我20岁。

199. 凯撒永久性提供保险。参见 Milt Froudenheim, *Rising Concern on "Partner" Benefits*, 纽约时报, 1989年8月16日, D1。伯克利大学1991年向公众提供注册服务。参见 City of Berkeley, <http://www.ci.berkeley.ca.us>, 家庭合伙信息城市办事处

/Clerk/Home/home_Partnership.aspx (上次访问时间2013年10月26日)

200. 参见市行政官 Keith Comrie致第五区市议员 Zev Yaroslavsky的备忘录(1985年3月4日)(与提交人一同存档)。

201. 我, 1点钟。

202. 我。

203. 《西好莱坞，加利福尼亚州，第22号法令》(1985年2月21日)[下称《西好莱坞22号法令》](与作者一同归档)

204. 1986年3月16日，纽约时报，前市长在西好莱坞一案中被判有罪，当时27岁。

205 尽管如此，正如在伯克利一样，西好莱坞的地位仅限于那些“血缘关系不比婚姻更紧密”的“共同生活必需品”和“对彼此的福利负责”的夫妇。

206 这些要求满足了议员们的要求，他们要求“某种承诺”避免向“非真正的受扶养人”提供福利。207因此，在这一早期阶段，北加利福尼亚和南加州的倡导者以一种映射到一种婚姻模式的方式构建了家庭伙伴关系，这种婚姻模式具有成人专属的耦合、相互支持和义务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虽然向同性和异性伴侣开放，西好莱坞家庭伙伴关系登记处的目的是为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特别形成的关系提供法律和社会确认，而男同性恋者是小城市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这样一来，西好莱坞的注册机构就围绕认可建立了家庭合作关系——特别是对同性伴侣。正如特里格诺市长所解释的那样，“允许国内伴侣登记是一种说法，在城市的眼中，这种关系等同于婚姻。”208事实上，市政府官员制定了一份官方的国内合伙证书，“适用于框架。”209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多数夫妇来说，法律提供的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意义。

该条例最初只规定了医院和监狱探视权，210次医院探视解决了艾滋病毒/艾滋病日益流行直接引起的问题。Terrigno解释说：“我听说过各种各样的恐怖故事，关于那些因为不是直系亲属而不被允许探望伴侣的人。

“(二)夫妻探望权。”211然而，考虑到西好莱坞没有大型医院，Terrigno预计将利用《家庭伙伴关系条例》与附近的Cedars-Sinai医疗中心进行谈判。212直到1989年，西好莱坞才将医疗保险范围扩大到城市雇员的未婚伴侣(同性和异性)。213在几次试图说服私人保险公司将保险范围包括在内，均以失败告终。

205. 见 Arthur S. Lazere, 《家庭伙伴关系立法现状的最新资料》, EQUAL TIME, 1985年7月24日, 第14页。

206. 我, 1点钟。

207. 《西好莱坞法律将扩大未婚夫妇的权利》, 洛杉矶时报, 1985年1月31日, W1 (省略内部引号)。

208. 我。1993年, 一对西好莱坞夫妇对加州的婚姻法提出质疑, 但没有成功。见1993年4月21日洛杉矶时报, B3; 西好莱坞:法院驳回同性恋夫妇的结婚许可证申请, 洛杉矶时报, 1993年5月22日, 在B2上。

209. 斯蒂芬·布劳恩, 法律列表权利, 缺乏牙齿, 洛杉矶时报, 1985年2月28日, 在W14。

210. 西好莱坞勋章22, 上注203, 第3页。

211. 布劳恩, 前注207。

212. 见 Braun, 上注209。

213. 见西好莱坞城市议会会议纪要3 (1989年2月6日); 另见好莱坞将于1989年2月22日在B3为单身雇员的合伙人投保的罗恩·罗素(Ron Russell)。

对于家庭伴侣，²¹⁴ 在将医疗保险扩大到家庭伴侣时，市政府官员增加了“与法律认可的婚姻最相似的标准”。²¹⁵名国内合伙人现在将“签署一份宣誓书，表明他们在共同生活必需品方面有共同的义务。”²¹⁶这位助理城市经理指出，“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通过合同或协议相互承担的义务部分。”²¹⁷婚姻章程本身规定，“夫妻双方对彼此的义务负有合同义务。”²¹⁸ 西好莱坞宣誓书将这一义务转化为不带性别色彩的语言。即使在国内合伙最早的迭代中，婚姻也提供了理解和定义新地位的条件。

B. 早期的家庭伴侣诉讼——将同性关系定义为婚姻式的

在地方一级提倡未婚夫妇享有高级权利的同时，加利福尼亚法院考虑在州一级扩大权利。在质疑剥夺未婚夫妇权利的诉讼中，婚姻提供了界定这些权利要求的规范。州法律赋予婚姻特权，因此 LGBT的倡导者试图将同性关系描绘成婚姻般的。然而，婚姻的地位最终为否定同性伴侣的婚外认可提供了基础。

在法院日益关注未婚异性伴侣的背景下，代表同性伴侣提起的诉讼开始运作。在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已经成为适应非婚同居上升趋势的领导者。在其开创性的1976年马文。*Marvin*判决，法院认为，在未婚关系解除时，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同居协议，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²¹⁹不过，正如 Grace Blumberg所显示的，马文的合同镜头最终限制了未婚夫妇的权利。

214. Kevin M. Fridlington, Human Res. 离开，西好莱坞城，托马斯
(6) Coleman, Spectrum Institute (1992年11月12日)，加州保险专员反歧视工作组报告，呼吁终止对未婚消费者的不公平保险歧视⁵⁷ (1993年7月) [以下简称反歧视工作组报告] (与提交人一同存档)。

215. 西好莱坞，加州，同意日程表:国内合作伙伴医疗保险1 (1989年2月6日)。
216. 我，2点钟。
217. 我。
218. CAL. 有限元法典§5100 (1970)。
219. 557 P. 2 d 106 (Cal. 1976)
220. 见 Blumberg, 上注56, 第1159-70页;另见 Grace Ganz Blumberg, 《非婚姻同居的正规化:美国福利国家的权利和责任》，76 NOTRE DAME L. REV. 1265, 1293-99 (2001) (解释对 Marvin合同方法的批评，并记录美国法学会基于地位的替代方案)。Marvin 法院

特别是，合同理论限制了未婚夫妇向第三方主张权利的能力。在1988年埃尔登。谢尔顿的决定，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目睹其女性伴侣死亡的同居未婚男性无法因财团损失和疏忽造成的精神痛苦而获得赔偿。²²¹区分 *Marvin*, *Marvin*宣布了其权利等事项，法院判定，允许向第三方追偿将“[抑制]国家在促进婚姻方面的利益。”²²²本节中详述的诉讼发生在 *Marvin*之后、 *Elden*之前，当时加利福尼亚州法院正在研究未婚同居人的权利与国家在婚姻方面的利益之间的关系。

作为回应， *Hinman*提起诉讼，并由女同性恋权利项目的 Roberta Achtenberg (女同性恋权利国家中心的前身)代表 Roberta Achtenberg提起诉讼。²²³婚姻构成了 *Hinman*的主张，因为他辩称，他与他的伴侣拉里·比提(Larry Beatty)的类似婚姻的关系应该使他们有资格享受福利。²²⁴确实如此， *Hinman*和 Beatty说他们“如果不被国家法律禁止，他们就会结婚。”²²⁵

Achtenberg强调 *Hinman*和 Beatty与已婚夫妇的共同之处：

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家，把他们的收入和财产结合起来，共同拥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去教堂和社交场合，一起享受假期和娱乐。他们有朋友在一起，有一种归属感，被自己、朋友和家人看重。

然而，隐含契约理论的空间可以理解为准地位的概念。见 *Eskridge*, 上注53, 1930年。正如夏洛特·戈德堡(Charlotte Goldberg)所言，“关系最像传统婚姻的夫妻最有可能表现出分享财产的默示协议。”夏洛特·K·戈德伯格，《冒险家的计划:废除和恢复英美法系婚姻》，13 WM. & MARY J. WOMEN & L. 483, 488 (2007)。

221. 758 P.2 d 582, 586 (Cal. 1988)

222. 我。

223. LGBT的倡导者们希望同性伴侣可以利用马文主义。见1976年12月28日《关于未婚夫妇的重大裁决》，S. F. CHRONICLE, 1976年12月28日，第1期。但在法庭上的结果好坏参半。把琼斯比作戴利，176卡巴顿。Rptr. 130 (Cal. Ct. App. 1981) (主张履行家务的原告在同性之后不能恢复健康，同居伴侣的死亡，因为任何协议都“明确且不可分割地基于其作为情妇的服务”)，与沃顿达成

v. Dillingham, 202 Cal. 应用程序。3d447, 454 (1988) (允许为同性同居伴侣提供司机和秘书服务的男子进行康复)。

224. 辛曼佩尔斯的国防部。管理员，213卡巴顿。Rptr. 410 (加拿大)法规汇编1985)。

225. 我。加利福尼亚的另外两起诉讼对同性伴侣缺乏福利提出了质疑。见布林金。S·帕克转录。公司，572 F. Supp. 236 (N. D. Cal. 1983); Chamberlin v. Frontier Airlines, Inc., No. 310989 (Cal. Super. Ct., 1983年12月22日)。关于这些情况的描述，请参阅考克斯，上注12，在36-37。

226. 见摘要为上诉人在18, 欣曼, 213卡巴顿。Rptr. 410 (3-23749号)

227. 我, 1点钟。

在发生事故或疾病的情况下对彼此负有责任。他们是对方遗嘱和人寿保险保单的受益人，并相互承诺情感支持和具有法律执行力的经济支持承诺。

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婚姻模式——植根于成人关系、情感承诺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它用性别中立的术语重新定义了婚姻规约中针对性别的“相互支持”语言。Achtenberg声称，“Hinman上诉人和他的有配偶的同事之间的唯一区别是，Hinman上诉人是同性恋”，因此他和他的伴侣“被加利福尼亚法律禁止结婚”。²²⁹ Achtenberg当时并没有拒绝结婚；相反，她辩称，即使同性伴侣被排除在婚姻之外，作为法律事项，他们也足以像已婚夫妇一样获得一些同样的福利。

与此同时，Achtenberg将她的当事人与不同性别的未婚夫妇拉开距离，描绘了婚姻双方与Hinman和Beatty之间关系的承诺、相互支持和经济相互依存规范之外的不同性别的非婚姻关系。²³⁰她声称，“许多未婚异性夫妇并没有承担起Hinman上诉人的关系和已婚夫妇之间关系所体现的全部经济一体化和永久承诺。”²³¹

这表明，Achtenberg和她的客户并不想破坏婚姻；相反，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对同性伴侣的歧视性待遇，他们的工作方式就像已婚夫妇一样。当然，为了证明这一点，Achtenberg阐明了一种适合同性伴侣生活的特殊婚姻模式。在这个早期阶段，我们把同性关系的构建看成是一种类似婚姻的关系，同时也清楚地表达了一种能够包容同性伴侣的婚姻模式。

Achtenberg认为，福利政策没有对婚姻地位的差别提出质疑，而是“利用配偶身份歧视同性恋者”。²³²这一侧重于性取向而不是婚姻状况，反映了相关学说所强加的限制。在其1983年诺曼诉。失业保险申诉委员会的裁决，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限制声称婚姻状况的就业权利主张

228. 我，9点钟。

229. 我。

230. 见答复摘要为上诉人在3-4，欣曼，213卡巴顿。Rptr. 410 (邮编:1985) (第3-23749号)。

231. 上诉人摘要，上注226，第10页。

232. 我，45岁。同时，管辖判例法和行政命令有利于性取向的主张，宪法规范为侧重于性取向而不是婚姻状况的争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Achtenberg试图将影响同性伴侣的可疑阶级地位的因素绘制成地图。见第13-28页。

233 法院依靠“国家在促进婚姻方面的合法利益”，支持拒绝向一位离开工作陪伴未婚夫到另一个州的妇女发放失业救济金。234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法院对将婚姻利益与法律上不允许捆绑在一起的说法设置了实质性障碍，并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迫使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律师将其主张与基于婚姻状况的主张区分开来。就其本身而言，国家试图利用诺曼的影响力，将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雇员与规模较大(无保护)的未婚员工分组。

因此，LGBT倡导者的最佳前景在于表明，由于婚姻的获得，同性和异性伴侣的境况并不相同。因此，Achtenberg认为，尽管

国家在促进婚姻方面的正当利益，可以作为拒绝给予异性恋国家雇员家庭牙科津贴的理由，这些雇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不与其伴侣结婚……。(i) 上诉人 Hinman如果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愿意与其伴侣结婚，则不能保证拒绝给予此种利益。

Achtenberg的主张不是婚姻应该停止成为相关的分界线；相反，婚姻可能是分界线，但同性夫妇更像是已婚夫妇，而不是未婚(不同性别)的夫妇，因此应该包括在婚姻这一边。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友情摘要支持阿腾伯格基于性取向的婚姻取向，而非婚姻选择。Coles当时作为一名私人民权律师代表美国公民权利协会(ACLU)辩称，由于“加州禁止同性个体之间的婚姻”，争议的法规将国家雇员分为三组：

- (1) 已婚并有资格享受家庭伴侣福利的人，如果他们愿意；
- (2) 未结婚但在法律上能够结婚并有资格领取福利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和]
- (3) 未结婚且在法律上不能结婚并有资格享受该利益的人。

因为“前两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异性恋，而且...”[a]第三组的所有成员都是同性恋者。规则创造了一个“纯粹”

233. 663 P. 2 d 904 (Cal. 1983)

234. 我打908。第二年，法院发现，一名未婚妇女在搬去陪伴未婚伴侣和他们的孩子时，确立了离职的“正当理由”。然而，儿童的存在是一个关键的区别因素。见麦格雷戈。失业问题。上诉 Bd., 689 P. 2 d 453, 458 (Cal. 1984)

235. 见被调查者简报6, 27-28, 42, Hinman, 213 Cal. Rptr. 410 (3-23749号)

236. 见上诉人摘要，上注226, 第34页。

237. 简要介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北加利福尼亚州作为法庭之友，支持上诉人在3, 欣曼, 213卡尔。Rptr. 410 (3-23749号)(原件变更)

异性恋国家雇员和同性恋国家雇员的区别。”²³⁸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眼中，相关区别并不是“领取福利的人和未获得福利的人之间的区别，而是“如果愿意，可以获得福利的人与可能不能获得福利的人之间的区别”。

加州上诉法院准确地描述了原告的论点，即基于性取向的婚姻排斥区分了男女同性恋员工与其他未婚员工。²⁴⁰不过，法院驳回原告的主张，认为不存在基于性取向的分类，而是将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与所有其他未婚个人分组：“同性恋者仅仅是更大的未婚人群的一部分，而这也属于员工的孝顺关系和父母（例如）。. . .因此，牙科计划不是基于性取向的歧视，而是根据婚姻区分资格。”²⁴¹因此，法院认定，“原告的处境与有配偶的异性恋国家雇员的境况并不相似。”²⁴²尽管 Hinman 和 Beatty 的婚姻性质构成了他们的主张基础，但他们被排除在婚姻之外，在法律上使他们更像兄弟姐妹，而不是配偶，因此没有资格享受福利。

最终，法院得出结论，原告的申诉符合婚姻法（243条），而他们并未正式对此提出质疑。²⁴⁴婚姻构成了保持同性伴侣利益的分界线；然而，在没有直接质疑同性伴侣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诉讼中，*Hinman*法院可以通过诉诸婚姻法为剥夺利益辩护。²⁴⁵正如双方所指出的那样，婚姻既区分了原告的诉求，也区别了其他未婚个人的诉求，并“强迫]了结果。

C. 婚姻家庭事务专案组工作——对婚姻家庭的检举和控告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加州的 LGBT 倡导者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市政政策和州级立法改革上。由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律师领导的一系列工作队，在更广泛的尝试中考虑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需要。

238. 同上，3时至4时。

239. 同上，4岁。正如 Eskridge 所说，“美国公法的结构在婚姻成为前沿同性恋法律改革的场所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ESKRIDGE, 《平等实践》，注24，第5页。

240. *Hinman*, 213 Cal. Rptr. 在411-12年

241. 同上, 416。

242. *ID.*

243. 同上, 419-20。

244. 同上, 415。

245. 同上, 419-

20。

246. 身份证号码:420 (Please, J., Conconsent)。

家庭形态的转变工作队领导人试图以重大方式抵制婚姻，将其作为权利和利益分配的相关参照点。然而，同时，工作队的努力结果表明，婚姻既区分同性伴侣和不同性别的未婚伴侣，也制定了非婚姻承认的条件。也就是说，竞争和不一致的框架是婚姻地位的特征，因为它关系到同性伴侣。事实上，现在人们熟知的家庭伙伴关系框架是专门为同性伴侣制定的次要权宜之计，尽管家庭伙伴关系包括不同性别的夫妇，并提供了更为有限的权利组合。

本节详述工作队在地方和州层面的工作。洛杉矶率先成立了家庭多样性问题特别工作组。倡导者通过后来在洛杉矶的倡议，以及旧金山和州立法机构的类似努力，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地方努力表明，为满足男女同性恋家庭的需要作出了更大的努力。相比之下，包括反对LGBT权利的宗教领袖在内的州级机构则拒绝接纳同性伴侣。不过，即使在旧金山，未婚夫妇收入回落的努力也显示了“亲家庭”运动动员反对LGBT权利的影响。

1. 洛杉矶

a. 家庭多样性工作队

虽然家庭伙伴关系的努力在80年代初失败，²⁴⁷洛杉矶已成为一个领导者在家庭政策改革的十年后半叶。一九八六年，立法会委员吴建华召集洛杉矶家庭多元化专责小组（「家庭多样性专责小组」），倡导未婚人士权利的同性恋律师托马斯·科尔曼（Thomas Coleman）曾敦促吴宇森成立专责小组，努力将员工福利扩大到家庭伴侣。²⁴⁹ Coleman将LGBT家庭认可概念化，作为以家庭为基础的更广泛改革框架的一部分。

家庭多样性工作队，包括科尔曼作为一名特别顾问，于1988.²⁵⁰发布了其最后报告，报告反映了一种功能愿景，通过了侧重于“相互”的家庭定义

247. 见上注200-02及所附文字。

248. 国务委员吴明华致国内合伙人股票基金托马斯·科尔曼（Thomas F. Coleman, Dir.）的函（1986年3月5日）（与作者一同存档）。

249. 参见 THOMAS F. COLEMAN, 《多米诺效应》77-78 (2009)。

250. 洛杉矶市家庭多样性问题工作队最后报告：“加强家庭：社区行动的典范”（1988年）[下称 L. A. 工作队报告]（随提交人存档）。

“相互依存”，包括“没有血缘关系，但住在一起的未婚人士，他们在法律上或道义上都有义务互相关爱和福利。”²⁵¹事实上，它注意到大多数洛杉矶成年人是未婚的。

当家庭多样性专责小组更全面地转向未婚同居夫妇时，即所谓的“家庭伴侣家庭”²⁵²时，它将同性夫妇与其他未婚夫妇进行了分组，并以缺乏婚姻渠道区分了这类夫妇：

夫妻决定在婚姻之外同居的原因多种多样。对于同性伴侣来说，结婚有法律上的障碍。对于年轻的异性伴侣来说，“试婚”可能是因为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这种担心也许可以用高离婚率来解释。同居的时间长，有时长达数年，也许能为离婚的人提供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答案。孤寡老人未婚同居可能是经济生存问题，再婚会导致丧偶抚恤金的丧失。经济上的阻碍或所谓的“婚姻惩罚”阻止了许多残疾夫妇结婚。

虽然特别工作组将许多不同性别的夫妻的未婚同居作为结婚的先兆或解决失败婚姻的办法，但同性夫妇以及年长和残疾夫妇由于缺乏有意义的婚姻机会而经历了未婚状态。更具体地说，该报告解释说，“无论同性伴侣在一起生活多长时间，同性伴侣都不能享受婚姻福利，因为法律明确界定了婚姻的对立性关系。

LGBT社区的领导人也关注性取向和婚姻之间的关系。同性恋律师协会洛杉矶人权律师协会的 Joyce Nordquist 在关于雇员福利的证词中解释说：

如果我是一个有丈夫的已婚妇女，我的雇主每年会为我的福利多支付大约650美元，为我丈夫提供保险，比他们为我作为单身人士提供的保险还要多。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我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结婚，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这是我关注的焦点。

251. 日期: 18-19 (尾注略)

252. 见第24页。

253. 我, 79岁。

254. 我。 (尾注略)

255. 我。 (尾注略)

256. William Weinberger& Joyce Nordquist关于国内合伙人雇员福利的证言洛杉矶人权律师家庭多样性工作队证言公开听证会记录185、185 (1987) [以下简称 L. A. TRANSCRIPT] (与提交人一起存档)

婚姻既为非同性恋员工提供了一条福利之路，也为他们的同性恋同事带来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对 Nordquist 来说，家庭伴侣福利是对利用婚姻来确定福利固有的性取向歧视的补救办法。

家庭多样性工作队自己的研究反映了婚姻准入的重要性，并将家庭伙伴关系定位为专门针对同性伴侣的权宜之计。男女同性恋者问题研究小组指出，虽然婚姻地位歧视问题“可以通过结婚来克服异性夫妇的婚姻状况”。²⁵⁷在一份报告中，它解释说，“婚姻不需要是这里的首要利益，因为公众承认婚姻是异性恋的大本营是如此激烈。”但婚姻给一对夫妇带来的好处和地位是同性恋者最终必须实现的。²⁵⁸这一推理反映了理解国内伙伴关系的分配框架和承认框架。

研究小组将非婚姻认可定位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帮助同性伴侣，而此时承认婚姻似乎并不现实。它解释说，即使“没有明显的解决办法。”²⁵⁹这似乎是对婚姻法的放松[.]. . 公众辩论很可能至少会激化和分裂。²⁶⁰因此，研究小组建议。

中间方针，承认男女同性恋关系、文件，并以法院或任何可能对这种关系的存在和合法性有真正利害关系，但又不侵犯异性婚姻这一敏感领域的机构满意的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

同性伴侣得不到认可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无法获得婚姻；家庭伙伴关系——即使对同性和不同性别的夫妇开放——构成了温和而妥协的立场，在性取向平等的登记册上听起来比家庭差异更有说服力。²⁶¹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同性伴侣之间的家庭伙伴关系似乎是为避免承认同性婚姻而设立的劣势地位，但同时也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承认。

257. 家庭多样性问题工作队、洛杉矶市男女同性恋者问题研究小组、家庭多样性工作队、补编(第一部分)、研究小组报告, S-192、S-216 (1987) (与提交人一起存档)。

258. S-209。

259. S-216。

260. 我。

261. 参见 David Link 致洛杉矶市家庭多样性问题特别工作组的备忘录3 (1986年12月1日)，洛杉矶城，家庭多样性工作队，补充协议(第二部分)，研究小组报告, S-832, S-834 (1987) (与提交人一起存档)。

在某些方面，这些报告反映了科尔曼本人对同性伴侣的家庭关系和婚姻的看法。研究小组由南加州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组成，他们在科尔曼的指导下工作，科尔曼是一名兼职教授。²⁶²科尔曼在发现自己不能与同性伴侣结婚后，开始为未婚人士辩护。他们在1981年举行了婚礼，同时强调婚礼缺乏法律效力。

虽然科尔曼仍然致力于使婚姻对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不那么重要的愿景，但他也希望同性伴侣能够获得婚姻。²⁶³对媒体和公众而言，科尔曼把他的努力看作是对婚姻的补充，而不是诋毁婚姻。²⁶⁴家庭伙伴关系既是所有夫妇婚姻的替代品，也是同性伴侣的权宜之计。科尔曼把婚姻看成是 LGBT 的目标。1989年，他号召加州律师协会向同性伴侣开放婚姻，这是一项“很好的学术活动”。²⁶⁵事实上，在贝尔的余波中，科尔曼前往夏威夷敦促立法者通过一项包容性的国内伴侣关系法，以此既降低婚姻的重要性，又避免同性婚姻的问题。

在收到广泛的公开证词和广泛的研究报告后，²⁶⁶家庭多样性工作队建议为未婚夫妇提供家庭伴侣福利。在处理定义和认证问题时，其领导人感到有压力，要求使家庭伙伴关系具有充分的婚姻性质，以鼓励官员和雇主采纳这一概念。工作队提出了包括两个人的定义

262. 见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律中心 Thomas F. Coleman教授，国内合伙人权利，教学大纲1 (1988) (与作者一起存档)。

263. 见 COLEMAN，上注249，在100–02。2008年，这对夫妇在加州合法结婚。见 ID116。

264. 见id. 106–07。

265. 见迈克尔·德安东尼奥，《未婚幸福》，洛杉矶时报杂志，2000年4月9日，第20页；菲利普·古蒂斯，《迈向接受同性恋婚姻的小步骤》，纽约时报，1989年11月5日，E24。

266. 见 COLEMAN，上注249，在106。同性恋律师协会“对该决议的通过表示惊讶和兴奋”，该决议是由一名异性恋会员提出的。《同性伴侣的婚姻权利》，圣地亚哥每日成绩单，1989年9月20日，第37页。埃特布里克解释说：“在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社区里，甚至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古蒂斯，上注265。

267. 参见 Coleman，上注249, 108–10；Thomas F. Coleman，夏威夷立法机关有充分理由通过一项全面的家庭伴侣关系法，5 LAW& SEX 541, 544–45 (1995)；另见 David Link，《婚姻战争6 (1995)》(未出版的手稿) (与作者一起存档) (解释科尔曼认为“公众对同性婚姻的支持[是]十年后的事”，“希望在此期间利用国内合作关系来压低政治温度”。

268. 见一般洛杉矶工作队报告，前注250；前注 L. A. TRANSCRIPT，前注256。

269 这一定义并不要求有亲密关系，但加利福尼亚婚姻法中对血亲的限制和语言的采用证明了这对婚姻般的夫妻的存在。

此外，支持论据和基本证词表明，家庭多样性工作队考虑到亲密的、相互关联的关系。Achtenberg，女同性恋权利项目的直接律师，²⁷⁰提供了有影响力的证词，与婚姻模式相吻合。²⁷¹ Achtenberg解释说，在就家庭多样性工作队发布的指导方针的资格和认证提出建议时：

如果苏茜和莫德阿姨住在一起，莫德阿姨应该有资格享受这种福利——我们谈论的是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真相，我们谈论的是他们的交配关系，我们谈论的是成年人供养他或她的配偶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不认为关于莫德阿姨的论点是有效的。为了回答这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人们如何养活大家庭。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莫德姨妈在内，基本上可以保证价格会很高，以至于你不可能将福利扩大到我认为应该这样做的

人。

为了使处理城市预算的官员以及考虑成本的雇主和保险公司对她的案件具有说服力，Achtenberg在那些看上去像已婚夫妇（“配偶关系”）的未婚家庭与不结婚的家庭（例如姑姑/侄女对）之间划一条线。即使Achtenberg对家庭政策持有更宽泛的观点，她也提供了证词以满足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的关切。关注类似婚姻的关系提供了最好的方法。在Achtenberg的建议下，家庭多样性特别工作组建议城市员工享受家庭伴侣福利，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关系”。

b. 婚姻状况歧视消费者专责小组

作为对家庭多样性工作队建议的后续行动，洛杉矶市律师召集了婚姻问题消费者工作队

269. 洛杉矶特别工作组报告，^{前注}250，第25页。

270. Roberta Achtenberg的证词，女同性恋权利项目总检察长，同性恋夫妇/家庭，洛杉矶，^{前注}256，第253页。

271. 见洛杉矶特别工作组报告，^{前注}250，第79页。

272. Roberta Achtenberg的证词，^{上注}270，为257。

273. 洛杉矶专责小组报告，^{前注}250，为100。1992年，当雇员的家庭伴侣生病或死亡时，该市实施了探亲假的建议。洛杉矶，加州大学第168, 238号法令（1992年10月17日）。

274 未婚个人和夫妻的权利成为新团队的唯一负责人，这是上一届机构所涉及的许多领域之一。

消费者特别工作组的任务及其随后的报告反映了对婚姻特殊地位的抵制。正如家庭多样性工作队所做的那样，消费者问题工作队在1990年发表了最后报告，宣布“洛杉矶大多数(55%)成年人未婚”，因此，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被理解为更广泛的未婚个人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受到婚姻的公共和私人特权的伤害。

该报告还解释了许多人脱离婚姻的各种途径：“经济上的阻碍和所谓的‘婚姻惩罚’阻碍了许多老年人或残疾人结婚。当然，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不能结婚，因为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²⁷⁷尽管同性恋单身被定义为被排斥在婚姻之外，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被视为缺乏有意义的婚姻机会的更广泛群体的一部分。

消费者专责小组收到的公开证词揭示了一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即婚姻准入是一种有意义的区别，既伤害同性伴侣，又区别于不同性别的未婚伴侣。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社区代表强调了同性伴侣的独特困境和性取向的突出。洛杉矶艾滋病项目的 William Bartlett 作证说，虽然婚姻状况歧视可能“给受艾滋病影响的未婚异性恋者带来严重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对于异性恋者来说，婚姻状况是一个选择的问题。……”²⁷⁸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表明，必须承认男同性恋夫妇的家庭身份，强调该州限制性婚姻法的惩罚性影响。²⁷⁹ Bartlett 解释说，许多与其同居的人需要得到家庭的承认。

274. 市检察官办公室，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婚姻状况歧视消费者工作队，最后报告：“未婚成年人：新的多数寻求消费者保护”1 (1990年3月) [以下为婚姻状况歧视消费者工作队，最后报告] (随提交人存档)。

275. 我。在 vi。

276. 在州级，科尔曼敦促家庭登记为“非法人非营利组织”，但这并没有产生税收或法律利益。《家庭》一词获得了新的意义，洛杉矶时报，1990年12月13日，在A3。

277. 婚姻状况歧视问题消费者工作队，最后报告，上注274，9点。

278. William Bartlett, Asst. Prog. 洛杉矶艾滋病项目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Case Mgmt，向婚姻状况歧视问题消费者工作队(1990年1月29日)、消费者婚姻状况歧视工作队提供的证词、《最后报告(原始材料)补充》256, 256 (1990年3月) (与提交人一起存档)。

279. 见 CHAUNCEY，上注29，为104。

280 即使消费者问题工作队试图从婚姻状况歧视的角度来界定原发性伤害, 但艾滋病毒/艾滋病却承担着“因不参加该机构而遭受歧视的负担”, 其他运动积极分子认为, 性取向歧视是围绕婚姻组织起来的制度的核心。

2. 国家级工作: 立法机关关于家庭变化的联合专责小组

虽然洛杉矶当地的利益攸关方指出, 他们没有能力纠正同性伴侣经历的许多不平等, 包括法律上的婚姻排斥, 但281个州一级的努力基本上回避了与同性伴侣有关的问题, 没有考虑将其纳入婚姻法。然而, 这种沉默不应被理解为是在制造反对婚姻的理由。相反, 尽管 LGBT倡导者做出了努力, 但在州级层面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引导更多不同性别的夫妇结婚, 同时继续排斥同性伴侣。

1987年, 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成立了家庭变化问题联合专责小组(“联合专责小组”)。283联合专责小组于1989. 284在第一年报告发布之前发布了其第一年报告, 专责小组的夫妇工作组向更大的团体提交了1988年的报告。285夫妻工作组只有三名成员: 民主党参议员大卫·罗伯蒂(David Roberti)、科尔曼(Coleman)和加利福尼亚州天主教会议(California Catholic Conference)执行董事威廉·伍德(William Wood)。286首先, 报告包含一份免责声明, 解释说“[报告]中所载的观点并非所有工作队成员都同意”。

《夫妇报告》主要关注于引导不同性别的夫妇结婚。在广泛讨论了已婚夫妇的重要性后, 报告提出了加强婚姻的建议。288为了推动不同性别的夫妇结婚, 报告敦促承认普通法。

280. Bartlett, 上注278, 在256。

281. 洛杉矶工作队报告, 前注250, 第82页。

282. 见 COLEMAN, 上注249, 在81-82。这与 Margot Canaday关于“异性恋法律制度”的概念产生共鸣, 在该等法律制度中, 国家“惩罚同性恋并奖励婚姻”。《作为法律制度的异性恋》, 收录于《美国剑桥法律史》442, 443 (Michael Grossberg& Christopher Tomlins编辑, 2008年)。

283. 家庭变化、夫妻工作组联合选择工作组初步报告:“加利福尼亚夫妇: 承认多样性并加强基本关系”(1988年)[以下为夫妻报告](随作者存档)。

284. 联合选择家庭转型期工作队, 第一年报告: 加利福尼亚州家庭政策规划(1989年4月)[以下统称家庭政策](附作者存档)。

285. 夫妻报告, 上注283。

286. 首先看到的是没有编号的文本页。

287. 见 ID。

288. 见同上, 10点25分。

婚姻，婚姻它认为，“废除普通法婚姻”并不是“引导人们走上正式的、礼节性的婚姻”，而是允许夫妻“在没有正式婚姻义务和利益的情况下同居”。²⁸⁹因此，“普通法婚姻合法化会阻碍同居”²⁹⁰因此，夫妻工作组优先考虑婚姻和诋毁未婚同居，因为它建议合法地与更多不同性别的夫妇结婚。

对于那些可以结婚的人，信息很清楚：他们应该结婚。该报告为年长夫妇推荐了一项“晚婚法案”，对于他们来说，“再婚可能在经济上不可行，因为法律规定终止了再婚后幸存者的福利。”²⁹¹该“婚姻形式”将“仅限于60岁及以上的人士”，并允许他们为税务和养老金之目的被视为单身。²⁹²同样，该报告建议消除残疾(不同性别)夫妇因“认为”而经历的“婚姻障碍”。²⁹³一般情况下，为确定残疾配偶的公共福利资格之目的，残疾配偶可获得非残疾配偶的全部收入。当然，这可能会阻碍婚姻，因为它有可能大大减少提供的公共福利的数量。

虽然该工作组还解释了同性伴侣因无法获得婚姻而面临的问题，但它并不建议这样做。²⁹⁵相反，它只是试图表明同性伴侣形成了“家庭关系”。²⁹⁶尽管如此，工作组还是建议将“家庭伴侣”，包括同性和异性恋者，纳入关于非法死亡诉讼的法律——艾尔登否认了这一权利——以及保险歧视。

当联合特遣队自己最终发布了自己的报告时，它承认“在过去三十年中，加利福尼亚家庭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目前超过十分之一的家庭符合‘传统家庭’模式——养家糊口的父亲、家庭主妇的母亲和两个或更多的孩子。”²⁹⁸因此，报告就平衡工作与生活提出了许多建议，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平衡家庭生活。

289. 我，27岁。关于在加利福尼亚废除普通法婚姻的探索及其通过承认同居协议而复兴的可能性，请参阅 Goldberg，前注220。

290. 夫妻报告，上注283, 27。

291. 我，31岁。

292. 身份证；另见前注284 《家庭政策规划》，第80, 83页。。

293. 夫妻报告，上注283，在32-33。

294. 身份证；另见前注284 《家庭政策规划》，第80、83-84页。。

295. 夫妻报告，上注283，在33-34。

296. 我，34岁。

297. 见同上，40-44。

298. 详见前注284 《计划生育政策》第3页(尾注略)。

299 年来，它致力于改善全州家庭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

然而，联合专责小组并没有明确提出针对“家庭伴侣”或同性伴侣的建议，尽管它宣称“婚姻之外的长期家庭伴侣关系”。. 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 .”301特别工作组只关注旨在加强婚姻和引导更多不同性别的夫妇步入婚姻的建议，具体建议消除303对“残疾人、老年人和贫困夫妇”的婚姻障碍，但不包括同性伴侣。事实上，它并未通过政府行动满足同性伴侣的需求，而是鼓励他们“使用合法合同，如遗嘱、持久授权书，以及明示的书面或口头同居协议”。

最终，联合特遣队抵制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要么保护未婚夫妇作为未婚夫妇，要么有意义地将同性伴侣纳入家庭法改革的一部分。305与洛杉矶的地方努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亲婚姻政治——既诋毁了非婚姻关系，也排斥了同性伴侣——有力地塑造了国家层面。306这可能反映了社会保守派在国家层面而非地方层面的影响力。事实上，联合特遣队听取了全国基督教右翼组织“关注家庭”负责人詹姆斯·多布森 (James Dobson) 和传统价值观联盟创始人路易斯·谢尔顿 (Louis Sheldon) 的妻子贝弗莉·谢尔顿 (Beverly Sheldon) 和社会保守派美国价值观研究所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 创始人大卫·布兰肯霍恩 (David Blankenhorn) 参加了特别工作组的全国咨询委员会。

299. 见ID26-28。

300. 见第71页。

301. 见第79页。

302. 见id. 83-84。

303. 见 ID。

304. 见第80页。

305. 包括科尔曼在内的加利福尼亚个人隐私委员会 (California Commission on Personal Privacy) 建议立法机关“制定允许加州‘另类家庭’成员的程序”。. 宣布他们的家庭状况。”加州州政府的报告。通讯 N关于个人隐私，执行摘要89 (1982年12月) (与提交人一同存档)

306. 值得注意的是，新右派在加利福尼亚获得了影响力。见玛丽·齐格勒，《草根原创主义:司法能动主义论据》、《堕胎辩论》和《司法哲学政治学》，51 U. LOUISVILLE L. REV. 201 , 210 (2013) (将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与新右翼联系起来)。尽管杰里·布朗从1975年至1983年接替罗纳德·里根，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但乔治·德乌梅吉安和皮特·威尔逊的共和党政府却覆盖了1983至1999年。

307. 参见《家庭政策规划》，前注284，附录，特遣队主讲人， G- h。

308. 见附录，国家咨询委员会，在 c。

婚姻和同性伴侣与家庭政策的关系——对国家层面的工作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3. 旧金山

与此同时，旧金山的地方工作为 LGBT 倡导者提供了更多希望。上世纪80年代初在旧金山出现的国内伙伴关系努力在十年结束时又重新升温。和以前一样，婚姻的中心地位为那些推动这一概念的人提供了参照点，并激起了反对者的反对。虽然家庭伴侣的提议包括了所有未婚夫妇，但很多关注——包括支持和敌视——都集中在同性伴侣身上。

a. 国内合伙的恢复

1988年，布里特主管宣布，他打算再次引入国内合伙立法。³⁰⁹作为回应，旧金山人权委员会（“HRC”）于3月8日就此议题举行了公开听证会，³¹⁰ 证词绝大多数是支持的，揭示了潜在的相互竞争的论点和目标。一些发言者特别关注同性伴侣的权利和承认，而另一些发言者则将这种夫妇视为受围绕婚姻组织的制度伤害的更广泛家庭群体的一部分。

在他的证词中，布里特强调了“基本关系”的重要性，并声称“歧视男女同性恋者的主要力量是拒绝承认...”。³¹¹然而，旧金山全国同性恋权利倡导者的律师辛西娅·戈尔德斯坦强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同性恋群体的问题。”³¹²像她在洛杉矶的一些同行一样，戈尔茨坦将同性夫妇与老年夫妇以及与另一成年人生活在一起的单亲父母进行了分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她声称，“根据加利福尼亚法律，不管他们对彼此的承诺如何，也不管他们在经济和情感上的约束有多大，他们都不能结婚。”³¹³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茨坦不仅从法律角度，而且在实际和经济方面对结婚能力进行了概念化。她还包括相互支持而不是浪漫关系界定的家庭。在洛杉矶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证词的女同性恋权利项目律师 Achtenberg 解释了非婚姻家庭被排除在婚姻福利之外是如何受到伤害的。然而，她的例子特别侧重于对同性伴侣的歧视，包括

309. 见 HRC 调查，上注153，第 iii 页。

310. 参见附件 C。

311. 我，4点钟。

312. 我，5点钟。

313. 我，6点钟。

Brougham和他的合伙人 Brougham和 Coles，国内合伙立法的先驱，也作证。315 Brougham详细介绍了伯克利的过程和结果，Coles涵盖了城市和雇主采取的一系列家庭合作政策。Coles解释说，一些政策提及“配偶等价物”，而其他政策(如伯克利和西好莱坞)“对[d]标准进行了相当详细的界定”。

尽管 LGBT提倡为同性伴侣提供理想的保护，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主张进行相对包容的家庭改革。然而，医疗和保险业的代表们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建议将家庭伙伴关系限制在亲密的、相互联系的关系上。Kaiser Permanente的罗伯特·齐默曼(Robert Zimmerman)作证说，“当‘与血缘或婚姻无关’的限制被取消时，承运人... . Zimmerman解释说，当市长阿特·阿诺斯问到“为什么包括血亲会破坏这个计划”时，他解释说，允许“父母、祖父母、年长的叔叔、侄女等等。. . . [要]进入. . 也就是说，“选择因素——增加对医疗保险需求最大的亲属——会推高成本”，建议将家庭伙伴关系的覆盖范围限制在亲密的、夫妻关系的范围内。

就像十年前一样，天主教领导人也表示反对。事实上，在公开听证会上唯一记录在案的反对国内伙伴关系的是旧金山总教区。它的代表担心“将家庭伙伴关系等同于婚姻会侵蚀婚姻”，并可能“使暂时或暂时的关系合法化”。320教会的立场再次定位于家庭伙伴关系，而这一点在更普遍的婚姻攻击中更为普遍。然而，教会的反对相对来说是有节制的。在回答问题时，总教区的代表解释说，教会更关心的是国内合伙注册所提供的“承认”，而不是向非婚姻家庭提供就业福利。321换言之，从天主教官方的角度来看，承认框架比分配的社会供应框架更令人不安。

在随后的报告中，HRC对改革持相对宽泛的观点，明确指出需要保护的“另类家庭情况”既包括家庭伙伴关系，也包括“由兄弟姐妹、婶婶或其他血亲组成的单位”。322尽管如此，HRC提及的是“国内”

314. 看，7点钟。

315. 同上，9:15。

316. 我15岁。

317. 我14岁。

318. 我。

319. 我。

320. 我，34岁。

321. 我，37岁。

322. 我，在三点。

323 这份报告援引了分配框架和承认框架，解释说，国内伴侣“共同承担任何夫妻的义务和生活必需品，但没有结婚证妨碍了利益平等和对他们关系的承认。”³²⁴尽管如此，这一概念化包括了同性和不同性别的夫妇。人权委员会在其调查结果中解释说，“虽然家庭伙伴关系影响到男女同性恋，但许多不同的家庭单位和家庭需要可以通过修改立法加以解决。

1989年，根据人权委员会的建议，监事会再次通过了一项国内合伙企业条例——在费恩斯坦市长否决了该市的第一次尝试7年后。³²⁶项立法将使未婚同性和不同性别的夫妇能够在该市登记。它将家庭伴侣定义为“两个选择在亲密而忠诚的相互关爱关系中分享生活的人，他们住在一起，并签署了一份《家庭伙伴关系宣言》，其中他们同意共同承担基本生活费用。

尽管该法令包含了相对包容性的非婚姻承认概念，但它以反映保险公司关切的方式针对亲密伴侣。该条例规定，“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会在加利福尼亚妨碍婚姻。”³²⁸此外，婚姻有助于确定家庭伙伴关系的轮廓。1982年最初的提案所载的终止后六个月等待期出现在1989年法令中。³²⁹有一个例外明确规定，“如果先前的国内合伙因其成员之一的死亡而终止，则这一期间不适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婚姻和离婚的类比。

这个象征性的法令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在没有有意义的好处的情况下，围绕该法令的公众对话侧重于特别承认同性伴侣，并将婚姻比喻归因于家庭伙伴关系。报道新法令的记者指出，同性伴侣进入家庭伙伴关系是为了“结婚”。³³¹该条例本身允许夫妇提出申请。

323. 我。(省略内部引号)。

324. 我。

325. 我, 50岁。

326. Morris, 上注170, 1; S. F., CAL., ORD. §4001 (1989) (1989年11月7日废止)。327. S. F., CAL., ORD. 176-89, §4002 (a) (1989年6月5日批准) (1989年11月7日废止)

(向作者存档)。

328. *Id.* §4002 (b)。

329. 我。

330. 我。

331. 伊莱恩·赫歇尔, 《同性恋新潮——结婚》, S. F. CHRON, 1989年6月24日, 发表于A1。

332 《旧金山纪事报》宣布，“那些看到象征性婚姻机会的同性伴侣计划在市政厅集体登记，并举行盛大的婚礼招待会来跟踪这一事件。”

不过，官员们仍希望为国内合伙企业中的城镇职工健康保险和丧假铺平道路。为此，监事会同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市长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研究将健康福利扩大到城市雇员的家庭伙伴的可行性。”³³⁴赞同布里特早先的证词，该决议的重点是同性伴侣及其形成“基本关系”的权利。³³⁵它宣布“每个人都有权建立相互关爱和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私人关系。.继续拒绝向男女同性恋者提供服务。”³³⁶因此，监事会敦促纽约市“停止对关系不受社会认可的人士的歧视，特别是不承认其他夫妇身份的男女同性恋夫妻。”³³⁷该委员会要求特别工作组负责制定一项“供卫生服务系统采用的计划，根据该计划，男女同性恋夫妇及其他非婚姻夫妻可享受城市健康福利计划。”³³⁸报告还要求工作队“系统地审查本市的所有政策和做法，找出不利于男女同性恋夫妇和其他非婚姻夫妻的政策和做法，并建议修改该计划，以结束这种歧视。”³³⁹

尽管 LGBT 倡导者庆祝《家庭伙伴关系条例》，但反对认可同性关系的社会保守派发起了一场反对同性恋关系的倡议运动。³⁴⁰保守的基督教组织橙县传统价值观联盟(Orange State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推动了旧金山全民公决的努力。³⁴¹尽管该法令的支持者强调说，该法令为处于艾滋病危机中的男同性恋夫妇提供了权利，但反对者却提出了保险成本增加的幽灵，暗示：

332. S. F., CAL., ORD. 176-89 , §4002 (e)。

333. Herscher, 上注331。

334. S. F. 第385-89号决议延长健康福利审查工作队(1989年5月25日批准) [以下简称 S. F. 决议] (与提交人一起存档);另见 Miranda Kolbe, 《国内合伙人法即将在 S. F.》, GAY社区新闻, 1989年5月21日至27日, 第1期。

335. 第385-89 号决议

336. 我。

337. 我。

338. 我。

339. 我。

340. 1989年7月7日, 洛杉矶时报 Valerie Basheda, 《家庭合伙经营条例摊位》, 3时(引用参与该倡议活动的鹰论坛成员德尔?麦克劳克林的话)。

341. VictorF. Zonana, 《同性恋议程需要打——即使是在旧金山洛杉矶时报, 1989年11月9日, 在A1。}

342 1989年11月，选民以微弱优势否决了这项法律。343。

旧金山运动构成了传统价值观联盟在全州范围内更广泛地推动废除地方同性恋立法的一部分。在选民撤销旧金山家庭合作条例的同一天，欧文选民将性取向排除在该市人权法之外，康科德选民废除了一项保护艾滋病患者免遭歧视的法令。344正如一位活动家所说，“在旧金山，有一个实体比同性恋投票团体更强大或更强大：保守主义者和信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宗教人士。”

LGBT的活动家们最近在州级抵御了一系列反同性恋的爱滋病倡议，346人对这些失败感到惊讶。347科尔曼认为旧金山的结果表明，“国内伙伴关系的同性恋倡导者应该尝试与其他受益于这些措施的群体建立联盟。”348换言之，科尔曼认为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和战略将提高倡导者的成功机会。

旧金山工作队是通过一项独立决议发起的，后来将被称为市长家庭政策工作队，即使在旧金山国内伙伴关系失败后仍然成立。349与洛杉矶的工作队一样，旧金山工作队从地方政府渠道中的LGBT倡导者的国内伙伴关系活动中脱颖而出。350 Britt主管通过监事会促成了家庭伙伴关系和相关工作队的决议。阿滕贝格，一位著名的LGBT权利律师，将主持工作队本身。

b. 市长家庭政策专责小组

市长家庭政策特别工作组（“市长专责小组”）在1990年发布了其报告，这是在国内合伙条例颁布几个月后发布的。

342. 见钱伯斯，上注12，第188页。

343. Zonana，上注341。

344. 见 ID。

345. 我在A34。

346. 参见 VAID，上注83, 83（描述1986年至1989年期间三项全州举措的失败）。

347. 见 Zonana，上注341，在A1。

348. 我。

349. 参见马克·桑达洛，《未婚伴侣的新福利》，S. F. CHRON.，1990年3月29日，A1。

350. 埃斯克州罗伯塔·阿滕贝格致市长阿特阿诺斯和人民的信函
旧金山（1990年6月13日），《2000年临近：迎接旧金山家庭面临的挑战：市长家庭政策特别工作组的最后报告》（1990年6月13日）[以下接近2000年]（与作者一起存档）

351 该报告提出了一种兼顾旧金山非传统家庭的家庭多元化愿景，同时也承认了传统已婚家庭的持久遗产，正如它在洛杉矶的前任所定义的那样，市长的专责小组将“家庭”广义地定义为：“家庭”。

一个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人的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和情感纽带和（或）婚姻、出生和收养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其中心目的是创造、保持和促进每个成员的社会、精神、身体和情感的发展和幸福。

工作队提出了家庭概念，强调相互支持，并模糊了婚姻家庭和非婚姻家庭之间的界限。所有这些家庭都被认为具有类似的社会意义。

虽然市长的专责小组得出结论说，“目前伦敦金融城向所有大家庭成员提供医疗福利是不可行的，”但它建议向城市工人的伴侣和子女提供医疗保险福利。354如果工人能够提供宣誓证词，证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分享共同生活必需品”，并且“没有血缘关系，不会比禁止婚姻更紧密”。355市长工作队宣布，“宣誓书中所包含的义务和经济责任与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的夫妻承担的义务和经济责任完全相同。”356事实上，“为了为健康保险招收一名国内合伙人，伦敦金融城的雇员[将]必须承担与已婚夫妇相同的经济责任。”357因此，拟议宣誓书的条款描述了家庭和与婚姻有关的依赖关系。就像在洛杉矶一样，婚姻使家庭关系变得清晰易懂。

这些要求旨在确保一种承诺的关系，并防止更随意的关系获得昂贵的利益。在这样做时，他们将家庭伙伴关系的概念定位为类似婚姻的，而不是更广泛的承认模式。不仅是那些不在拟议的家庭伙伴关系计划范围内的亲密、耦合关系之外的关系，而且家庭伙伴关系范围内的关系也应像已婚夫妇那样行事。事实上，特别工作组的报告向市长保证，由于城市的雇员“将承担家庭成员的食物、住房和医疗保健的责任”，因此，

351. 我。

352. 见同上，1点。

353. 我。

354. 同上，27-29岁。

355. 同上，30-31岁。

356. 我，31岁。

357. 我。当然，考虑到旧金山的婚姻主要由该州而非当地法律管辖，旧金山的官员几乎不能对家庭伴侣强制履行婚姻义务。

不愿意为朋友承担这一义务，就像他们不愿意为了提供医疗保险而嫁给一个仅仅是朋友一样。

当然，以婚姻为基准的诉求解决了保险公司不愿提供国内合作伙伴保险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³⁵⁹一方面，艾滋病危机凸显了国内伙伴关系赋予的权利的必要性；³⁶⁰，医疗保障、医疗决策、住院探视、同性伴侣幸存者权利等问题凸显出新的紧迫感。³⁶¹另一方面，艾滋病毒/艾滋病加剧了保险公司和雇主对国内伴侣保险的担忧，使国内伴侣保险的需求复杂化。一些雇主担心，国内伙伴关系条款将允许个人支付患病的朋友。正如旧金山一家公司的福利经理所说，“一位员工可以对一位即将死于艾滋病的朋友说，‘是的，你将成为我余生的伴侣。’”³⁶²

针对这些担忧，市长专责小组成员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制定家庭伴侣与配偶的关系如此密切的规则，以至于[保险公司和雇主]并不真正扩大[他们的]风险。”³⁶³位支持者认为，类似婚姻的家庭伴侣标准将最大限度地降低保险公司承担的部分风险，并减少虚假声称国内合伙身份的个人获得健康保险的人数。³⁶⁴即便如此，保险公司还是对符合国内伴侣资格的同性伴侣的医疗保健费用表示担忧。³⁶⁵作为妥协，工作队与一家保险公司达成协议，要求增加国内伴侣的保险费，并要求每年向该市报告艾滋病病毒相关费用。

市长专责小组的建议一经公布，很快就招致了社会保守派的反对。正如《旧金山纪事报》所观察到的，“一些提案几乎与11月被选民否决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内伴侣法的内容几乎相同，

358. 我。

359. 见 *ID*。

360. 参见上文附注12中的184（“艾滋病使男女同性恋者为其关系得不到社会和法律承认而付出的代价。”）；Rubenstein, 上注127, 排名第91。虽然艾滋病毒/艾滋病突出了男同性恋夫妇的法律需求，但有子女的女同性恋夫妇越来越多，集中注意家庭承认和这些夫妇的父母权利。参见上文第29段 CHAUNCEY, 105（“女同性恋婴儿潮引发的复杂法律问题为争取男女同性恋家庭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运动提供了另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361. 见钱伯斯, 上注12, 在184-85。

362. 弗洛伊登海姆, 前注199, D5。

363. 我。

364. 见临近2000, 上注350, 在31-32。

365. 见第31页。

366. 见 *ID*34-35。

”367对社会保守派的立场表示赞同，一位活动家表示反对：“选民已经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 . .

我看不出那些人为什么会改变主意。”368尽管如此，阿格诺斯市长为这些建议进行了辩护，重新使用了社会保守派的措辞，将结果描述为“进步的、支持家庭的政策”。

总体而言，工作队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地方一级以及在州一级的努力揭示了争取同性伴侣权利的相互矛盾的逻辑和考虑。对于那些支持权利和承认未婚夫妇的人来说，同性伴侣占据了两个可能导致不同方向的职位。LGBT提倡在受婚姻特殊待遇伤害的更大人群中频繁出现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通过这个镜头，政府应该分配权利和利益，而不考虑婚姻状况。与此同时，LGBT领导人还通过强调同性伴侣独特的婚姻排斥以及无法获得国家承认的地位来区分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与其他未婚个人。根据这一观点，向同性伴侣提供权利和承认是主要目标。当然，这些立场不是相互排斥的。倡导者试图将婚姻的重要性降到最低，即使他们利用了婚姻规范，援引同性伴侣被绝对排除在婚姻之外，并强调承认必须推进和界定家庭伙伴关系。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以外的行为者影响了非婚姻承认的形成。以某种形式支持国内伙伴关系的力量也试图限制国内伙伴关系的范围和影响。因此，他们采取了将国内伙伴关系视为反映而不是拒绝婚姻的立场。例如，保险公司抵制向非婚姻家庭广泛开放福利的条款，从而限制了家庭伙伴关系取消婚姻的潜力。一直以来，“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积极分子限制了LGBT的任何收益空间。

D. 婚姻和非婚姻规范之间的桥梁:在旧金山和洛杉矶颁布家庭伙伴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虽然家庭伙伴关系在规模较小、进步较快的城市中得到了推动，但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工作队工作在1990年代初为这些城市的突破奠定了基础。随着家庭伙伴关系最终成为现实，婚姻规范变得重要

367. 马克·桑达洛，《国内合作伙伴政策成本估算》，S. F. CHRON.，1990年6月13日，A1。

368. 檀香山，上注349。

369. 檀香山，上注367（强调事项加）。

地方官员和保险公司的路标。在 LGBT选区，婚姻提供了理解和庆祝家庭伙伴关系的共鸣符号。本节详述的主要事态发展发生在整个1990年代，婚前和婚后成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领导人的明确优先事项。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家庭伙伴关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如何实施婚姻规范的情况变化不大。

1. 旧金山

市长专责小组发布报告的同一天，布里特主管计划将家庭伙伴关系问题带回选民的消息浮出水面。370选民最终在国内合伙关系倒退一年后才批准了这一方案。371号提案体现了工作队的一项重要建议，规定“两个18岁以上的未婚、无血缘关系的人共同生活，并同意共同负担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

虽然同性和不同性别的夫妇都可以在 K号提案下登记，但在通过该提案之前，公众讨论的重点是城市的男女同性恋人口和同性伴侣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具体情况。官方选民信息小册子采用了承认框架，指出“这里没有让男女同性恋者正式建立和记录他们之间关系的程序。”373支持者的官方论点解释说，“男女同性恋者不能结婚”，然而“就像所有的夫妇一样，他们希望从他们的朋友、家庭和邻居那里得到明显的认可。”374位社会保守派的反对者认为，家庭伴侣关系“甚至是最暂时性的人际关系，与婚姻和家庭处于同一水平”，但未能说服大多数选民。

370. 马克桑达洛，布里特想要新的投票在十一月同性恋夫妇问题， S. F. CHRON.，1990年6月14日，在B8。甚至在选民再次进行权衡之前，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就通过了一项家庭假政策，其中包括工作队敦促的“家庭”定义。见1990年10月16日， S. F. CHRON. Refinses Bodovitz, *S. F. Refins. Family Leave Policy*, A6。

371. 见 S. F., CAL., MUN. 法典§62.1 (1991)。在那次选举中，选民还选举阿滕贝格为监事会成员。见马克·桑达洛，同性恋庆祝“熏衣草大扫除”在旧金山选举， S. F. CHRON.，1990年11月8日，在A17。

372. 旧金山选民信息手册及选票样本153 (1990年11月6日) [以下简称选民信息手册] 一些关于艾滋病政策的地方领导人担心，共同承担财务责任的措辞将使债权人能够追逐照顾终伴侣或朋友的个人，从而产生“不产生任何利益的义务”。Chambers, 前注12，载于 190. 不过，这一措辞已被列入，以向保险公司保证，它们将只涵盖承诺程度类似于已婚关系的关系。见 *ID*。

373. 见选民资料小册子，上注372，第153页。

374. 同上，154。

375. Marc Sandalow, *Small S. F. Majority for Domestic Partners Measure*, S. F. CHRON.，1990年10月8日，A4。

年底，卫生服务委员会投票决定将健康福利扩大到国内合作伙伴。

1991年2月14日，也就是夫妻可以登记家庭伴侣关系的第一天，这一场景反映了许多婚姻的仪式元素。377 多年来，这种象征婚姻的仪式随着政府主办的法律和文化两方面的仪式继续进行，这反映了过去赢得家庭伙伴关系的认可框架，同性伴侣与前来市政厅结婚的不同性别的夫妇走在一起。1996年，根据一项授权公职人员举行家庭伙伴关系仪式的法令，市长威利·布朗主持了一场群众仪式，在仪式上，当市长宣布他们为“合法认可的国内伴侣”时，夫妇们宣誓结为夫妻。378名主管卡罗尔·米格登，法令的公开同性恋作者，解释说，“这是一个可以被家人和亲人庆祝的欢乐时刻。379 尽管家庭伴侣包括所有未婚夫妇，但仪式和文化方面的重点是对同性伴侣的特别认可。事实上，只有一对不同性别的夫妇参加了1996年的庆典。

2. 洛杉矶

工作队在旧金山的工作消除了妨碍有意义的国内伙伴关系政策的许多保险障碍，从而使1990年通过的法令能够相对容易地得到执行。但洛杉矶在90年代初为家庭伙伴关系而进行的斗争揭示了保险公司抵制这一概念的持续重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实施困难。婚姻的中心地位既为这种抵制提供了依据，也为克服这种阻力提供了论据。

洛杉矶的城市官员在家庭多样性专责小组发布报告后不久就开始探索家庭伴侣的福利。但直到1993年，市议会才在公开同性恋议员杰基·戈德堡(Jackie Goldberg)的推动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城市员工的未婚(同性或不同性别)伴侣提供健康和牙科福利。

376. 分庭，前注12, 191。

377. 凯瑟琳毕晓普，不完全是一个婚礼，但相当一天的情侣湾，纽约时报，1991年2月15日，在A16。

378. 理查德 C帕多克，165同性恋夫妇交换誓言在 *S. F.* 仪式，洛杉矶时报，1996年3月26日，在A1。

379. 理查德 C帕多克，*S. F.* 允许同性恋夫妇的民事仪式，洛杉矶时报，1996年1月30日，在A3。

380. 他们评论道：“我们想过[结婚]，但我们中的一个总是胆小怕事。”围场，在注释378上。

381. 为未婚伴侣提供的福利由洛杉矶时报，1993年11月24日，在B2。

员工的未婚(同性或不同性别)伴侣。382该公司先前投票决定在1992年延长牙科福利。

尽管取得了这些最终的胜利，保险公司——以就业为基础的家庭合作计划的重要参与者——长久以来一直抵制这种背离婚姻家庭模式的保险。因此，该市和县一直在努力寻找愿意提供保险的保险公司。事实上，由科尔曼担任主席的加利福尼亚保险专员反歧视工作队1993年的一份报告记录了保险公司一再拒绝提供国内合作伙伴保险的情况。384 Cigna的一名代表于1992年告知该县，除非法律另有要求，否则它将“不扩大或定制合格受扶养人的定义”。385南加州的 Kaiser Permanente成立了一个国内伙伴工作队来审议这一问题，该工作队于1992年得出结论，将“不扩大或定制合格受扶养人的定义”。386该公司将国内合作伙伴归类为其他“不符合我们目前对符合条件的受扶养人的定义的依附关系”，包括“父母及其他亲属、一些子女和重要他人”。

作为回应，那些试图说服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人将家庭关系与婚姻家庭进行了比较，并将他们与其他被排斥的关系区别开来。1991年，一位工会代表向 KaiserPermanente的部门经理表示，“核心家庭是目前对依赖的定义的基础。. [,] [其中]包括订阅者的合法配偶和受抚养子女。”388但“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核心家庭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许多家庭由家庭伴侣和一方或双方的子女组成。”389因此，将“被抚养人的定义包括国内伴侣”扩展为。. 与传统以用人单位支持为主的健康保险保持一致

382. L. A., CAL., 《条例编号》§2.210 (1999); 参见 *County Extend Health Benefits to Employees's Domestic Partners*, L. A. TIMES, 1995, B4。

383. 詹姆斯·雷尼, 《为未婚伴侣谋求利益的戈德伯格》, 洛杉矶时报, 1993年11月16日, 在B3。1999年, 县域向社会开放了(含)国内合伙企业登记。见尼古拉斯·里卡迪, 该县成立国内合作伙伴登记处, 洛杉矶时报, 1999年3月24日, 在B1。

384. 见反歧视工作队报告, 前注214, 第3页。

385. Cigna高级市场代表 Kenneth R. Goulet致各县工会联盟副主席 Bud Treece的函(1992年8月7日), 载于反歧视工作组报告, 前注214, 收悉, 第62-63页。

386. Kaiser Permanent ente特别账户经理 Darleen Cho致各县工会联盟副主席 Bud Treece的函(1992年8月10日), 反歧视工作组报告, 前注214, 第61页。

387. 我。

388. Phil Ansell, SEIU Local 535, Senior Field Rep., 致 Kaiser Permanente 分部经理 Michael Leggett的函(1991年7月11日), 载于反歧视工作组报告, 前注214, 第59页。

389. 我。

”³⁹⁰根据这一推理，凯撒永久性可以为国内合作伙伴提供保险，“而不会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订阅者的父母。”³⁹¹

正如这些论点所表明的那样，甚至在 LGBT 倡导者提出结婚要求之前，工会代表、政府官员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对话就像配偶一样将家庭伴侣塑造成配偶——这与其他家庭关系不同。为了克服保险公司和雇主提出的财务异议，国内合作伙伴通过将自己与其他依赖关系区分开来获得了支持，这些关系本来也可以从扩大覆盖范围中受益。

E. 私营部门的家庭伙伴关系——同性伴侣和婚姻等价

倡导者和地方官员预计，国内伙伴关系的承认虽然很少提供政府权利，但将帮助未婚个人获得雇主资助的家庭医疗保险。他们希望，私营公司会认可员工的家庭合作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法律承认和雇主赞助的医疗保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公共和私人规范之间形成了相互构成的关系。³⁹²当地国内合伙注册的证明可能会向雇主施加压力，要求雇主提供福利，一些雇主要求正式的国内合伙企业登记。

393 由于家庭医疗保健是一项昂贵的提案，与就业挂钩，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有具体的激励措施来推动雇主认可他们的关系。与此同时，雇主有限制认可的财政激励措施。³⁹⁴美国以雇主为中心的私有化医疗制度创造了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中，私营和公共雇主都试图平衡公平和留住员工与成本管理之间的关系。³⁹⁵将承认同性伴侣作为相关标准，从而提高婚姻的优先性，这是一项行之有效(并日益流行)的战略。

390. 我。

391. 我。

392. 参见 Blumberg, 上注220, 第1267页(解释“家庭是如何从雇员福利国家获益的渠道”。

393. 参见 Nancy J. Knauer, 《家庭伙伴关系和同性关系:市场创新和不完全的制度选择》, 7 TEMP. 油脂。& CIV. RTS. L. REV. 337 (1998).

394. 参见 Blumberg, 上注220, 参见第1267–69页(注意到同性伴侣对普遍将权利和福利扩大到非婚姻夫妻的现象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395. 见 CHAUNCEY, 上注29, 在74–75。

本节详述的事态发展发生在整个1990年代。1993年以前工作场所政策中对同性伴侣的关注表明，一旦 LGBT运动在贝尔之后更明确地转向结婚，婚姻的相关性就没有什么变化。事实上，对同性伴侣的关注似乎反映了早先市政一级家庭伙伴关系工作中的具体论点的影响。虽然地方法令既包括同性伴侣，也包括不同性别的夫妇，但制定这些法令的工作却依赖于关于同性伴侣缺乏结婚机会的争论。工作场所政策越来越多地遵循这一逻辑结论——专门针对同性伴侣的政策。

1982年，纽约的乡村之声成为全国第一个提供家庭伴侣福利的雇主，3961991年，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莲花发展公司成为第一家只提供同性福利的公司。397这种兼容并包和有限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加利福尼亚也得到了体现。1992年，在洛杉矶，MCA成为第一家为员工的同性伴侣提供福利的好莱坞工作室。398年后，马华总裁希德尼·辛伯格和媒体大亨巴里·迪勒为全行业的利益而奔走。在给制片厂高管的一封信中，他们将婚姻准入而不是选择定位为中心：“以婚姻为基础的福利不受法律强制，承认婚姻是向雇员伙伴提供福利的唯一手段的福利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达到的标准。”399其他工作室也效仿了马华的做法，截止1996年，派拉蒙、索尼、华纳兄弟、华纳迪士尼和米高梅为同性伴侣提供福利。400一些工作室向所有未婚夫妇提供福利，但大多数只向同性伴侣提供福利。

北加州的高科技公司也成为提供国内合作伙伴福利的领导者。403当1996年 IBM成为美国最大的同性伴侣公司时，一位发言人解释说，该公司将未婚异性伴侣排除在外，因为这些夫妇有选择的余地。

396. 波利科夫，^{前注}22, 49岁。

397. 波利科夫指出了这一举措的重要性。见ID61点。

398. 斯科特柯林斯，公司提供福利给同性伴侣的雇员，洛杉矶时报，1995年11月6日，在B8; 更好的利益，洛杉矶时报，1996年1月4日，在B5。

399. 柯林斯，^{上面注}398。

400. 见 ID。

401. 更好的利益，^{上面注}398; 克里斯克劳尔，工作场所是推动女同性恋，同性恋权利的关键，活动家说，洛杉矶时报，1995年10月16日，在D1; 华纳兄弟。将医疗保险扩展到洛杉矶时报同性伴侣，1993年7月1日，在D2。

402. 参见软件制造商将福利扩展到未婚配偶，洛杉矶时报，1992年7月15日，在D2。

403. 请看基因技术公司1994年5月26日在洛杉矶时报B2为同性恋家庭合伙人提供福利。

404 为了获得福利，同性伴侣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声明他们的关系近似于婚姻——他们在同一个共同的家庭中保持着长期的、忠诚的关系。

在将家庭伙伴关系作为婚姻的替代品而非真正的替代品时，雇主认为婚姻和家庭伙伴关系具有共同的核心特征，其基础是相互支持和承诺。事实上，通过国内合伙政策向同性伴侣提供福利鼓励了与雇主针对不同性别已婚夫妇的激励政策相同类型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甚至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的倡导者明确提出结婚要求之前，许多学院和大学就采用了家庭伙伴政策，强调婚姻比个人选择更难获得，并以婚姻作为确定哪些关系应符合资格的相关参照因素。1992年，斯坦福大学成为美国最早提供国内合作伙伴福利的主要大学之一。它的政策于1993年生效，包括

[t]两名同性别的个人，无限期地生活在一起，排他性地承担与婚姻类似的义务，在该等关系中，双方同意在经济上对彼此的福祉及彼此对第三方的债务承担责任。

在公立大学获得国内合作伙伴的覆盖范围代表了一场不同的斗争，因为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州法律和政府官员的影响。

404. 1996年9月20日，在B1，IBM为同性恋合伙人提供福利计划的RajivChandrasekaran，洛杉矶时报。

405. 我。

406. 见Widiss，上注34，在737-38。

407. M. V. Lee Badgett，*同工同酬*，学术出版社，1994年5月至6月，26日，29日（引用斯坦福政策）。不过，正如Blumberg指出的那样，这些雇主的保单授予的福利“并未规定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任何相应[法律]义务”。见Blumberg，上注220，在1274。

408. 198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拒绝了由加州大学女同性恋地位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向未婚夫妇开放已婚学生住房的建议。1988年2月11日，洛杉矶时报，UCI拒绝同性恋者使用已婚单位，16岁。在一些未婚夫妇获得了“家庭”校园住房这一事实变得明朗之后，这所大学面临着关于其明确政策的压力，并最终重申了其婚姻要求。1990年1月26日，洛杉矶时报，大学扫除UCI的国内革命，DanneKlein，B1。校园活动家反对，他们指出，同性关系的学生永远没有资格获得这种住房，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婚姻。见埃里克·利奇布劳，UCI澄清同性恋住房问题法案，洛杉矶时报，1990年2月1日，在B2。财政大臣杰克·佩尔塔森(Jack Peltason)依靠于州法律：“我理解你希望将家庭伙伴关系纳入福利和住房政策，但目前还不能这样做。

承认这些伙伴关系。DanicaKirka，同性恋活动家重建UCI棚户区，洛杉矶时报，1990年3月3日，在B6。类似地，198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否决了向未婚夫妇提供已婚学生住房的提议。见住房

通过将反对置于保护婚姻家庭的更广泛的努力中来阻止家庭伙伴关系的进展。然而，尽管共和党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反对国内伴侣从“婚姻和家庭制度的瓦解”中获益，但加州大学董事会(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gent)在1997年投票决定将医疗福利扩大到员工的同性家庭伴侣或血亲——这两人在法律上都被排除在外。⁴⁰⁹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受托人将医疗福利扩展到了62岁或以上的同性伴侣和62岁以上的异性伴侣。

在同性婚姻引起全国关注并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明确追求婚姻之后，私营雇主开始扩大家庭伙伴政策。虽然人们很容易将对同性政策的日益偏爱与贝尔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同性婚姻的关注联系起来，但加利福尼亚的覆盖时间表明，向更严格政策的转变要早于这些发展。事实上，影响地方政府采取包容性政策的论据可能支持向私营部门的限制性政策转变。即使是婚前采取的包容性政策也是明确的行动目标，这既反映了同性伴侣结婚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婚姻在建立家庭伙伴关系中的核心作用。

F. 后贝赫尔世界的国家国内伙伴关系

国家一级的国内伙伴关系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取得进展。因此，即使在同性婚姻成为国家政策问题之后，LGBT的倡导者们仍在继续要求对同性和异性伴侣给予婚姻认可。然而，在这些努力中，婚姻塑造了争取家庭伙伴关系的斗争，而家庭伙伴关系塑造了争取婚姻的斗争。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为国内伙伴关系展开了一场斗争，尽管这被认为是贬低婚姻的更广泛企图的一部分。从地方到州级的转变再次意味着基督教右翼组织和加利福尼亚领导人的更大影响。最终，甚至一些支持国内伙伴关系的民主党领导人也将社会保守派对边缘化的担忧归功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时报，1989年2月11日，26岁，不对同性恋夫妇开放。总理 I. Michael Hayman 为他的决定进行了辩护：“我知道大学没有法律上的权力来建立一种新的个人或家庭关系，或者在我们现有的婚姻法之外认可或认可个人关系。”我。

409. Kenneth R. Weis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同性恋工作人员晋升合作伙伴福利，洛杉矶时报，1997年11月21日，A3；另见 Blumberg, 上注220，第1288-89页(记录加利福尼亚大学摄政者通过的同性家庭伴侣和成年受抚养人的相关政策)。

410. 见肯尼思韦斯，加州州立小组确定给予合作伙伴健康福利，洛杉矶时报，1999年11月17日，在A3。

婚姻，婚姻归根结底，婚姻的规范分量——以及它在运动与反动冲突中的作用——构成了家庭伙伴关系的条件，并限制了不同性别的结合。

1. 偶合问题—婚姻家庭合伙

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以微弱优势通过了《议会法案》(“AB”)2810，这是一项扩大同性和异性伴侣权利的国内合伙法案。412该法案将家庭伴侣定义为“两个选择在亲密而忠诚的相互关爱关系中分享彼此生活的成年人”。413以致力于相互照顾和支持的亲密夫妻为重点，拟议的法律将国内伴侣塑造成现代婚姻概念的理想化版本。尽管婚姻法并未包含强加给国内伴侣的具体内容，但国内合伙语言将婚姻的社会属性转化为对未婚夫妇的法律要求。

反对意见很快集中在将同性伴侣纳入其中。国会议员伯尼·里希特(Bernie Richter)抱怨说，“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为所有人，特别是同性恋群体建立一种等同于婚姻的国家认可的关系。”415名支持者反驳说，该法案“甚至不接近”“同性婚姻法案”。416他们还宣传了该法案对老年异性伴侣的影响。

反对者还将家庭伴侣法案与更广泛的针对婚姻的攻击联系起来。加利福尼亚的基督教右翼领袖将同性伴侣的家庭伙伴关系概念化，认为这有损于异性婚姻家庭。他们认为，纳入不同性别的夫妇通过为那些能够(并且应该)结婚的人提供一种选择而诋毁婚姻。谢尔顿是传统价值观联盟的领袖，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成功地击败了LGBT在地方层面的成就，

411.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节表明了各州强烈反对国内伙伴关系，以及即使是通过一部微不足道的国内合伙法所需的让步，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默里对国内伙伴关系从地方到国家层面转变的重要的关注。见 *Murray*，前注125。尽管如此，这里的分析假设地方和州一级的声明、反对和约束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

412. 阿塞姆。B. 2810, 1994-95 Reg. 塞斯。(邮编:1994)1991年，加利福尼亚州一位立法者提出了一项法案，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它没有得到议会司法委员会的支持。见 *Assem*。B. 167, 1991-92 Reg. 塞斯。(Cal. 1991)。

413. 阿塞姆。B. 2810, 上注412。

414. 正如玛丽·安妮·凯斯(Mary Anne Case)所指出的那样，未婚夫妇的非婚姻承认所要求的功能定义在婚姻中并没有强制要求。见第141号注解前得案例，第1774页。因此，尽管对婚姻的普遍理解可能已经变得更加实用，婚姻本身并不需要非婚计划明确涵盖的任何功能指标。

415. Jerry Gillam, 《未婚夫妇权利法案汇编》，洛杉矶时报，1994年6月1日A3。

416. 我。(引用大会成员约翰·伯顿的话)。

417. 1994年8月24日，洛杉矶时报，《参议院未婚夫妇权利法案》，Carl Ingram，在A21

声称基于“婚姻背景下的男女关系”的原则，家庭伴侣关系“侵犯了[d]”。418通过这一镜头，家庭伙伴关系提案模糊了婚姻与非婚姻之间的界限，并通过复制对同性伴侣开放的非婚姻状态下的婚姻规范，有可能取代对婚姻本身的性别定义。最终，威尔逊州长否决了这项立法，宣布：“政府政策不应该通过提供要求更低的替代关系来降低婚姻的价值。”

1996年，共和党众议员威廉·皮特·奈特在回应贝尔的建议时，推出了1982年的AB法案，该法案禁止加州承认来自其他州的同性婚姻。420夏威夷的婚姻斗争在联邦和州两级都引发了激烈而成功的反动。在加利福尼亚州，奈特在州立法院领导了反对同性婚姻的努力。作为回应，民主党的反对者实施了一项“毒丸”战略，修订了承认同性和异性伴侣有限的家庭合伙权利的法案。

Knight反对家庭伴侣关系，理由是它会“重新定义婚姻”，422人抱怨说，“修正案使这一法案变得可怕。”423项反对意见合并了对婚姻贬值和对LGBT权利的过度认可的担忧。共和党参议员雷·海恩斯评论说：“任何其他名字的垃圾都有臭味。你所做的就是把同性婚姻比作别的。”424位社会保守派活动家也这么说。加州家庭运动的兰迪·托马森(Randy Thomasson)宣称，“要么你认为婚姻应该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要么你不相信。”

425 通过这个镜头，家庭伙伴关系构建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婚姻——这种婚姻使性别区分变得无关紧要，因此可以容纳同性伴侣。社会保守派的反对者认为，建立家庭伙伴关系——即使是以非常有限的形式——牵涉到婚姻的构成。

418. Daniel M. Weintraub & Bettina Boxall, 《预计威尔逊的否决》，洛杉矶时报，1994年9月13日，在A3上的无记名投票。

419. 政府。PETE WILSON, AB 2810 VETO MESSAGE (1994年9月12日)；另见Weintraub & Boxall, 上注418, A3。

420. 阿塞姆。B. 1982年, 1995-96年注册。塞斯。(Cal. 1995)；另见 EdBond, 《在同性婚姻问题上无法调和的分歧》，洛杉矶时报，1996年2月20日，B3。

421. 见 Assem. B. 参见卡尔·英格拉姆(Carl Ingram)，反对同性恋婚姻的法案遭到削弱，洛杉矶时报，1996年7月11日，在A3。

422. 1996年8月13日，洛杉矶时报参议院委员会针对同性婚姻的法案，在A3上发表。

423. 英格拉姆，上注421 (内部引号略)。

424. Carl Ingram, 同性婚姻禁止摊位，洛杉矶时报，1996年7月10日，A3 (内部引号略)。

425. 地区立法者 Andrew D. Blechman (1996年7月10日洛杉矶时报)拒绝同性婚姻但支持合伙角色，B4 (内部引号略)。

与此同时，该法案并没有得到 LGBT领导人的一致支持，他们反对为同性伴侣单独指定身份。立法机构的第一位公开女同性恋议员希拉·库尔 (Sheila Kuehl)用合并后的法案表达了她的不满：“就我而言，这个法案传达的信息是：‘好吧，有真人，有真人，他们可以结婚。还有你们。我们不会让你结婚，而是会给你一些更少的东西。’

Baehr之后，随着婚姻在政治雷达上的出现，围绕家庭伙伴关系划定的界线反映了关于同性伴侣获得婚姻的更广泛立场。通过将家庭伙伴关系与禁止同性婚姻结合起来，立法从性取向平等(和不平等)的角度构建了家庭伙伴关系。共和党人反对 AB 1982的新版本，在勉强通过后，奈特撤销了它，以避免建立国内伙伴关系。

2. 国内合伙业务突破(部分)

1999年，加利福尼亚州最终制定了一部国内合伙企业法，并于2000年1月1日生效。该法AB26只规定了两项福利，即为国家雇员提供医院探视和健康保险。429 Migden曾被选入州议会，他曾试图将同性伴侣和不同性别的伴侣都包括在内。430当时，倡导者们还没有就是否建立家庭伙伴关系来复制同性伴侣的婚姻或者作为对所有人开放的替代方案保持一致。

然而，一旦民主党州长格雷·戴维斯加入进来，将国内伙伴关系本身作为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替代方案的道路就变得不那么可行了。戴维斯表达了他对一项包含不同性别夫妇的法案的反对意见，该法案包括了不同性别的夫妇，因为这种包容可能通过为那些本来可以结婚的人提供一种非婚姻的选择，从而将婚姻的重要性降到最低。432鉴于他在 AB 1982433上的决定性投票和他作为州长候选人的支持，他的立场尤其引人注目。

426. 英格拉姆，上注421。

427. 见 Carl Ingram, *Davis Break Tie, Back Home Partner Registry*, L. A. TIMES, 1996年8月20日, B8。

428. 见 Assem. B. 26, 1999–2000 Reg. 塞斯。 (Cal. 1999)。1995年和1997年，议会未能通过国内伙伴关系法案。当该州颁布了一项国内合伙法时，加利福尼亚州有12个城市制定了家庭合伙条例。请看1999年5月26日洛杉矶时报A3版《参议院为同性伴侣提供的福利》的 CarlIngram。

429. Assem. B. 26, §3–4。

430. 参议员 KevinMurray的竞争法案也包括了同性和不同性别的夫妇。见马克·格莱斯通，戴维斯可能签署国内合伙人法案，洛杉矶时报，1999年9月3日，在A3。

431. 见 Cummings& NeJaime, 上注10, 1258。

432. 见同上, 1259年。

433. 英格拉姆，前注427。

434 现在，对戴维斯和他所期待的政治选区来说，同性伴侣无法获得婚姻的机会使他们有别于其他未婚夫妇，并调解了家庭伙伴关系和婚姻之间的关系。他的新闻秘书宣称：“对其他人来说。 .”435虽然同性伴侣的加入并不会威胁婚姻，因为这些夫妇不能结婚，但不同性别的夫妇的加入会削弱婚姻的传导功能。

虽然米格登赞成一项包容性的家庭伙伴关系法，但她最终与戴维斯达成了妥协：除了同性伴侣之外，该法案还将包括两名成员都超过六十二岁的不同性别的夫妇。436因此，最终版本使用了 AB 2810 (1994年法案) 中的相同定义——“两个选择在亲密而忠诚的相互关爱关系中分享生活的成年人”——但增加了不同性别的年龄限制。437由于老年夫妇往往缺乏有意义的婚姻机会，正如早先的工作队所记录的那样，438他们的加入巩固了家庭伙伴关系的理念，即对那些婚姻不是现实选择的人开放。它还增加了一种同情的选民。

与此同时，立法者制定了有限的家庭合作制度，基督教右翼倡导者通过一项禁止承认同性婚姻的选民倡议的运动获得了推动。当时的参议员奈特试图立法禁止婚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440新的国内合伙法赋予了这一努力更大的紧迫感。尽管竞选阵营声称22号提案不会影响国内合伙权益，但积极的支持者抱怨说，家庭伙伴关系是改变婚姻的后门之路。441号参议员奈特和其他保守的共和党议员指责说，国内合伙企业法将削弱婚姻制度，为同性婚姻铺平道路。

434. 见 GRAY DAVIS, 《家庭多样性、家庭伙伴关系和婚姻状况歧视候选调查》2 (1998年) (与提交人一同存档)。

435. Martin Wisckol, Partner Benefit Limited to Gays, ORANGE COUNTY REG. , 1999, B1 (内部引号略)。

436. 我。米格登的幕僚长解释说，“这些都是州长要求她改变的，她只是想实际一点，得到一些他会签署的东西。”我。2001年，立法者包括一对62岁以上的同性伴侣。阿塞姆。B. 25, 2001-02 Reg. 塞斯。 (Cal. 2001)。

437. Assem. B. 26§2, 1999-2000 Reg. 塞斯。 (Cal. 1999)。

438. 参见，例如，夫妻报告，前注283，在31。

439. 见 Cummings& NeJaime, 上注10, 第1259页。

440. 见同上，1260年。

441. 见艾米派尔，国家开始接受同性恋者的国内合作伙伴注册，洛杉矶时报，2000年1月4日，A1。

442. 英格拉姆，前注428。

随后的十年见证了两项成功的禁止同性婚姻的选民倡议——2000年的第22号提案和2008年在佩里受到质疑的宪法修正案第8号提案。在此期间，立法者扩大了国内伙伴关系，最终提供了基本上所有的州法律规定的婚姻权利和利益。⁴⁴⁴反动行动者以另一个名字作为婚姻对国内合伙制度提出了挑战，但均以失败告终。⁴⁴⁵随着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倡导者及其同盟者推动结婚，而反对者则利用家庭伙伴关系来代替宪法要求，这两项举措取得了成功。

* * *

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将探讨第三部分关于 LGBT在加利福尼亚的组织是如何为现存的关于婚姻和 LGBT宣传的学术对话提供信息的。婚姻——以及使婚姻享有特权的法律、政治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关于非婚姻承认的工作，反之，关于非婚姻承认的工作也参与了婚姻的形成。正如第四部分所说，加州的案例研究对一些有影响力的 LGBT婚姻宣传批评的历史基础提出了质疑。通过暗示难以摆脱婚姻的法律和文化负担，这使得由这些批评所引发的更广泛的规范性和规范性主张变得更加复杂。然而，正如第五部分所说，案例研究还揭示了以前未被承认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对婚姻本身的贡献以及婚姻与非婚姻之间的界限。在此过程中，它展示了早期的非婚姻工作是如何为今天的婚姻平等法学奠定基础的。

四。

重新考虑反对婚姻的案件

(1) 婚姻纠纷案(辩护)

有影响力的家庭法和性学者对婚姻至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利用婚姻来分配权利和利益的法律制度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依赖性

443. 见 Cummings& NeJaime, 上注10, 1257–96。

444. 见 CAL。有限元法代码§297.5 (西部2010年); Assem. B. 2216, 2001–02 Reg. 塞斯。 (2001法规); Assem. B. 25§3, 2001–02 Reg. 塞斯。 (Cal. 2001)。具体内容见格雷斯·甘兹·布隆伯格《对同性婚姻关系的法律承认:2003年加利福尼亚州国内伴侣权利和责任法案》，比较民事权利和家庭法视角，51 UCLA L. REV. 1555 (2004)。

445. 见奈特。高等法院, 26卡巴顿。Rptr. 3–687 (计算机辅助类, 2005)。

446. 见前注125, 内海姆。

447 而且，符合婚姻的偶合、排他性和承诺的规范的特权性关系限制了非规范性关系的空间。448然而，本部分不是探讨反对优先婚姻制度的一般论点，也不是婚姻批评家所作的重大贡献，而是侧重于一些学者如何通过对当代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主张的批评引导他们的论点。

作为他们更广泛婚姻批评的一部分，这些学者对 LGBT运动正在进行的婚姻平等运动提出了强有力的指控。例如，波利科夫声称， LGBT运动“为男女同性恋者争取特权”，而不是将婚姻从“尊重所有关系的发展”中剔除，而是提倡国家利用婚姻扩大权利和福利。

447. 参见注释22上的 POLIKOFF, 123–29; 另见 MARTHA ALBERTSON FINEMAN, 《绝育母亲》，性家庭及其他二十世纪悲剧143 (1995)。从更哲学的角度看，见《伊丽莎白·制动》《婚姻最小化:婚姻、道德和法律》(2012年)；《克劳迪娅》《同性恋离婚:对婚姻法律规制的思考》，22 HYPATIA 24 (2007)。

448. 见穆雷，婚姻作为惩罚，上注5，在59–62。

449. 著名的婚姻批评家通过对婚姻特权的法律制度提出强有力的指控，不仅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干预，而且还推动了重要的法律改革。在家庭法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波利科夫在发展双亲收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法律上承认了非生物的男女同性恋父母。见 *Polikoff*, 上注94, 在522–27。更广泛地说，Martha Feneman 以依赖为中心，表明需要更多地支持纵向而非横向的关系。见 FINEMAN, 前注447,

143. Murray 阐述了理解网络化家庭的原则，提请注意在传统的亲子依恋之外存在的照料关系。见梅丽莎默里，*网络家庭:重构法律理解的照顾和照顾者*，94 弗吉尼亚州。L. REV. 385 (2008). 此外，这些批评家影响了旨在支持依附关系而不是促进婚姻的法律规则的发展。事实上，通过证明婚姻为许多法定计划提供了不恰当的分界线，波利科夫的论点支持了法律创新，比如医疗决策、探亲假、非法死亡和幸存者福利等方面的创新。见 POLIKOFF, 上注22, 126–43, 167–68, 171–72, 195–96, 198。在性学背景下，包括凯瑟琳·弗兰克、珍妮特·哈雷和朱迪斯·巴特勒在内的学者对承认政治提出了更广泛的质疑，探讨了运动在寻求国家合法性时如何缓和其主张。见 Judith Butler, 《亲情是否总是异性恋?》，收录在《左翼法律主义/左翼批判》229, 241页(Wendy Brown& Janet Halley eds, 2002年)；《同性婚姻政治》Franke, 上注5, 第245页；Janet Halley, 《承认、权利、监管、正常化:同性婚姻辩论中辩护的修辞》，《从法律上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国家、欧洲和国际法研究》97, 99 (Robert Wintemute& Mads Tønnesson Andenas 编写, 2001年)。在此过程中，这些学者作出了重大的历史和理论贡献。比如，弗兰克在内战后对前奴隶婚姻监管方面的工作就说明了承认允许国家“驯化”其他“更流畅、更集体”的亲属结构的方式。见凯瑟琳·M·弗兰克，《成为公民:重建时代对非裔美国人婚姻的规范》，耶鲁 J. L. & HUMAN 11, 251, 253 (1999)。

450. 见南希·D·波利科夫，我们将会得到我们所要求的:为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不会“打破婚姻中性别的法律结构”，79 VA. L. REV. 1535, 1549 (1993)；Ruthann Robson, 《同化、婚姻和女同性恋解放》，75 TEMPLE L. REV. 709, 777 (2002)。

451 这一点，她争辩说，“这不是最理想的家庭政策。”⁴⁵²在这种观点下，要求婚姻而不是功能家庭政策，例如， Murray认为，关于拒绝同性伴侣结婚对儿童造成伤害的说法“将试图使之变得清晰易懂的努力边缘化，使之成为背离核心婚姻家庭的‘家庭亲属结构’。”⁴⁵⁴

此外，这些批评家认为，通过将婚姻作为解决男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困境的家庭政策解决办法，倡导者肯定了新自由主义趋势，即将照管责任私有化。⁴⁵⁵在这方面，穆雷认为，“对[婚姻平等]运动及其战略的隐含假设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婚姻为事实上的社会安全网，通过婚姻满足弱势个人的需求。”⁴⁵⁶这样，倡导者们支持玛莎·芬曼所称的“性家庭”——“传统的或核心的家庭”。⁴⁵⁷“457”是一个以异性恋为核心的正式庆祝联盟，是家庭认可的合适对象，也是国家支持的适当对象。

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批评与以性为基础的批评密切相关，该批评认为，将婚姻作为亲密关系的特权场所，使非正规性行为边缘化，并将同性关系推入异性机构的范围。⁴⁵⁹正如凯瑟琳·弗兰克所解释的， LGBT宣传的对象是“同性伴侣，而不是寻求非常规血缘关系的人或从事非常规性行为的个人。

451. 见 Polikoff, 上注5, 在203; 另见劳拉 A. 罗森伯里, 与利益之友?, 106密歇根州. L. REV. 189 , 198 (2007) (“[A]认识到国家对某些家庭形式的婚姻特权的建构和承认导致一些家庭法学者质疑提倡同性婚姻是否明智。”)

452. 见 Polikoff, 上注5, 在203。

453. 参见前注22, 第107页; 另见 Lisa Duggan, 《全国神圣婚姻!》(2004年3月15日), 网址为<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holy-matmarriage#>。

454. 穆雷, 《新的私生子有什么新的?》, 上注5, 433; 又见弗兰克, 《同性婚姻政治》, 前注5, 242 (辩称倡导者描绘的是“未婚父母”。作为病理学、污名化和儿童伤害的地点)。

455. 见 Harris, 上注134, 第1557–58页; 另见 DEAN SPADE, 《正常生活:行政暴力, 批判性的反越界政治》和《法律的限度》60–61 (2011); 哈雷, 前注449, 第110–11页。

456. 穆雷, 关于新的私生子有什么新的东西?, 在注释5, 在433; 另见 Urvashhi Vaid, “现在你得到了你想要的, 你想要更多?”, 37 N. Y. U. REV. L & SOC. 变更101, 109 (2013)。

457. FINEMAN, 前注447, 第143页。

458. 见安吉拉 P. 哈里斯, 爱之前和之后的法律, 76福德汉姆 L. 2821, 2843 (2008). 通过这一视角, 甚至试图将同性和异性未婚亲密伴侣纳入另类认可制度“只会强化性家庭的观念”。FINEMAN, 前注447, 第143页。

459. 看, 例如, Teemu Ruskola, 同性恋权利与同性恋理论:劳伦斯之后还剩下什么?

v. Texas, 23 SOC. TEXT 235, 245 (2005); 另见 Ruthann Robson, 主要是一夫一妻制的母亲?:关于女同性恋法律理论和改革的未来的论文, 17 N. Y. L. SCH. 胡姆. RTS. 703 , 703–06 (2000)。

460 从同化的角度来看，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认可，就像“异性恋”一样。

在这些批评的支持下，学者们提出了指令性的主张，敦促 LGBT不再强调婚姻是对同性关系缺乏认可的补救措施。例如， Polikoff鼓励倡导者致力于帮助各种家庭关系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提倡奖励婚姻的法律规则。462 Franke认为，“努力确保同性伴侣婚姻平等的努力，至少要符合努力使婚姻脱离正常的优越地位，而不是其他形式的依恋、承诺和愿望。”463

这些指令性主张支持更广泛的规范性框架，这些框架将废除、重新定位或显著减少家庭和性法律制度中的婚姻。例如，波利科夫的“重视所有家庭”的方针将用“民事伴侣关系”制度取代婚姻，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对不同类型的家庭有不同的规则，将有孩子的家庭和没有孩子的家庭区别开来。464她的做法还将取代婚姻，将婚姻作为法律上突出的分界线，而将法律的具体目的与法律所涵盖的关系联系起来。

为了支持这些规范性和规范性的主张，一些学者强调贝尔组织之前的意识形态婚姻抵制——援引第二部分 B部分所述运动轨迹的解读，这样做区分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反对婚姻的主张和目前倡导婚姻的主张。这些学者引入了一个预测维度，这表明如果 LGBT倡导者仍然致力于他们早期的愿景，那么当前的情况将会截然不同。对这些怀疑婚姻的人来说，90年代中期到现在组织婚姻的故事是错失的机会之一。

460. 见凯瑟琳·M·弗兰克，《劳伦斯的驯化的自由诉》。德克萨斯州，104 COLUM. L. REV. 1399, 1414 (2004); 参见 Halley, 上注449, 100 (“未婚成年人及其性生活将变得更怪异。”)

461. 见迪恩·斯皮德，《同性恋权利的封面》，37 NY. U. REV. L & SOC. 变更79, 84 (2013); 另见 Ruskola, 上注459, 第243页; Marc Spindelman, 《同性恋的地平线》，54 EMORY L. J. 1361, 1374 (2005); Nelson Tebbe等人，辩论：支持同性婚姻的论据，159 U. PA. L. REV. PENNUMBRA 21, 30 (2010) (Gilreath会费)

462. 见 POLIKOFF, 上注22, 在210-14。

463. 凯瑟琳·M·弗兰克，《渴望爱情》，76 FORDHAM L. REV. 2685, 2686 (2008).

464. 见 POLIKOFF, 上注22, 132-33。

465. 见同上, 126。

466.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响力的 LGBT运动的学者在提出婚姻之路是否可行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例如，沙克特在暗示“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时，LGBT社区内的婚姻怀疑论者占了上风，并说服了这场运动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尽管如此，沙克特认识到了替代路线的障碍。沙克特，前注100, 383。

根据这一观点，国内伙伴关系尤其是创造真正的婚姻替代办法的重要机会。然而，倡导者并未致力于培育家庭合作及其他非婚姻创新，而是最终诋毁二等设计等替代品。467例如，2006年，历史学家约翰·埃米利奥(John D' Emilio)考虑了本应：

如果我们试图设计一种利用历史趋势的力量的战略，作为一个运动，我们将推动婚姻进一步去中心化和去制度化。很久以前，我们做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富有想象力的酷儿活动家发明了诸如“家庭伙伴关系”和“二父母收养”之类的东西作为承认美国各地存在的过多家庭安排的方式。

对于这些持怀疑态度的婚姻主义者来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婚姻平等倡导“充其量只是放弃了曾经灌输给同性恋家庭的家庭多元化愿景。”469个LGBT家庭，Kaaryn Gustafson认为，“完全可以争取所有家庭的认可，而不仅仅是承认婚姻。”470然而，“过去几年来，LGBT的大部分权利运动都集中在婚姻上，加强了而不是重新设想家庭的观念。”471正如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所认为的那样，“几十年来同性恋政治背后至关重要的开创性见解正在被遗忘。”

在这一观点下，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从非婚姻向婚姻倡导的转变主要不是一种战略转变，而是一种深刻的规范性转变。华纳的总结抓住了历史叙述和其规范性含义之间的联系：“婚姻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政治的主导问题，但在此之前并非如此。如果婚姻是权利计划的基础，为什么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要在25年内抵制它？

467. 见保拉·L·埃特布里克，《避免男女同性恋家庭宣传中的冲突过程》，17 NY. L. SCH. HUM. RTS. 753, 761 (2000); Jeffrey A. Redding, 《尊严、法律多元主义和同性婚姻》，75 BROOK. L. REV. 791, 835, 839 (2010). 要想从家庭法的角度对家庭伙伴关系进行有力的批评，请参阅 Blumberg, 前注444, 1568年(解释说，由于手续要求，许多已形成承诺关系的同居夫妇并没有从加利福尼亚的国内合伙法中获得任何好处)。

468. 约翰·D' Emilio, 《婚姻之战让我们后退》，13位男女同性恋者。10 (2006).

469. 南希·D·波利科夫, 为了所有儿童:同性婚姻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怀念马克, 8 纽约市 L. Rev. 573, 585-86 (2005); 另见 Vaid, 上注456, 第104页。

470. 古斯塔夫森, 打破誓言:婚姻促进, 新父权制, 从平均主义撤退, 斯坦5. J. C. R. & C. L. 269, 300 (2009)。

471. 我。

472. 华纳, 注88, 第91页。

473 华纳当然是在暗示婚姻可以而且应该从 LGBT权利项目中分离出来，并且在 BAEHR提供有用指导之前， LGBT的宣传提供了有用的指导。

总体而言，这一历史叙事及其预测维度支持了反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优先结婚的指令性主张，组织和支持挑战婚姻的规范性框架。474例如，2006年，一些学者，包括波利科夫、弗兰克和埃米利奥，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超越同性婚姻》，推动倡导者少关注婚姻，多关注家庭多样性。签署国鼓励活动家重新找回自己的根，他们认为他们的立场“沿袭了进步的 LGBT运动的最佳传统， LGBT运动创造了其他法律地位，如家庭合作和互惠受益人。”475最近的干预措施采用了类似的逻辑。例如，在主张“关系承认多元化”时，默里将198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庭合作视为未来工作的模式。476她认为，尽管近年来国内伙伴关系的“转型潜力被侵蚀了，因为它被修改成完全以名义复制婚姻”，但在这之前，它构成了“试图挑战婚姻至上地位的创新”。

尽管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关注 *Baehr* 及其后遗症，但也有一些人将 LGBT宣传的变化追溯到不同但相关的发展。Murray特别关注政府 LGBT倡导者在寻求关系认可方面的转变。她辩称，“家庭伴侣关系从一种婚姻替代形式向一种低利率婚姻假冒行为的转变可以用20世纪90年代末从地方层面向州级层面的迁移来解释。”478尽管如此，她将旨在婚姻替代品的州级宣传与夏威夷诉讼联系起来，而夏威夷诉讼突然让婚姻看起来像是一个现实的目标。

弗兰克，另一方面，集中在较少的贝尔和更多关于劳伦斯诉。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德克萨斯州反鸡奸法无效并推翻鲍尔斯诉德克萨斯州法院一案的判决。*Hardwick*. 481她将这场运动的激进主义与后石墙时代的刑事犯罪联系起来，表达了“对幻想中的可能性的怀念。

473. 我，87岁。

474. 见，例如，POLIKOFF，上注22，在132；Franke，上注463，在2686。

475. 《超越同性婚姻：新战略愿景》，执行摘要2（2006年）（与作者一同存档）。

476. 穆雷，上注125，在296。

477. 身份证号码为300。

478. 同上，为296。

479. 见 *id.*

480. 539 美国558（2003）号文件。

481. 478U.S.186（1986）；参见 Franke, *The Politics of 同性婚姻* 政治，前注5，第244页（争辩道，“劳伦斯的决定并不一定会导致同性恋群体的政治认同或渴望得到认可”）。

482 Franke认为，在利用劳伦斯的非刑罪化来实现法律承认的过程中，483位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最近的宣传“抛弃了一些更激进的战略和目标，这些策略和目标建立在一种试图破坏占主导地位的性行为和亲属关系的政治基础上，而不是试图通过婚姻来稳定。”484 Franke在这个意义上对承认提出了更广泛的批评，而不是简单的婚姻。485事实上，她注意到很难阐明一个与婚姻无关的承认项目。

不管他们所强调的历史叙事中的哪一点，这些婚姻批评家倾向于沮丧地看待当前以婚姻为中心的时刻，怀着深情地看着更早的时代——在结婚之前，这是一个明确的 LGBT运动目标。他们试图找出并理解这场运动是如何以及为何误入歧途的。正如弗兰克所问：“我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充满好奇的地方的，一个政治对石墙的性自由战士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487加利福尼亚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些答案。

B. 加利福尼亚的经验教训

这一案例研究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婚姻对旨在获得非婚姻认同的宣传的限制，从而挑战了批评家的历史前提。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在更大的法律、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工作，优先考虑婚姻。一场致力于所谓“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强大运动进一步限制了倡导者破坏婚姻稳定的能力。虽然在许多方面，倡导者别无选择，只能在婚姻方面界定家庭伙伴关系，但著名的倡导者自己也设想了一个包括同性伴侣的婚姻制度。他们代表了重视婚姻的选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使家庭伙伴关系像婚姻一样。因此，许多倡导者通过“两者兼有”(both/and)而非“两者/或”的视角看待国内合伙关系，致力于建立包容性的家庭合伙制度，为同性伴侣融入婚姻奠定基础。

482. 弗兰克，《同性婚姻政治》，前注5, 245。

483. 见 Franke, 上注460, 在1413-14页; 另见 Murray, 上注125, 在302; Murray, 婚姻作为惩罚, 上注5, 在59。

484. 弗兰克, 前注460, 在1418年。

485. 见 ID; Franke, 上注463, 在2698, 2701; 另见 Butler, 上注449, 在241。

486. 见 Franke, 前注463, 在2689。这构成了与其他批评家不同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出发点，他们一方面倾向于区分渐进的非婚姻承认，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区分倒退的婚姻和非婚姻的承认。对弗兰克来说，旨在获得政府普遍认可的宣传忽视了国家以外更多变革的可能性。见弗兰克，《同性婚姻政治》，前注5, 第245页。

487. 弗兰克, 公共性, 同性婚姻, 和同性恋恐惧症的来生, 上注5, 在158。

首先从外部制约因素出发，案例研究揭示了婚姻的监管范围以及对法律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影响。即使是反对婚姻的活动家，婚姻也像潮水一样运作。488个倡导者支持和反对婚姻，通常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他们挑战婚姻的角色，即使他们屈服于婚姻的拉力。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主张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而是受到了一系列相关行为者的反应，他们塑造了这些主张的内容并影响了这些主张的可行性。政府行为者，包括法官和立法者，在法律和政策上享有特权婚姻。反动活动家，谁影响了官员和动员选民，都试图恢复婚姻的中心地位，削减 LGBT的权利。此外，包括雇主和保险公司在内的私人机构也采取了财政激励措施，限制有资格享受福利的非婚姻关系类型。总而言之，婚姻构成了根深蒂固的法律规范、强有力但有争议的文化优先事项以及一个众所周知的限制原则。支持和敌意的反应都从婚姻的角度过滤了 LGBT的主张，这类回应往往会影响倡导者的精力，限制潜在的更具变革性的愿景。

婚姻作为主要的法律和文化框架，在阿里埃拉·杜布勒 (Ariela Dubler) 所谓的“婚姻的阴影”(shadow of marriage) 中构建了非婚姻认可。那些映射到婚姻家庭的特定概念的人通过将自己与其他不符合婚姻模式的关系区分开来获得了支持。此外，婚姻还区分了同性伴侣和不同性别的未婚伴侣。这就产生了一种强调婚姻准入而非婚姻选择的方式，这种方式逐渐支持婚姻作为 LGBT运动的目标。事实上，持支持态度的盟友经常将国内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从而避免了同性婚姻更激进的可能性。

因此，婚姻的力量作为一种法律和文化规范，结构化了关于家庭改革的主张、辩论和结果，以至于倡导者没有也不能仅仅拒绝婚姻。即使倡导者另有希望，国内的伙伴关系在许多方面巩固而不是抵制婚姻的力量。最后，案例研究显示了抵消婚姻监管力量的难度。通过这样做，它反对简单地拒绝强大作用的规范框架。

488. 我感谢梅丽莎·默里提出这个比喻。

489. 小威廉·N·艾斯克里奇，《引导：基于身份的社会运动与公法》，150 U. PA. L. REV. 419, 487 (2001) (解释以法律为基础、以包容为重点的组织如何享有温和的运动愿景而非更激进的运动愿景)。

490. Ariela R. Dubler, *The Shadow of Marriage: Single Women and Legal Construction of Family and State*, 112 YALE L. J. 1641 (2003)。

婚姻和挑战指令性主张，敦促倡导者复制早期的行动主义。Baehr之前的努力——以及他们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存在。而抵制婚姻的监管力量比通常认为的要困难得多。

在讨论内部运动动力学时，案例研究表明，由于运动之外的力量，倡导者并不简单地接受婚姻的力量。许多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自己设想了一个包括同性伴侣在内的国家婚姻制度。当他们试图让婚姻对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不那么重要时，他们也对同性伴侣被排除在婚姻之外——通常是间接的——以及同性伴侣应该享有的婚姻地位提出了质疑。比如，当 Achtenberg 代表 Hinman 试图为他的同性伴侣争取利益时，她避免了对

加州婚姻法的直接挑战；在1980年代初，这是一个明智的战略决定。然而，Achtenberg 强调了 Hinman 对婚姻的渴望，并以一种将婚姻定位为 LGBT 倡导者目标的方式区分了未婚的不同性别夫妇。⁴⁹¹尽管她的论点反映了重要的战略决策，但它们也表明了对婚姻的规范取向，与当代对早婚的抗拒不同。即使是对以婚姻为中心的制度最有力的批评者之一，科尔曼也为自己的寻求婚姻，并认为婚姻应该包括同性伴侣。⁴⁹²此外，案例研究表明，倡导者代表重视婚姻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事实上，用来促进和庆祝家庭伙伴关系的承认框架引起了共鸣，这突出了人们对婚姻地位的渴望。许多同性伴侣在法律上未得到承认的关系中缔结婚姻，并将

婚姻的象征性因素强加给家庭伴侣；⁴⁹³对同性伴侣往往被排除在婚姻之外，这不仅是基于家庭的伤害，而且是对性取向平等的侮辱。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婚姻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即使拥护

者反对明确的婚姻要求，他们还是翻译了选民的意见。推动婚姻成为对非婚姻承认的要求。

因此，加州的案例研究表明，在某些方面，今天的婚姻批评家高估了 LGBT 倡导者的代理作用和激进政治的普遍性。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倡导中，他们强调婚姻批判和抵制。然而，这种观点

491. 见上文第三. B部分。

492. 见上一部分 III. C.1. a。

493. 社会学家报告说，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经历了法律关系的承认——尤其是婚姻——作为社会认可和平等的标志。见 KATHLEEN E. HULL, 《同性婚姻：爱情的文化政治》和《第116 (2006) 号法律》；Kimberly D. Richman, 《任何其他名称：同性婚姻的社会和法律利益》，45U. S. F. L. REV. 357, 372 (2010)；另见 ROSIE HARDING, 《性行为监管：同性恋生活中的法律意识》66 (2011)。

494 婚姻批评家的理论贡献对利用婚姻分配权利和利益以及调节性关系的成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在寻求将这些见解转化为实地法律改革和宣传模式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周边法律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因素，以及各种国家行为者、私人政党、反动积极分子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影响，他们对待婚姻和家庭政策的目标、价值观和动机各不相同。

五。

对婚姻问题的更细致的看法

尽管学术界对 LGBT主张的批评往往高估了早期组织中婚姻抗拒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但他们往往低估了 LGBT倡导者对婚姻本身的历史影响—以及它在组织家庭和性关系中的作用。事实上，即使是第二部分 A所述的标准说法也普遍将婚姻运动作为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发展，其方式可能掩盖了婚姻与早先的非婚姻工作之间的对话关系。虽然加利福尼亚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婚姻在非婚姻主张中的核心地位，但婚姻并不仅仅给非婚姻承认蒙上了阴影。495相反，案例研究揭示了非婚姻空间的构建如何影响婚姻的变化轮廓。在婚姻之外的领域， LGBT的倡导者促成了一种能够包括同性伴侣的婚姻模式，他们的关系现在看起来像婚姻。

A. 婚外婚姻的形成

越来越多的重要法律学者反对传统的假设，即婚姻只是单向地定义非婚姻生活。正如考特妮·卡希尔所说，“亲密关系的核心形式是：婚姻与非婚姻之间的互动关系。”

494. Eskridge认为 Polikoff的“对同性婚姻的批判”。. 使这一运动浪漫化.... 这并不像波利科夫和其他人想象的那样激进。”Eskridge, 上注100, 第1489页; 另见 William N. Eskridge Jr., 《同性婚姻辩论的意识形态结构》(及《关于同性婚姻的一些后现代论点》), 在第449页上的同性合伙法律承认书中, 时间为113, 119 (“大多数同性恋者的愿望不如波利科夫和埃特布里克那么激进”)。

495. 参见上文第463段第2697段的 Franke (“陷入婚姻阴影的软管发现自己被锁定在一个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所接受的依恋已经由国家决定了意义。”)

496. 见 Cahill, 上注9, 在47; Dubler, 上注9, 在961。在某种程度上，这追踪了布伦达·科斯曼的有力论据——左翼同性婚姻争论“忽略了公民身份的杂乱无章、矛盾和多样性。”BRENDA COSSMAN, 《性公民：关于性和归属的法律和文化规定》

“家庭”，包括婚姻和养育子女，“往往是在边缘家庭的阴影下形成的。”⁴⁹⁷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Ariela Dubler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寡妇权利的研究揭示了“对未婚妇女的法律监管。”⁴⁹⁸在19世纪关于单身女性权利主张的其他著作中，杜伯勒指出，在婚姻的“正式触及范围”之外，“法官和立法者塑造了婚姻本身的意义。”⁴⁹⁹当然，在 Dubler分析的时期，非婚姻监管作为一个高度性别化的制度参与了婚姻的构建，500个不同于由 LGBT非婚姻倡导形成的当代模式。事实上，这种对比强调了婚姻的动态性，以及它在非婚姻空间中的积极构建方式。

在更现代的 LGBT背景下，卡希尔解释了“国内伴侣关系法规是如何作为法律表达其对所有关系最渴望的承诺的一种工具”。⁵⁰²在这种观点下，非婚姻性认可阐明了对已婚和未婚关系的期望，即使这些要求在形式上只针对后一种关系。⁵⁰³事实上，尽管该州越来越多地接受玛丽·安妮·凯斯(Mary Anne Case)所说的“淡薄”婚姻观，⁵⁰⁴通过将具体、具体的条款与经济和情感要求强加在一起，该州对家庭伙伴关系的定义更加“浓厚”。⁵⁰⁵案例颠覆了对家庭伴侣和婚姻的传统理解，表明婚姻可以提供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灵活性空间。⁵⁰⁶然而，同时，国家可能会详细阐述。

160 (2007). 虽然 Cossman的重点是性公民的概念，但她给她的分析带来的活力和偶然性与对婚姻和非婚姻的分析是一致的，特别是在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工作有关的分析中。

497. 卡希尔，上注9, 52。

498. 杜布勒，上注490, 1646年。

499. Ariela R. Dubler, “一般规则的例外”:未婚妇女与“家庭宪法”，4份理论调查报告 L. 797, 800 (2003)。

500. 见同上，809。

501. 见 Dubler, 上注9, 在1019。

502. 卡希尔，上注9, 59。

503. 见第59–60页。

504. 请看玛丽·安妮·凯斯，女权主义者在同性婚姻诉讼中的损失，57 UCLA L. REV. 1199, 1205–06 (2010) (“对民事婚姻的浅薄看法使其成为夫妻可以填充其自身规范含义和内部结构的合法外壳”) (脚注略)。

505. 参见上注141的案例1773–74;参见 Claudia Card, *The Against Marriage and Motherhood*, 11 HYPATIA 1, 12 (1996) (注意到“享受家庭合伙权益的资格可能比婚姻更具限制性”)。

506. 见第141号注解前得案例，第1772页。事实上，凯斯认为，婚姻批评家们“担心国家干涉和控制成人双方自愿关系的细节，他们可能会发现，现行婚姻法律并不是最令人担忧的。”

限制性。”参见第1204号注释504上的案例。

507 也就是说，即使法律对婚姻持“淡薄”的观点，非婚姻法也能有力地传达一种“较浓”的观点。这样，家庭伙伴关系规定了每个人婚姻的内容。

加州的案例研究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待这一重要工作，表明不仅国家，而且倡导者和草根选民本身也在境外空间塑造了婚姻的内容。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参与的互动进程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婚姻意义的产生不仅来自边缘，也来自底层，因为处于未被承认和污名化的关系中的个人寻求权利和支持。通过将同性关系与法律和社会标准——婚姻进行比较，婚姻倡导者强调了未婚男女之间具有共同点的规范。LGBT倡导者从外部对婚姻的影响最终允许他们在婚姻内部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有些人试图构建非婚姻以逃避婚姻，而另一些人则积极采用非婚姻的方式，为重塑婚姻的形式提供了理由——一种能够包括同性关系的婚姻。

同性伴侣成为非婚姻认可的合适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与已婚夫妇相似，履行了相同的功能。如果同性伴侣应该得到认可，因为他们像已婚夫妇一样运作，那么他们的特殊方式——浪漫关系、相互情感支持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对于 LGBT身份和婚姻本身的定义都很重要。LGBT的倡导者们把同性关系说成是婚姻关系，是为了确保非婚姻权利，他们最终把同性伴侣塑造成适合结婚的人，而婚姻本身就是 LGBT。他们这样做的背景是一场更广泛的斗争，涉及多个运动，涉及婚姻的意义及其在组织性和家庭关系方面的作用。尽管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在某种程度上提倡家庭伙伴关系，而且有悖于直觉，这进一步强化了婚姻的中心地位，但它阐述了婚姻的内容，从而促成了能够包括同性关系的婚姻模式。

B. 今天的婚姻案例

通过仔细审视当代婚姻平等法学，我们可以看到，使同性伴侣有理由被纳入非婚姻承认的具体属性现在支持了他们被纳入婚姻。当法院裁定婚姻平等时，他们会清楚地表达出一种看起来像婚姻的模式

507. 见 Katz, 上注55, 第1269页。在某些方面，这与对家庭法的表述相一致。见伊丽莎白·斯科特，《社会规范与婚姻的法律规制》，86 VA. L. REV. 1901, 1929 (2000).

在很多方面，比如家庭伴侣关系，同样适用于同性和不同性别的关系。

在古德里奇。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宣布，公共卫生部是第一个向同性伴侣开放婚姻的州最高法院，该州最高法院宣布，“这是婚姻双方对彼此的唯一和永久的承诺，而不是生育子女，这是民事婚姻的必要条件。”法院在2003年阐明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源于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身份映射到婚姻规范和婚姻本身更广泛的变化。⁵⁰⁹ 婚姻的概念植根于性别互补性、生育性和生物育儿——这一概念证明了同性伴侣被排斥在外的合理性——不再引起共鸣。⁵¹⁰从这些术语中可以了解到，很明显，早期的非婚姻倡导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前倡导婚姻平等的时代奠定了基础。

在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以一种与多年来 LGBT 倡导寻求婚姻认可的方式相呼应的方式对婚姻进行了概念化。它在其2008年的《婚姻案例》裁决中解释说，“同性恋个人完全有能力建立一种充满爱心和持久承诺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作为家庭的基础，并负责任地照顾和抚养子女”⁵¹¹成人结合和选定的家庭，而不是生物繁殖和双性养育，已经成为非婚姻地位以及婚姻本身的基础。

更具体地说，婚姻的情感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非婚姻承认的关键一步——在当代婚姻平等法学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佩里地区法院在一项最终将成为本案最终裁决的裁决中认定第8号提案违宪，宣布：“婚姻是国家对一对夫妇的选择的认可和认可，他们选择与对方生活在一起，保持对彼此的承诺，并基于他们对彼此的感情组成一个家庭，加入经济伙伴关系，互相支持和任何被抚养人。”⁵¹³法院的语言从最早的表述就反映了国内合伙的定义。此外，在更狭隘的基础上推翻了8号提案，第九巡回法院——在

508. 798 N. E. 2 d 941, 961 (Mass. 2003)。

509. 见上文第一部分；另见 Jeremiah Egger、Note、Glucksberg、Lawrence 和 Love 婚姻先例的衰落，98 VA. L. REV. 1825 (2012)。

510. 见 Eskridge, 上注53, 1885年；另见 COSSMAN, 上注496, 第174页。511. 再婚案件183 P. 3-384、420、428 (Cal. 2008)。

512. 见 COSSMAN, 上注496, 第174-75页；David B. Cruz, 《异性生殖要务》，56 EMORY L. J. 1157、1167-68 (2007)；Hunter, 上注62, 1856。

513. 见 Perry 诉。施瓦辛格(佩里一世), 704 F. Supp. 2 d 921, 961 (美国运通 2010 年版)，副总裁 *Aff' d sum. 霍林斯沃思佩里*, 133 S. Ct. 2652 (2013)。

最高法院最终撤销了这一判决——在佩里一书中解释道，“因为我们承认那些已经建立了“持久的”关系的人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我们允许配偶而不是兄弟姐妹或室友共同纳税。”⁵¹⁴当被强制指定婚姻的属性时，佩里法庭指定了一些品质——情感承诺和经济支持——明确界定了家庭伙伴关系，并将这些品质联系在一起。

最高法院以站得住脚的理由派派佩里，因此对婚姻的含义及其与同性伴侣的关系知之甚少。温莎废除了 DOMA 的第3条，从而向已婚同性伴侣开放了联邦权利和福利，并阐述了对婚姻的理解，这与早先的家庭伙伴关系倡导者产生了共鸣。⁵¹⁶肯尼迪大法官的多数意见没有关注生育性和性别差异，而是借鉴了同样适用于同性和异性伴侣的核心属性。

事实上，持不同意见的阿利托法官注意到关于婚姻本身含义的争论。他观察到大多数人取代了传统的“夫妻”婚姻模式——他解释说这是一种“本质上对立的性别制度”——其模式是“性别差异无关”，因此“将同性伴侣排除在该机构之外[看起来]是歧视。”⁵¹⁷阿利托法官将这一“较新的观点”称为“基于同意的”婚姻愿景，这一愿景主要将婚姻定义为两个人之间相互承诺的庄严仪式——以强烈的情感依附和性吸引力为标志。⁵¹⁸这种能够包含同性伴侣的婚姻模式清晰地映射到早期的家庭伴侣制度中。大法官阿利托对温莎婚姻的两种观点的描述——以及对同性婚姻的更广泛的斗争——揭示了界定家庭关系和合理的同性伴侣非婚姻认可的属性如何最终定义了支持同性伴侣融入的婚姻。

仔细看看肯尼迪大法官对婚姻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他既强调婚姻的私人福利功能——婚姻是引导相互义务和支持的机制——也强调了婚姻的公共层面——也是对婚姻的认可。⁵¹⁹这两个框架在推动和确保早期 LGBT 宣传中的国内伙伴关系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温莎，肯尼迪法官用同样的框架来描述婚姻

514. Perry 诉 Brown (Perry *II*), 671 F.3d 1052, 1078 (第9 Cir. 2012), *rev'd sub nom.* 霍林斯沃思佩里, 133 S. Ct. 2652 (2013).

515. 见 *Perry*, 133 S. Ct. 2652. 516. 133 S. Ct. 2675 (2013).

517. *Id.* 2718 (Alito, J., 不同意) (省略内部引号)。

518. *Id.*

519. 参见 Douglas NeJaime, *Windsor's Right of Marriage*, 123 YALE L. J. ONLINE 219, 230–31 (2013)。

并将其与同性伴侣联系起来。他解释说，婚姻既包括“利益和责任”，因为国家利用婚姻来分配“某些法定利益”，更重要的是，将责任强加给伴侣。520事实上，肯尼迪大法官关于同性伴侣“将很荣幸地接受”521项婚姻责任和义务的声明反映了多年来 LGBT的倡导活动，表明同性伴侣与不同性别的已婚夫妇形成了相同类型的自给自足的家庭单位。522与此同时，他对国家承认和社会承认婚姻给予的关注既反映了早期在国内伙伴关系倡导中对承认的呼吁，也反映了后来拒绝承认国内伙伴关系是一种不充分的承认模式。523尽管国内伙伴关系一度试图赋予同性伴侣524“地位和尊严”524，但现在看来只有充分承认婚姻才足够。

温莎当然不涉及对非婚姻承认制度的挑战，例如家庭伙伴关系。然而，肯尼迪大法官对 DOMA的不承认所造成的“耻辱”525的关注表明，他可能将非婚姻替代者视为怀疑的对象。526 *Perry*则直接牵涉到国内合伙的宪法地位问题。然而，由于事实证明常设问题具有歧视性，法院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佩里下级法院的判决不仅表明，主张婚姻的人通过这些论点获得了非婚姻承认，而且表明非婚姻承认制度剥夺了婚姻法原先被理解为排斥同性伴侣的理由。

通过将权利扩大到同性伴侣，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像已婚夫妇一样，加州的家庭伴侣关系暴露了婚姻中基于性取向的原始区别，并排除了这种区别的正当理由。527鉴于同性伴侣因其婚姻规范的履行而获得了非婚姻权利，法院和立法机构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同性和不同性别的夫妇在婚姻方面的情况类似。换言之，非婚姻性承认最终定位为同性伴侣被排除在婚姻之外，正如阿利托法官所说的“等级歧视”。

520. *Windsor*, 133 S. Ct., 2692-93。

521. 同上, 2695。

522. 见 *NeJaime*, 上注519, 第237-39页。

523. 见 *id.* 246。

524. *Windsor*, 133 S. Ct., 2689。

525. 同上, 2693。

526. 见 *NeJaime*, 上注519, 第246页。

527. 见《再婚案》, 183 P. 3. 384, 435. (Cal. 2008); 另见 *NeJaime*, 上注3, 第724页。

528. *Windsor*, 133 S. Ct., 2718 (Alito, J., 不同意)。

此外，生儿育女和养育子女的理论基础在历史上支持婚姻中的不同性别要求，但恰恰因为有关非婚姻关系的工作而退缩。事实上，加州的家庭伙伴关系法规本身最终包括了父母对家庭伴侣所生子女的假设。529位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倡导者最终会强调婚姻和抚养孩子之间的关系，以支持同性伴侣对婚姻的要求。肯尼迪大法官在温莎对婚姻育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530然而，父母与婚姻的法定分离，源于异性恋家庭的形成趋势，但却被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所掌握，为婚姻平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在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通过1975年法案成为该州统一亲子关系法后，该法案的作者安东尼·比伦森参议员宣布，“父母和儿童权利将基于父母和子女关系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父母的婚姻状况。”⁵³¹婚姻和父母身份之间法律关系的这一裂痕最终为寻求保护（未婚）男女同性恋父母权利的LGBT倡导者提供了机会。⁵³²最终，正如第九巡回法院在佩里提出的“管辖亲子关系的法律（不同于其婚姻法律）”中提出的那样，向非婚姻父母提供权利和责任的方式消除了基于婚姻状况的区别，从而削弱了婚姻和父母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被用来证明婚姻的排他性。

534 父母地位和生物学的区别既源于生殖技术的趋势，也源于理论上的创新，包括事实上的父母身份和不容反悔的父母身份。LGBT提倡将权利和义务分配给非生物的共同父母，利用并推动了这些发展。⁵³⁵将这些重要的变化内化到佩里，第九巡回法庭解释说，“在加利福尼亚，亲子关系法规重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生理关系’。”⁵³⁶

529. 见 CAL. 有限元法代码§297.5 (d) (西部2010年)。

530. *ID* 2694-95 (多数意见)。

531. 新闻稿，参议员 Anthony C. Beilenson关于参议院第347号法案的声明 (1975年10月2日) (与作者一同存档)。

532. 见，例如，*K. M. 诉 E.*, 117 P.3. 673 (Cal. 2005); *Sharon S. 诉 Superior Court*, 73 P.3 d 554 (Cal. 2003)。

533. *Perry II*, 671 F.3 d 1052, 1086 (第9 Cir. 2012)

534. 见同上，1087。

535. 见，例如，*Elisa B. 诉 Superior Court*, 117 P.3 d 660 (Cal. 2005); *Kristine H. 诉 Lisa R.*, 117 P.3. 690 (Cal. 2005)。

536. 佩里二世, 671 F.3, 1087。

即使育儿不再仅仅与婚姻和生物学联系在一起，支持限制同性伴侣结婚的法律的人认为，这样的法律支持最佳的育儿环境——已婚男女的亲生父母。537在拒绝婚姻和双性恋育儿之间的联系时，法院不仅依靠未婚父母，包括同性父母的父母权利，而且还依赖于婚姻中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的侵蚀——这一转变是由女性权利倡导者推动的，也由 LGBT倡导者详细阐述的。正如古德里奇法庭所解释的那样，基于双重性别育儿的论点“与长期以来被立法机关和法院所否定的观点非常接近，即男人和女人天生和根本上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各自的‘适当领域’可以被严格和普遍地描述。”538佩里地区法院将婚姻和家庭中性别区分角色的遗产与禁止同性伴侣结婚联系起来。539驳回前者支持的拒绝后者。

从这些角度来看，关于婚姻定义的争论，以及非婚姻宣传对这场斗争的影响，揭示了它自己。尽管反对同性婚姻错误的社会保守派和评论家 LGBT主张“重新定义”婚姻，即使是那些支持婚姻平等的人也承认定义上的利害关系。事实上，在将其判定为“婚姻定义的重大变化”时，古德里奇法院将婚姻定义为“一种正在演变的范式”，并承认其对婚姻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植根于生育和性别差异的早期模式。

当然，这不仅仅是 LGBT工作的产物，不管是在婚姻内部还是外部。相反，这一定义斗争涉及二十世纪后半叶家庭人口和法律规范的广泛变化，以及左右两派围绕婚姻、家庭和性的动员。542在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找到更早的 LGBT组织时代婚姻形态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倡导者将同性关系映射到新出现的婚姻规范上。

537. 见开庭摘要为被告-干预-上诉人在77-81，佩里二世，671 F.3-1052。关于这一论点，请参阅考特尼·G·约斯林《婚姻、生物学和联邦福利》98 IOWA L. REV. 1467 (2013)。

538. 古德里奇酒吧部。Health, 798 N. E. 2 d 941, 965 n. 28 (麻省2003年)；另见 *Douglas NeJaime*, 婚姻、生物学和性别, 98 IOWA L. REV. 公牛。83、92-95 (2013)；Deborah A. Widiss等人, 《揭露最近同性婚姻法学中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 30 HARV. J. L. & GENDER 461, 495-96 (2007)。

539. 佩里一世, 704 F. 晚餐。2 d 921, 975, 992-93 (N. D. Cal. 2010) 关于性与性取向歧视之间的关系, 见 Andrew Koppelman, 《为什么歧视男女同性恋者就是性别歧视》, 69 N. Y. U. L. REV. 197 (1994); 《*Sylvia Law*》, 《同性恋与性别的社会意义》, 1988 WIS. L. REV. 187 (1988)。

540. 798 N. E. 2 d, 965。

541. 同上, 967页;另见第496号注释前的《宇宙人》175页。

542. 见上文第一部分;另见 COSSMAN, 上注496, 第174页。

为了得到非婚姻的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通过在婚姻之外的空间工作和在婚前的一段时间内构成了正式的运动目标，从而为每个人定义婚姻做出了贡献。

结论

从我们来的地方探索和理解对于欣赏和理解我们的立场和我们如何向前迈进至关重要。从这篇文章的案例研究中获得的见解表明，重新调整关于婚姻的规范性辩论的好处是，它能顾及到婚姻的巨大监管权力、婚姻的不断变化的含义以及同性伴侣的具体影响。

了解婚姻规范和同性关系之间的对话关系表明，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543对同性伴侣的婚姻可能继续将婚姻的意义从生育性和性别分化的一种转向植根于成人浪漫关系以及相互情感和经济支持的一种。544即使儿童是婚姻家庭的一个核心特征，早先对生育的关注可能会让位于更为普遍的育儿重点。545此外，夫妻性行为和 LGBT抚养的脱节可能会使对父母的社会和法律理解进一步复杂化。546这并不是说同性伴侣结婚的世界必然会被我们推向进步的方向。事实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所倡导的家庭伙伴关系和婚姻模式有助于以尽可能减少公众干预的方式构建私有化的支持。547婚姻本身也可能以根深蒂固的方式影响同性伴侣的生活。尽管如此，至少，这篇文章对婚姻和 LGBT宣传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表明，婚姻形态的转变可能整合并推动与家庭和性有关的更广泛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拒绝和夸张。

543. 见苏珊娜·金，持怀疑态度的婚姻平等，34 HARV. J. L. & GENDER 37, 61 (2011); Edward Stein, *Marriage or Liberation?:对争取男女同性恋权利和关系承认的两种策略的思考*, 61 RUTGERS L. REV. 567, 592 (2009);参见 Courtney Megan Cahill, 《庆祝可以有所作为的差异:美国诉美国》。《弗吉尼亚与两性平等新愿景》，俄亥俄州第70届。L. J. 943, 998 (2009) (指出婚姻平等工作的进步潜力，如果倡导者强调同性和不同性别关系之间的差异)。苏珊娜·金的“怀疑性婚姻平等”和爱德华·斯坦(Edward Stein)的“兼而有之”(both/and)方针表明，在继续寻找婚姻之外的空间的同时，培养婚姻的进步潜力。

544. 见 Eskridge, 上注53, 在1898年;另见 Ettelbrick, 上注467, 在760。

545.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计划探索重新配置生殖，以包括同性夫妇。

546. 见注解94上的 BALL, 在131。

547. 见 Murray, *What's So New Illness?*, 上注5, 433; NeJaime, 上注125, 在247-48。

这篇文章的分析——特别是它关注 LGBT倡导和婚姻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讨论了法律和社会变化研究中更广泛的问题。一场运动的轨迹和影响不仅取决于运动积极分子的意识形态承诺和战略决定，还取决于运动运作的更广泛的体制背景以及运动所针对的主张。也就是说，我们对倡导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能依赖于对社会运动倡导者的意志选择的分析，而必须关注运动与之互动的主要机构的构成和纪律影响。婚姻，就像法律本身一样，形成了理解和阐明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不满和补救办法的可用方式。事实上，优先考虑关系认同的冲动反映了婚姻的力量。当然，主导机构不仅决定了运动的优先事项和要求，也决定了运动之外的人的反应。婚姻为表达对 LGBT主张的支持和反对提供了一个框架。

然而，这篇文章也表明，即使一个社会运动与一个强大的，根深蒂固的机构斗争，改变运动本身可能改变该机构。通过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争论，以及其他力量带来的挑战，婚姻越来越有利于同性关系。随着婚姻慢慢地包括同性伴侣，我们看到婚姻的核心属性也在发生变化。尽管如此，婚姻内容和意义的这些变化可能会适应 LGBT运动的主张，从而确保婚姻的持续力量。

虽然这篇文章的分析明确地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主张与婚姻之间的互动与家庭法和性奖学金的辩论联系在一起，但案例研究可以直接用于社会法律理论中的问题。这篇文章揭示的动态可能存在其他运动情境中。探索法律、社会运动、法律和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不仅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背景下，而且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最终指向更具普遍性的法律和社会变革理论。

548. 在这方面，参见 Reva B. Siegel 的《爱的规则》：《作为特权和隐私的妻子的殴打》，105 YALE L. J. 2117 (1996)；Reva Siegel，《为什么平等保护不再得到保护：实施身份的国家行动的演变形式》，49 STAN. L. REV. 1111 (1997)。